

美国研究

季刊

1994年第2期

AMERICAN STUDIES

第8卷

6月5日出版

论美国黑人继续遭受种族歧视的症结及其出路
美国土著部落地位的演变与印第安人的公民权问题
竞争性的相互依存

杨立文(4)
李剑鸣(14)
朱文莉(24)

——冷战终结前后的美日关系

略论费正清

徐国琦(33)

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论文引文分析

侯颖丽(43)

○书评S

政如其人

崇岭(54)

——读《基辛格传》

中国美国学史：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杨玉圣(57)

——兼评李本京先生等的新著

○短论

19世纪末美国公众舆论评述

李庆余(67)

美国军事思想溯源

陈海宏(71)

美国军事战略调整评析

汪徐和(74)

○新书架

(77)

本期责任编辑：赵梅

编辑出版

中华美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照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印刷装订

北京仰山印刷厂

发行、订阅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刊号

ISSN1002-8986/CN11-1170 / C@

国外代号

Q1122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定价:

国内版 3.00 元

国际版 3.00 美元 (邮费在外)

AMERICAN STUDIES

Summer 1994

Vol. 8, No. 2

ARTICLES

ESSAYS

THE CRUX AND SOLUTION OF THE CONTINUED RAC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FRO-AMERICANS

Yang Liwen (4)

While having won basic civil rights, Afro-Americans today still suffer from racial discrimination. The crux lies in the backwardness of their education. Hence devoting great efforts to promoting the education of American blacks and raising their cultural levels is the way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present difficult position. This is also the road they must take to improve their condition in the long run.

THE EVOLUTION OF THE STATUS OF NATIVE AMERICAN TRIBES AND THE CIVIL RIGHTS OF INDIANS

Li Jianming (14)

The U. S. government and white communities have been trying unilaterally to civilize the American Indians, eliminate their tribes which are regarded as backward and uncivilized, and remould tribesmen into American citizens. However, the Indians, with their uniqu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inferior technological skills, are unable to compete with the white people. So what civil rights can bring them are for the most part just new suffering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ribe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movement have not brought them much benefit, because they find it hard to strike a balance among tribal membership, wardship and American citizenship.

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 POST-COLD WAR U. S. - JAPAN RELATIONSHIP

Zhu Wenli (24)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as made a great impact on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is has not merely intensified the existing fric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ut also given rise to new

tensions, when they are trying to redefine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under a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e exacerbation of frictions and the growth of interdependence are two major features of the U.S.-Japan relationship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relationship can be summarized as a "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 and will remain this way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ON JOHN KING FAIRBANK

Xu Guoqi (33)

John King Fairbank, the father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in the West, was the main academic spokesman promoting Sino-U.S. relationship. As the founder of Chinese studies who devoted all his energy to this field, he made substantial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ereto not readily surmountable. In Sino-U.S. relations, he played the dual role of a scholar and a government advisor an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peoples.

AN ANALYSIS OF SOURCE MATERIALS IN THE ARTICLES ON THE HISTORY OF SINO-U. S. RELATIONS (1945-1955)

Hou Yingli (43)

By means of an analysis of source materials in the articles on the history of Sino-U.S. relations (1945-1955) written by Chinese and Americans scholars from 1979-1989,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a wide gap exists between the academic levels of the two scholarly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search on this episode of history seems well-developed, while in China there are still new areas for scholars to explore.

BOOK REVIEWS

KISSINGER: A BIOGRAPHY by Walter Isaacson

Chong Ling (54)

A CRITICAL REVIEW OF *AN ANALYTICAL STUDY OF AMERICAN STUDIES IN PRC* by Prof. Thomas B. Lee and Geogre Yu

Yang Yu Sheng (57)

ACADEMIC DIGEST

U. S. PUBLIC OPINIONS IN THE 19TH CENTURY

Li Qingyu (67)

TRACING TO THE SOURCE OF AMERICAN MILITARY THOUGHTS

Chen Haihong (71)

COMMENTS ON THE READJUSTMENT OF U. S. MILITARY STRATEGY

Wang Xuhe (74)

NEW BOOKS (77)

AMERICAN STUDIES, a quarterly, is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reflecting the views either of the Association or the Institute.

《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

论美国黑人继续遭受种族歧视的症结及其出路

杨立文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黑人问题随美国与生俱来，历来是该国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独立后到内战前的80年间，围绕着黑人奴隶制问题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辩论，一个时期成为了全美国的头号问题，最后通过内战虽然把奴隶制废除了，但黑人问题并没有解决。内战和重建结束后，随着南北合流和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加诸黑人的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日益严重，终于引发了本世纪50—60年代那场震撼世界的黑人民权运动。黑人革命风暴迫使美国统治阶级从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的种种规定，黑人的处境同过去相比确乎有了不小改善，但谁都无法否认，美国的种族歧视至今依然存在，美国黑人并没有得到真正解放，所谓的美国黑人问题这一痼疾仍远未根除。1992年春爆发的洛杉矶那场种族骚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事实表明：在资本主义的美国，这个“老大难”问题，看来是无法彻底解决的。于是，在我们面前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当前形势下，黑人运动应走向何方？有什么办法可以使黑人的灾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有所缓解？美国黑人应如何走上自强之路？

带着这些问题，近几年我在应邀访问北美期间，曾对美国黑人的现状进行了考察，又到加拿大北方参观了10多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并对二者进行了比较研究，因此对如何解决美国的黑人问题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加拿大印第安人原有处境与美国黑人大体相似，都是被排斥在西方世界主流社会之外的少数民族，同样遭受歧视，都面临着20世纪高科技、高竞争的现代化社会的强大挑战。但近些年来加拿大印第安人由于狠抓民族教育，已闯出一条民族自强新路，使本身地位有了很大改善。相比之下，美国黑人因长期遭受种族歧视而造成的恶果固然很多，其中教育的落后贻害最大；因此大力发展黑人教育，应该是摆脱当前困境的出路，从长远看，无疑是美国黑人走向自强的必由之路。本文拟对此着重加以探讨，以期就教大方。

一、当前黑人继续遭受种族歧视的症结所在

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在暴力和非暴力的合力作用下,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在法律上和一定程度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黑人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约翰逊总统于1964、1965、1968年先后签署了三个民权法案,禁止在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明确保障黑人可以和白人一样享用旅馆、饭店、娱乐场所等公共设施,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保护黑人的选举权;开放住房,禁止在住房方面实行种族隔离。这些法案从法律上摧毁了长期以来美国社会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对于消除美国社会生活中的种族歧视弊端起了积极作用。

民权运动之后,首先黑人的政治地位有了改善,参政人数不断增加。由于黑人实际上赢得了选举权,使黑人担任公职的人数不断增加:美国黑人官员1963年不到一百人,1970年为1479人,1980年为4963人,到1986年1月达6384人。(1)这些人中有300人担任了大中小城市的市长,如纽约、洛杉矶、底特律、西雅图、克利夫兰、纽黑文、费城、巴尔的摩、新奥尔良、亚特兰大和一度在华盛顿等重要城市,都是黑人担任市长。黑人还第一次担任了弗吉尼亚的州长,第一次出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以及像托马斯这样的黑人到最高法院担任大法官等。在克林顿的新政府中有四名黑人出任部长,这创造了历史的最高纪录。在1992年国会换届选举中,有38名黑人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这也是黑人创纪录的胜利。当然担任公职的黑人大多数是在县级等基层单位任职,即多数是“基层干部”。

其次,黑人的经济状况也有了好转。在民权运动推动下,美国政府从立法上作出了不得在招工歧视少数民族的规定,为黑人的就业提供了一些帮助。因此,近20多年来黑人的就业人数有了增加,就业范围也有所扩大。在这段时间里,美国黑人人口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中产阶级阶层,人数达到上百万,这些人多在企业里担任经理或从事技术工作。约有1/3的黑人家庭年收入超过3.5万美元。(2)黑人的生活同以往相比有了提高。

在文化教育领域,由于民权运动的不断冲击,美国长期实行的种族隔离的教育体制基本上被废除了,广大黑人青少年上学的机会比以往大有增加。尤其黑人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显著,如攻读学位的黑人大学生人数,从1960年的22.7万人(占这类大学生总数的6.4%),上升到1981年的108万人(占这类大学生总数的10.3%)(3),稍低于黑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同时,从60年代民权运动到现在的30年间,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气氛同过去相比已经大为减弱,种族平等的观念开始在各阶层中形成,并在法律、行政、教育等领域显示出影响。总之,历史在前进,步子虽然缓慢,前进的潮流却是阻挡不住的。

但是对美国黑人在以上各方面取得的成就都不能估计过高,而必须大打折扣。就如在政治方面,参政的人数虽然增加,黑人在美国政坛上并没有取得与其人数相等的地位和影响,他们仍被排斥在政府决策程序之外,远未能主宰自己的政治命运。黑人的经济生活虽有好转,但20多年来黑人的失业率一直是白人的2至3倍,尤其年轻黑人失业率保持在30—35%。(4)由于广大黑人的教育水平普遍偏低,至今他们多数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若拿与白人的人均收入相比,黑人近20年来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地位没有重大变化。情况相同的家庭,按收入比较,1988年黑人只及白人的57%。(5)有1/3的黑人家庭生活贫困线或贫困线以下,另有1/3的黑人家庭也好不了多少。(6)衣食无着的黑人只得靠政府的福利补助维持生计,这样的人口1970年是75万人,1980年约250万,至今仍在继续增加,人数越来越多。(7)在近几年来美国经济衰退中,受害最深的还是黑人。

在科学技术领域,黑人工程师和科学家也屈指可数,寥若晨星,大多数黑人与科学技术

无缘。据“全国科学基金会”提供的材料，黑人虽然在美国人口中占有12.4%的比例，但在美国各学院和大学中黑人教授只有1.1%，获得博士学位的只有1.8%，硕士生2.7%，科学家和工程师2.5%，科研部门经理1.8%，总经理2.9%。相比之下，白人占全国人口的75%，却占据了90%的科学技术领域。(8)

总之，时至今日，美国种族歧视的阴影仍在政治生活、就业、教育和技术领域、社会习俗和心理状态等许多方面严重存在，并且往往采取更隐蔽的形式，使黑人深受其苦，却难于以言语申述。约翰·艾尔文·布朗认为，黑人是美国国内的“第三世界”，他说：“美国黑人至今仍处于被奴役状态，尚未获得自由，因此他们确实是第三世界的老百姓。”(9)

还在1962年，作家迈凯耳·哈林顿就指出：“即使把美国全部有关种族歧视的法律一下子都废除，种族问题仍将是国内道义上和政治上最迫切的问题之一。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还不仅仅是那一连串的不公正法令下的受难者。美国的经济，美国的社会，美国的心理状态，都带有种族主义性质。……反对黑皮肤的法律是可以废除的，但是穷的问题仍将存在，而这个问题又是由于肤色所引起的历史性的和制度化了的结果。只要这种情况存在一天，生而为黑人便将继续成为美国所强加于其公民身上的最严重的残疾。”(10)自民权法案签署后20多年来的客观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当前美国黑人继续遭受种族歧视的症结究竟何在？有人说，是因为黑人本身愚昧落后，表现不良，才被人看不起的。这种观点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广泛流传着。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颠倒了因果关系，是错误的，也是不公正的。对此杜波依斯早就批驳过：“往往是残暴无情的肤色偏见造成了黑人的落后，而不是由于黑人落后才引起种族偏见。”(11)只要我们对美国的历史和现实稍加分析，就可证明杜波依斯的上述结论是符合事实的。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美国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也是一个高竞争的社会。虽然他们历来标榜所谓“公平竞争”、“机会均等”，但对于美国黑人来说，这场竞争从来就是不公平的，在这样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黑人连生存的机会都不易得到，更不必侈谈什么“均等”了。其根本原因，黑人来到美国，先当了200多年奴隶，又当了100年“二等公民”，历来与文化和科学技术无缘。在奴隶制时代，黑人读书、写字就是犯罪。“对于黑人，就他所思索到和梦想到的来说，奴隶制的确是一切邪恶的总汇，一切悲哀的源头，一切偏见的根源。”(12)内战后在南部虽然为黑人办了一些学校，但由于实行种族隔离制教育，对黑人实行种族迫害，广大黑人仍然被拒于文化大门之外，因而也就无异于将黑人排斥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

经过50—60年代民权运动冲击之后，种族隔离的教育体制是被废除了，但由于种族主义的深远影响，广大黑人青少年今天也还没有得到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当前黑人面临的各种问题，诸如政治社会地位低微，就业、住房、医疗保险等方面受到歧视和自身生活贫困等等，无一不可从教育方面存在的种族歧视找到根源。据全美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报告说，美国目前有84%的青年有中学文凭，但黑人儿童中却有40%连小学都没读完，黑人中文盲达30%。由于黑人家庭经济贫困，使黑人在中小学所受的教育水准普遍低于白人，高中升入大学的黑人学生在70年代至80年代不超过38%，即不到白人学生的一半。(13)

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虽然取消了，但其流毒至今犹在。据以著名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为首的一个黑人学者专家小组在1989年5月发表的报告说，公立学校的美国黑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世隔绝的”，他们受到的教育是很差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教育当局认为大部分黑人及其他族裔学生“学习能力低”，达不到学习要求，因此在学业上对他们放任自流，撒手不管。在很多学校里最出色的黑人学生不能与最佳白人学生享受同等待遇，而且一些白人教师从不在学术上鼓励黑人学生努力进取，结果黑人学生退学率很高。上述报告还指出，黑人教育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黑人教师队伍日益缩小，课程中不包含少数族裔的内容，考试标准也不一致。在黑人高等院校里，不仅教职员的薪金不高，而且设备缺乏，图书馆和

其他方面的条件都很差，这些必然会对黑人学生的专业知识训练和能力的提高造成很大限制。

由于种族歧视，导致了黑人教育水平低下，因此影响到黑人的就业和竞争能力，由此又造成了黑人生活的贫困化和一系列的灾难。由于长期没有工作的机会，得不到社会救济，许多黑人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采取偷盗、抢劫、贩毒、卖淫等犯罪手段来维持生计。据官方材料，在全国发生的上述恶性案件中，21%是18至29岁的黑人男子干的；20至29岁的美国黑人男子中，几乎有1/4已经进了监狱。这使大部分黑人相信，美国的监狱是专为黑人而设的。许多中青年黑人在械斗中被杀。黑人中的吸毒者和艾滋病患者按人口比例，都高于白人数倍。由于黑人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的趋势在发展，黑人的家庭多数趋于破裂。黑人单亲家庭在1989年已多达50%，其中贫困儿童又占多数。(14)黑人儿童多数生下来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从小无人管教，流浪街头，沾染恶习，组织团伙，长大后自然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就这样代代相传，恶性循环，情况越来越严重。实际上，黑人成了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的最大牺牲品。

这一切到底都是谁的过错？难道都要黑人自己负责吗？！杜波依斯说：“种族偏见使黑白混血儿和黑人停留在原来的地位，它使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丧失志向，心中产生病态。”

(15) 迈凯耳·哈林顿也指出：“黑人是有自己的志向和愿望的，但没有实现这种志向和愿望的机会。其结果只是遭到令人绝望的挫折。”(16) 而当人们处在绝望中时，又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来的呢！

今日的美国黑人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种族问题，已经成为美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看来仅仅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暴力手段或非暴力手段，都已经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案。应该考虑一个新的方案，选择一条新的道路来尝试解决这个难题。我认为，在新形势下，发展黑人教育，是美国黑人走向自强的必由之路。

二、应该走布克尔·华盛顿开创的“塔斯克基”之路

在美国历史上，早就有人设想通过发展黑人教育，提高黑人文化素质来解决问题这条路子，并且作过尝试。奴隶制时代，一些自由黑人从1830年起一直到内战时期，都在努力创办工业学校；美国传教士联合会从一成立就教黑人各种手艺。甚至约翰·布朗这位伟大的废奴主义者早年在探索解放黑奴的方案时也曾考虑过教育这条路子，他还草拟过一份黑人教育计划。(17) 可是当黑人身上还背着镣铐，给奴隶主当牛做马的时候，这条路子又怎么能走得通呢？

内战和重建后，真正把发展教育、掌握技术作为解决美国黑人问题的方案，提到全国面前，本人身体力行，树立模式，并收到效果的，首推布克尔·华盛顿和他的塔斯克基计划。但对布克尔·华盛顿其人的评价和他所开创的这条路子是否正确，在美国有过很多争议。我们应对此重新加以认识。

布克尔·华盛顿(1856—1915)，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种植园，母亲是一名黑奴。他在1872年考入汉普顿学院，这是一所黑人工艺学校。学习期间，他深受院长阿姆斯特朗将军的影响，认识到职业技术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毕业后经院长介绍，1881年他到亚拉巴马州塔斯克基城负责领导一所规模很小的学校，着手把他所学的理论付诸实践。由于他精明强干，富有组织才能，仅仅四年时间他就把这所小而破旧、只有很少学生的学校改造成为一所充满生机、拥有十多幢校舍和300多名学生的学院——塔斯克基师范工业学院。100多年来这所学院仍然存在，规模越办越大，远近闻名，为黑人职业技术教育树立了一面旗帜。

华盛顿的人生哲学是：“一个人只要能做一点世界上需要做的事情，终究会腾达起来，

不论他属于哪一个种族。”〔18〕他强调黑人通过掌握技术，培养忍耐性和不屈不挠的品德，获得财产，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他的教育方案的基本内容包括：广办公立的黑人小学；施行全面的工业技术教育；与南部和解。就工业技术教育来说，他首先注重给学生传授农艺和手工业，如泥瓦匠、木匠、铁匠等技术，要求学生掌握一门实用的手艺、技术或专长，这样黑人就能在社会上派上用场而富裕起来。其次，华盛顿认为黑人在商业上大有可为，应该训练黑人一套做生意的本领。所以他计划的第二个方面是发展黑人商业机构。他组织了全国商业联盟，并担任该联盟第一任主席。这个组织的宗旨是要“向全世界显示黑人的才能与前途发展的可能性”。〔19〕他发展黑人商业的计划后来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总之，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塔斯克基运动想给美国黑人指出前进的方向：为了改善黑人的经济地位，就必须通过职业训练，掌握技术，以适应“自由”后的新环境，尽快使黑人从不识字、无财产的农民，提高到在“重建”后的新工业界里占有一席之地的工商业者或中产阶级。

可是在塔斯克基运动兴起之时，当时美国的客观现实却是：种族主义日益嚣张，三K党肆意横行，私刑迫害黑人的事件层出不穷，黑人反迫害、争民权的斗争不断高涨。面对这样的现实，华盛顿的基本态度是：黑人不必对当时存在的政治上不合理现象进行严肃的斗争；对那些占统治地位的种植园主和工业资本家，黑人顺从他们比反对他们更有好处。他主张放弃公民权和政治权等，认为这些是“非主要的东西”。他说：“全美国各地的黑人应决心从此抛开一切非主要的东西，而只抓住那些主要的；他们行动的目标应该是财产、经济、教育和基督教徒的品性。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只有这些是麦子，其他的都只不过是秕糠。”〔20〕由于这种思想支配，他当然主张和南部和解。1895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亚特兰大演说，他对南方人说：“在一切纯粹是社会的事情上，我们可以像五个手指一样的分离而立，但在一切对我们共同的进展有重要关系的事情上，我们必须像一只手一样。”〔21〕

亚特兰大演说使布克尔·华盛顿一跃而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人物，无论在南部或北部，他在白人都受到热烈赞扬，但在黑人中却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以杜波依斯为首的一批黑人激进派，对华盛顿提出了尖锐批评，称他上述演说为“亚特兰大妥协方案”〔22〕。杜波依斯认为，华盛顿要求“黑民族至少在现阶段必须放弃三样东西：第一，政治权利；第二，对各种公民权的坚持；第三，让青年一代黑人受更高的教育”。〔23〕1905年，反对布克尔·华盛顿路线的一群北部黑人青年知识分子，在杜波依斯等人领导下团结起来，集会于著名的尼亚加拉瀑布，发起了“尼亚加拉运动”。他们提出了与塔斯克基运动相对立的方针，在所发表的《政策宣言》中，坚决抗议施于黑人的种种暴行，要求给予黑人选举权，取消公共场所的歧视制度，在法庭上受到公正待遇，让黑人得到全面教育等等，并号召黑人群众团结起来展开斗争。尼亚加拉运动由于缺乏群众基础以及遭到布克尔·华盛顿本人的反对，只持续了四年就结束了。但它为争取黑人权利进行了大量工作，它的纲领一直是20世纪以来黑人运动为之奋斗的目标，并在60年代民权运动中基本上实现了。

在很长时间里，美国史学界对布克尔·华盛顿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贬者居多。直到50年代塔斯克基师范学院对外公开了华盛顿的档案，包括他的大量私人书信、会议记录、演讲等，在世人面前展示了许多以前鲜为人知的新材料。由此，美国史学界推翻了过去对他的某些定论，而形成了对华盛顿研究的修正派。从这些新材料中最重要的发现可分两个方面：“一是揭示了他的适应主义往往只是表面现象，私下里他曾运用塔斯克基的权力和金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二是揭示了他同样运用塔斯克基机器无情迫害反对他的黑人领袖。”〔24〕

对布克尔·华盛顿本人的历史评价问题，这里姑且不论〔25〕，只谈谈他所创造的“塔斯克基模式”在今天新形势下是否还有意义，或可否加以运用？经过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美国已经从法律上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黑人已经争得了公民权与选举权，当年“尼亚加拉运动”为之奋斗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因此今天的形势同100多年前华盛顿创办塔斯克基师

范学院时的形势相比已有很大不同。今天随着美国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黑人教育、让黑人掌握科学技术已刻不容缓,比当年更加紧迫;而客观形势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也比当年有利多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塔斯克基模式只要加以改造,其基本内容完全可以适用于今天。例如华盛顿的一个主导思想认为,黑人应该发奋图强,通过学习,掌握技术专长,增强自身竞争能力,打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个想法就很正确,应该发扬。华盛顿偏重职业技术培训,而疏忽了黑人的高等教育,这一点应予纠正。总之,布克尔·华盛顿给美国黑人留下了一份珍贵遗产,把经过修改的塔斯克基模式在新形势下加以弘扬,对振兴美国黑人民族必将大有裨益。

三、加拿大印第安人提供的范例值得借鉴

加拿大印第安人是加拿大国内的少数民族,由于历史上长期受白人殖民者的隔离、歧视,又同样处于20世纪高度现代化的西方社会中,所以面临了很多与美国黑人相似的问题。但最近20多年来,由于印第安人重视发展本民族的教育,已经取得明显的效果,使印第安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有了明显改善。这方面有不少好的经验值得美国黑人借鉴。

据统计,1987年加拿大有条约印第安人共41.5868万人,其中居住在保留地内的有26万多人,居住在保留地之外的有14万多人。(26)政府的调查报告说:印第安人的离婚率、死亡率、少年犯罪率、自杀率、凶死率、坐牢人数等都比全国平均数高2至4倍。50—60%的疾病和死亡均与酗酒有关。某大城市一个监狱的犯人中竟有75%是印第安人。(27)长期以来在白人中形成了对印第安人的牢固偏见,认为印第安人各方面都不成熟,像小孩子一样,需要“大人”来监护、照顾。加拿大政府就是这样的“大人”,它可以举出许多不体面的事说明“小孩”不行,必须由它来安排一切,即实行所谓监护政策。因此迟至1960年(有的省到1969年)印第安人才取得联邦选举权。在这之前,印第安保留地的一切事务均由政府派出机构印第安事务所统一管理,连印第安人外出也得经该事务所批准。印第安人没有工作,可以在保留地领取一定数量的“福利补助”,虽然不多,也够一家人衣食之需。这是加拿大政府的福利政策,表面看来不错,实际后果是消极的。因为这种政策容易引起其他各族劳动者对印第安人的不满,也容易养成印第安人自身的依赖思想,泯灭他们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印第安人长期被困居于保留地和贫民窟中,接受“福利补助”,终日无事可干,尤其青年感到困顿苦闷,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于是很容易走向酗酒、犯罪、家庭破裂、滋生事非。因此这种作法遭到许多觉醒了的印第安人的反对。他们要求民族权利,反对民族歧视,希望得到更多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而不是福利补助。

在教育方面,加拿大政府过去对印第安人实行同化政策,想把印第安人培养成“黄皮肤的白人”。加拿大实行12年义务普及教育,但达不到目标,印第安学生辍学率很高。原因是加拿大以前的教育不能反映印第安人的实际,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整套教材歪曲印第安人的历史与文化。印第安人对此很不满意,致使90%的印第安学生不能完成12年义务教育。针对这种情况,发展印第安民族教育的设想,早在50—60年代就有了,那是老一辈印第安“智叟”们最先提出来的,他们认识到“教育是通向机会之门”(28),建议要创办印第安人自己的民族学校,让印第安人管理印第安人的教育。

在加拿大历史上,自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建立后,从1868—1945年,由政府与教会联合办学,对印第安人实行分校教育;二战后由于印第安人一再要求结束分校教育政策,自1946—1969年实行合校教育,即印第安儿童与非印第安儿童合校学习。到70年代初期,一部分印第安领导人要求,他们需要自决并直接参与印第安人教育体制的改革。1972年全国印第安人兄弟会正式提出,印第安人有权直接管理他们孩子的教育,由父母与地方当局负责。1973年联邦政府表示接受印第安人管理印第安人教育的建议并同

意把这一建议作为印第安人未来教育发展的基础。从此印第安人的民族教育大大改观。

概括地说,70年代起印第安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开始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到80年代,高等教育也跟着发展起来。近几年进入了印第安人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时期。1987年在41.5868万名条约印第安人中,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学生共有7.6192万人,大学生1.2万人。在1979—1980年,印第安人大学生占其总人口的1.5%;到1986—1987年已占其总人口的4%。由于印第安人的要求,加拿大政府对印第安人高等教育的投资10年间增加了10倍;政府还给印第安学生发放了大量奖学金。例如1988年印第安人高校奖学金共达1.1亿加元,平均每个大专学生一年可得7500加元,足够维持学生的各项开支。(29)

自从印第安人自己接过教育管理权之后,由印第安人保留地村落社(30)管理的学校已遍及全国。虽然根据规定,印第安人可以上村落社办的中小学,也可上省办的中小学,还可以上联邦政府办的中小学,但实行的结果是,进入联邦学校学习的学生越来越少,将最终实现村落社管理学校的目标。由村落社管理教育有很多优点,他们重视从幼儿园和小学这类初级教育开始抓起,让孩子的父母和村落社过问学校事务。这样学生到校率大大提高,中途退学的减少了。重视将教学大纲与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紧密结合,包括讲授印第安人的传统技术,请长老参加教学大纲的讨论,并给学生作报告。还特别重视培养本民族自己的教师,村落社学校的教师已有30%是印第安人。各类学校都注意教育学生继承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如印第安人历史、印第安语言和文化等都作为正规课程,在课程安排上占有合法地位;帮助学生从道德上、文化上加深对本民族的感情,例如让学生发展自我价值的信念,培养个人对本地区社会、对国家和世界的责任感等等。

除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这种全日制正规教育外,还采取多途径、多渠道办学。如萨省印第安联合学院于1976年成立后,针对印第安人中存在的很多社会问题,如酗酒、家庭分裂等,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专设“印第安社会工作系”,培训一批批“社会工作者”,去印第安人中解决上述问题,收到很好的效果。其次,该学院还开办了师资培训班,以满足保留地村落社学校对印第安师资的大量需求。此外,还开办社区班,进行政治、经济或语言等单项训练,或对村落社管理人员进行定期训练;开办电话教学,通过电话给远程学生授课或解答问题;主办夏季学校,培训那些在印第安地区工作的人员,如小学校长等。所有这些办学方式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针对印第安人的经济比其他民族落后这一特点,在发展正规教育的同时,改革了就业培训计划,开始设立与新职业有关的专业技术培训。只有熟练掌握某一门专业技术,才能适应主流社会的就业需求。过去印第安人失业,多是由于没有技术找不到工作;现在掌握了某项技术,找工作也就容易了。在1978—1983年期间,在社会服务方面有5000名印第安人找到了工作。(31)随着印第安民族教育的发展,也给印第安地区的经济带来了繁荣。近十多年来各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因地制宜,开始有计划地发展自身经济,如就地开发印第安传统手工艺品、发展渔牧业、野稻加工或其他副业,使印第安民族经济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这一切表明:加拿大印第安人通过办学来振兴民族的路子是对的,为生活在西方主流社会中的其他少数民族提供了范例。近几年来,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澳洲的土著等都派人前往加拿大取经。加拿大印第安人在政治上也开始昂起头来,正向联邦政府要求给予印第安人以民族区域自治。

总结加拿大印第安人的办学经验,有几条十分宝贵:印第安人自己全面管理教育,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都由印第安人管理;重视培养本民族的教师;采用多渠道办学,把教育与就业和发展民族经济相结合;要求政府重视少数民族教育,拨出大量经费给以资助,等等。这些经验很值得美国黑人参考。

四、发展教育是振兴美国黑人民族的当务之急

列宁指出：“劳动者渴求知识，因为知识是他们获得胜利所必需的。……知识是他们争取解放的武器，他们受到挫折就是因为缺少教育。”（32）常识告诉我们，无论是对个人的发展，还是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教育都是极端重要的。特别是在现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更是如此。一个民族由于种种客观历史原因造成了教育的落后、知识的贫乏，要想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立足，在西方主流社会的激烈竞争中获胜，是非常困难的。美国黑人在取得了基本民权之后，要想真正直起腰板，昂首前进，只有大力发展教育，掌握科学技术，才是出路。

为此，首先要通过各种舆论工具，向美国政府和各阶层人民大声疾呼，让他们重视黑人的教育问题。要论证与宣传，黑人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不是黑人本身的过错，而是美国长期以来加诸黑人的种种不公正待遇的结果。像杜波依斯指出的，“黑人所以落到现在这种处境，奴役制度和种族歧视是主要原因。”（33）如果美国政府真正想消除美国的种族歧视，想还给黑人以人权，就应给黑人以优先发展的机会，把大力发展黑人教育的问题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美国国会应制定发展黑人教育的专项预算，增加拨款。黑人应利用自己的投票权，必要时发动新的民权运动，造成强大声势，对此施加影响。

已有许多实例表明，黑人孩子在黑人学校学习，由于没有种族歧视造成的精神负担与心理压力，退学率低，进步较快。但由于过去美国对黑人长期采取种族隔离政策，实行隔离教育，不许黑人与白人同样读书，几经斗争，才纠正过来。所以至今黑人对黑白分校反感至深。根据加拿大印第安人的经验，分校与合校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这两种方式他们都曾经历过，即使合校，从教师到教学内容都以白人为核心，并没有使印第安人在文化上翻身。此中要害，关键在于谁掌握教育的管理权。因此要明确提出“黑人管理黑人教育”的口号；同时彻底改革美国现行教育体制，在北部大城市的黑人区和南部黑人占多数的农村，不妨大胆重新实行黑白分校。在黑人的小学和中学里，尽量聘用黑人教师，要使黑人教师逐渐占居主导地位。要大力改善黑人教师待遇，给以优厚薪金，使他们安于本职工作。

针对当前多数黑人家庭破裂、单亲居多、孩子从小无人管教的情况，黑人教育要从幼儿园和小学抓起，越早越好。在黑人区，要创办一些全托幼儿园和寄宿小学校，来收留那些没有父母管教的孩子，费用要由政府或社区全包下来。要和孩子的父母与黑人社区取得密切配合，让他们参与学校的管理，以尽量减少黑人学生的退学率。华盛顿的马尔科姆·艾克斯小学就是一所被公认为创造了“不小奇迹”的黑人小学，成为其他学校争相仿效的楷模。该校学生3/4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有一些来自避难所。但这所小学的30名教师中有28名是黑人，教室里挂着著名黑人艺术家、科学家和作家的画像，整个学校洋溢着一种自豪感：一种黑人帮助黑人改造混乱社区的自豪感。学校的所有员工都在尽力挽救孩子们，教师们懂得这所小学对孩子们多么重要，他们说，这确实是他们的生命线。校长为鼓励学生上进，建立了一整套奖励制度，并且已见成效。学校的上课率达到93%，即达到了该地区教育系统的平均水平。学生们很喜欢这所学校，认为这是“一所充满爱的学校”；家长们则认为“把孩子送进这所学校很放心，会有美好的未来。”（34）马尔科姆·艾克斯小学的成功经验应在全美国加以推广。

还应该大胆实验由一些黑人教育工作者早就提出的建议：在小学里为黑人男孩单独开班，并聘请黑人教师承担这种班级的教学。虽然有人指责这种种族和性别隔离的作法是一种倒退，但已有事实证明这种作法可取。几年前佛罗里达的一所学校专为黑人男孩开设了两个班级，结果令人鼓舞。每天上学的人数增加了6%，考试合格率上升了9%，而生病住院人数则明显减少。（35）目前反对这种作法的阻力很大，应该坚持下去，让事实说话。

要吸取加拿大印第安人的宝贵经验，美国的黑人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要专门建立“黑人

社会工作系”或开办类似的专科训练班，培训出大批的黑人社会工作者，让他们深入到各地黑人聚居区，对黑人中吸毒、犯罪、家庭破裂等各种问题展开工作。要劝说、诱导不务正业的黑人改邪归正，规劝退学青少年重返学校，帮助失业黑人安排工作等。这当然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但必须下最大决心去做，而且要选派优秀、自愿的黑人来承担，这样效果更好，又可避免种族歧视之嫌。

要采用多渠道、多途径为黑人办学。黑人青年从中学毕业后，可以进黑人大学，也可进公立大学或私立大学深造。在已有黑人大学的基础上，还要多办一些黑人大学，并配备优秀的教师、先进的设备和图书资料等等。在白人占优势的大学里，教师对黑人学生要严格要求，热情帮助，在学术上鼓励他们的进取精神。对其中出色的黑人学生应与最佳白人学生享受同等待遇，要给以优厚的奖学金以资鼓励。

要吸收并发扬“塔斯克基模式”中的有益成分，结合未来的就业考虑，对黑人学生进行专业技术训练，让他们掌握一门技术专长。考虑到黑人在体育、音乐等领域内素有专长，还可以多办些黑人体育、音乐等方面的专科学校。但也要克服布克尔·华盛顿的教育思想中不足之处，即对黑人高等教育的忽视。杜波依斯认为，公立小学、工艺教育和职业学校都有它们的作用，“但是单靠这些还不够。如果我们要建立一座结实的、永久的建筑物，就必须在专科学校和大学里打下深厚的知识基础，这对于黑人同对于其他民族是一样的。”〔36〕原因很简单，要发展黑人教育，就必须有大量的黑人教师，而黑人教师只有在大学和专科学校里才能培养。只有在这样的大专院校里，才能给予教师和学校领导人以最好的训练，其中“最重要的是，给黑人世界传授足够水平的文化和人生的崇高理想。教师的教师只受技术师范的教育是不够的；在可能范围内，无论男女，都必须把他们培养成胸怀宽大和有修养的人，让他们到那些不仅不懂文字、也不懂生活的人当中去散播文明的种子。”〔37〕

无论哪一种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和职业技术学校等等，不仅要教给黑人学生以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更要教给他们以崇高理想和高尚品德，培养他们作为黑人民族一员的自尊自爱，为振兴美国黑人民族而发奋图强。在各类学校都要开设黑人历史与文化课程，让广大黑人青少年懂得本民族的苦难遭遇、历史贡献和当前困境，懂得黑人不要依赖政府，而要靠自己的首创精神来摆脱贫困，像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历来所主张的那样。〔38〕

与此同时，要在全美国造成尊重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社会风气。在美国的公私立学校中要把黑人历史课当作必修课程，让广大白人学生了解黑人民族的来历、对美国文明的伟大贡献、他们苦难的根由，从而对黑人采取理解、同情和帮助的态度。近些年来，美国的教育界已开始注意这个问题，看来还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去做。要使美国的统治者和广大白人明白：“黑人如果始终是愚昧而狂暴的无产者，南部就不可能建立巩固的文明”〔39〕，美国就会永无安宁之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帮助黑人创造平等的就业的机会，要对各类学校毕业的黑人学生作出妥善安排，帮助和鼓励黑人发展经济，积极从事工农商各业，以争取较好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

美国黑人虽然在奴隶制时期完全被关在文化大门之外，奴隶制废除后又长期在教育上受到种种限制和阻碍，但因他们原本是一个英雄的民族，本来就具有和白人相同的生理秉赋，在艰苦环境里特别勤奋用功，所以历史上黑人中人材辈出，在科学文化的许多领域内作出了杰出的成就。今天，如果他们主观上认清了本身走向自强的道路，客观上又给以大力配合，则美国黑民族的振兴是指日可待的。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劳动在黑皮肤上打着火印的地方，无论如何也不能在白皮肤上得到解放。”〔40〕他还说：“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铸成它自身的锁链。”〔41〕当年美国的种植园奴隶主和资本家们为了自身发财致富，丧尽天良，跑到非洲将黑人强行捆绑运到美洲，奴役和剥削黑人几百年。这固然给黑人民族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同时也给美国自身套上了

一副无形的“锁链”，至今无法解脱。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中说：美国的白人“已明白他们的命运已与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同时他们的自由与我们的自由已是息息相关的。”〔42〕因此，只有把黑人问题妥善处理好了，美国人才会有真正的自由与安宁，那时美国种族之间的不和才会“变成充满兄弟情谊的优美交响曲”。〔43〕

注释：

〔1〕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8, 108th Edition, p.247.

〔2〕戴增义：《黑人状况与种族歧视面面观》，载《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0年第8期，第26页。

〔3〕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20页。

〔4〕戴增义前引文，第27页。

〔5〕同上，第29页。

〔6〕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第720页。

〔7〕戴增义前引文，第29页。

〔8〕Tom S. Threlkeld, "Left out of the Equation," *The Dallas Morning News*, August 10, 1991.

〔9〕John Alvin Brown, "Black Americans As Third World People,"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Vol. II, No. 2, Fall, 1985.

〔10〕迈凯耳·哈林顿：《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86，87页。

〔11〕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页。

〔12〕同上，第5页。

〔13〕戴增义前引文，第28页。

〔14〕同上，第29—30页。

〔15〕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第82页。

〔16〕迈凯耳·哈林顿：《另一个美国》，第94页。

〔17〕杜波依斯：《约翰·布朗》，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60页。

〔18〕转引自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445—446页。

〔19〕同上，第446页。

〔20〕转引自哈利·海伍德：《黑人的解放》，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215页。

〔21〕布克·华盛顿：《亚特兰大博览会上的演讲》，载乔安妮·格兰特著：《美国黑人斗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22〕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第37页。

〔23〕同上，第44页。

〔24〕黄颂康：《美国对布克·华盛顿的再评价》，载《世界历史》杂志1981年第4期，第70页。

〔25〕请参考《兰州学刊》1992年第3期张士昌的文章：《试评布克·华盛顿》。

〔26〕由于历史与人为的原因，加拿大印第安人被划分为几种不同地位的集团，主要有三类：一是有条约地位的印第安人；二是无条约地位的印第安人，这类人约有50多万，分散居住在保留地以外；三是“梅狄”人(Metis)，是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儿，也有共约50多万人。文中所引统计数字系转引自阮西湖等著：《加拿大与加拿大人》一书，第1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7〕引自陈永龄：《记加拿大“第一民族”——印第安人》，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1期第210页。

(28) Linda Goulet, *Faculty Reflection and Practice in Implementing Indian Teacher Education*, Saskatchewan Indian Federated College, University of Regina, 1991.

(29) 本段数字均引自阮西湖等著:《加拿大与加拿大人》一书,第183,195,206页。

(30) 村落社 band, 又译“集群”,是政府划定的一种印第安人基层组织,专指具有土地和经济的共同利益,以及有历史联系的一群印第安人,同位于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保留地内,设酋长领导。村落社也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改划。

(31) 阮西湖等著:《加拿大与加拿大人》,第206页。

(32) 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8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70页。

(33) 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第49页。

(34) *Time*, December 21, 1992.

(35) *Time*, May 21, 1990.

(36) 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第92页。

(37) 同上,第85页。

(38) 参考李道揆:《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第728页。

(39) 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第90—91页。

(4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63年中文版,第312页。

(41) 马克思:《给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信》(1870年1月),载《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1957年中文版,第101页。

(42) 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1963),载赵一凡编:《美国的历史文献》,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6—317页。

(43) 同上,第318页。

《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

美国土著部落地位的演变与印第安人的公民权问题

李剑鸣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

历史循环论早已为多数史家弃而不取,然则综观历史,有些事件的演化却偶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人们一心朝某个方向奋力前行,若干年后却发现似乎重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上。美国印第安人及其部落地位的变迁,所经历的正是这样的过程:在白人初到美洲之际,土著部落被视为主权实体;美国政府出于实际的需求,对土著社会以各种方式加以改造,剥夺部落的主权,使之沦为被监护者,进而完全打碎部落制,把印第安人全部变成美国公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印第安人的全力争取,部落逐步获得自决权利,再度行使某些主

权,其在保留地的地位,近乎国中之国。美国建国后一百余年间,印第安人未被赋予美国公民权,因有论者以此作为美国社会漠视人权的例证。征诸于史,即可知这种观点与实际情形有所出入而略显隔膜。还有意见认为美国不存在民族自治,而印第安人部落的政治地位,或许算是一种例外。下文便就这些问题略加讨论。

一、土著部落与美国的早期关系

欧洲白人到达北美以前,印第安人的政治状况如同其整个文化的情形一样,因部落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东部的易洛魁人政治组织相当发达,组成了五个部落参加的较稳定的部落联盟,制定一部影响深远的不成文宪法。西南部地区的许多部落,特别是普埃布洛各部落和纳切兹人,亦具备颇为完善的社会政治系统,部落政府乃是权力的核心。而大平原及西部其他地区的许多部落,则内部极不统一,众多的氏族和胞族分散行动,部落之名仅以语言和文化特征来加以确认。后来列入五大文明部落的克里克族和奇卡索族,在1500年前后,也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部落。在与白人移民发生接触后,由于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许多土著人群内部的凝聚力急速增强,作为政治实体的部落相继形成。

就一般情形而言,一个土著部落即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实体。它拥有相对固定的狩猎地和活动地域,以部落大会(欧洲人称之为council)为领导机构,有的部落还推选出专司战争的军事首领,处理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可依习惯法或习俗行事,宗教事务则由祭司或巫医掌管。部落政府的决策权,在对外和、战问题和对内迁移祭典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土著部落在行使主权上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可见之于早期欧洲人的有关记载之中。

有的论著在涉及英国向北美的殖民扩张时,通常指责英国人对印第安人主权加以漠视和践踏。这种观点与史实并不完全吻合。事实上,英国殖民者一开始对土著部落的性质缺乏了解,习惯于以欧洲的政治概念来对待,把部落当成王国,称有实力的部落首领为国王。起初的移民活动,多经与当地部落交涉;所占之地,名义上亦以购买或割让形式取得。英国政府在处理与土著部落的关系时,完全采用外交方式,通过订立条约来取得土地和贸易特权。英国当局经常派出使节巡访各部落,赠送礼物以示友好,并就保护白人贸易商人和处理土地纠纷进行谈判。1608年克里斯托夫·纽波特代表英王出使弗吉尼亚,向当地部落首领波哈坦赠送礼物,其中包括一顶铜制王冠。英国人对波哈坦以国王相称,而波哈坦也自认与英王地位平等,不肯屈驾前去接受礼品,要求纽波特到其住所晋见。英国人只得照办。(1)后来移民领袖约翰·罗尔夫与波哈坦的女儿结婚,英王以为这是与一位公主联姻,须由英国王室过问,因此而颇感不快。这些事迹表明,英国殖民当局并没有完全无视土著部落的主权。

美国建国后,在处理与土著部落的关系时,大体上援引殖民地时代的成例。美国政府把部落当成主权实体对待,称较大的部族为“nation”。《联邦宪法》在提及与印第安人的贸易时,和其他外国相提并论。联邦政府禁绝各州插手印第安事务,将管理职权赋予负责对外战争事务的陆军部。美国向有关部落派驻代表,其职能与驻外使节相近似。有关土地、贸易和司法问题等具体交涉,美国仍采用英国人留下的办法,与土著部落谈判签订条约。条约方式乃是“文明”国家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手段,其基本形态是见诸文字的条约文本;而印第安人当时既无文字,更无与条约相关的任何国际法观念,美国便得以上下其手,把条约作为欺诈掠夺的工具,使印第安人蒙受沉重的损失。条约的签订多有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作背景,其过程充满欺骗蒙哄和威逼利诱,条约规定只对部落一方具有约束,而美国则可任意随时践踏、违背和修改。美国与各部落之间的条约共374项,(2)正是通过这些条约,印第安人逐渐丧失大部分土地和独立自由的权利,部落地位也因之一落千丈。

但无论怎样,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土著部落处于近乎“外国”的地位;印第安人并未受到美国的政治控制,而是美国政治体系以外的居民;因而在制订《联邦宪法》之时,绝对不

可能考虑到印第安人的公民权问题。倘若“开国之父”们竟慷慨赋予土著居民以美国公民权，则反而是对部落主权的根本蔑视和践踏。

大约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土著部落的地位陷入难于摆脱的困境，无论对印第安人抑或是美国政府，都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白人社会的发展扩张，移民源源西去，美国的地域趋于不断增大，原来存在于白人社区之外的部落，有一些已陆续陷入白人的包裹之中，其活动范围与美国疆土交错混合，由此便引出主权上的纠纷。如继续把部落视为主权实体，在美国则等于承认部落为国中之国；如否认部落的主权地位，即意味着印第安人须服从美国的法律，这对印第安人自然是不能接受的。这一令人困扰的问题，由于佐治亚州与切罗基族的冲突而变得日益尖锐，迫使美国政府寻求合适的解决途径。

切罗基族长期生活于美国南部地区。为了在白人文化的侵逼之下求得生存，该族主动吸收白人文化，采纳白人生活方式，走上定居生产的道路，并发明本族文字，出版报刊，社会和经济生活均呈一派繁盛景象。根据与美国所签定的条约，切罗基族在佐治亚一带享有独立和主权。1829年其领地发现金矿，佐治亚州当局宣布金矿为州所有，切罗基人不得开采。而同时约有3000名白人擅入采矿，捣毁切罗基人的栅栏和住房，偷盗其牲口财物。佐治亚州当局刻意逼迫切罗基人迁出州境，因之百般蹂躏其主权。切罗基部落政府在白人同情者的引导下，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代表法院多数意见做出判决，形成部落与美国关系史上两个原则性的判例，即“切罗基族诉佐治亚州”和“伍斯特诉佐治亚”两案。这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对部落地位所做出的新的解释。

马歇尔在判词中指出，印第安人与美国的关系，属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一种特殊类型：一个部落对美国来说，既不是“外国”，又是拥有特定地域和独立主权的“nation”；（3）某一州的法律不能在部落领地内生效，处理与印第安人的关系的职权乃系联邦专有；说到底，部落乃是既非独立又非从属的“nation”，它们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属于“国内依附族群”（domestic dependent nations），类似“被监护者与监护人”的关系。（4）

马歇尔对部落地位的解释陷入文字游戏的迷网，其矛盾性是一望便知的。这种解释一方面极力否定部落属于“国中之国”的状况，同时又不能不承认部落拥有独立主权的现实。马歇尔想用“国内依附族群”这个新创的概念来限定部落与美国的关系，反映出美国政府在这一难题上的理论困惑与混乱。

但是，马歇尔的判决有美国政府的强大实力作为后盾，其所确立的是一种“被监护者与监护人”的关系模式，并使殖民地时期便一直存在的“父权主义”（paternalism）获得法理上的意义。自英国人入主北美始，即有土著部落称白人为“父亲”，而白人使节则称印第安人为“我的孩子”。（5）美国承袭这种“父子”称谓，逐渐把它发展成一种相互关系的缩影。印第安人对美国总统称呼“伟大的父亲”，于是，他们便成了美国的“依附子女”，需要加以监护和引导。马歇尔在提出“国内依附族群”的概念时，这种“父—子”称谓模式就是他的基本依据之一。按照美国政府的理解，印第安人在获得“文明开化”从而与美国白人达成平等之前，是不能很好地处理自己的事务的，美国可依其意志来确定何者对他们有益，以及他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所以，“被监护者与监护人”的关系模式的提出，为美国政府和白人社会夺占部落土地和对印第安人推行“文明开化”，作了理论上和法律上的铺垫，也给后来部落主权的沦落，埋下了伏笔。

二、美国政府对部落主权的剥夺

美国政府和白人社会以单方面的意志对印第安人实行“开化”和同化，依照白人模式来重新设计印第安人的形象，其最终目标是将他们改造成为美国公民。部落制被视为野蛮落后的象征而遭到美国的强烈攻击。在白人心中，部落主权乃是“文明开化”的障碍，因为印

第安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即以部落为依托而存在,美国如能完全控制印第安人,其由狩猎状态向文明生活的转变,便会更为容易而顺利。詹姆斯·门罗总统在第二次年度咨文中即表露过这层意思。(6)但要完全控制印第安人,首先必须超越部落主权。再则,将印第安人改造成美国公民的目标,也是与部落主权不能两立的。从这种种情势看来,打破部落制,使印第安人个体化,乃是美国必然采取的步骤。

对部落主权的剥夺,是以武力的征服为先导的。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的部落,由于与白人接触较早,继而相互往来杂处,感染白人的疾疫,人口急剧减少;加以白人社会的蚕食鲸吞,其活动地域逐渐缩小;在易洛魁联盟被打败和五大文明部落被迫西迁之后,整个东部能以武力与白人社会抗衡的部落,便不复存在。从19世纪初开始,这个地区的部落或接受保留地制度,或散居于白人社区中而丧失部落地位。与此同时,随着移民的西去和美国疆域的拓展,西部印第安人成为美国社会关注的对象。在大平原地区,美国印第安人中最骁勇善战的部落,如苏族、科曼奇族、夏延族、阿帕奇族诸部落,持枪策马,出没无常,不断袭击边疆定居点和移民队伍。于是,西部印第安人便被美国视为向西扩张的严重障碍,而不得不诉诸武力。战争始于内战期间,一直延续到19世纪70年代。分散游击的各个部落,自然不能与有强大物质力量作为支撑的美国军队相对抗;加上大平原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野牛,遭到白人职业猎手的浩劫,西部的“印第安人战争”便以美国胜利而终局。各部落被相继打败,被迫迁入美国划定的保留地。这些保留地多位于西部贫瘠荒凉的地区,边界确定,周围建有军事要塞,印第安人不得随意出入;美国在保留地设立管理处,对保留地事务进行严格控制。保留地一方面把印第安人与白人社区隔离开来,同时又担负“文明开化”的功能,迫使保留地印第安人采纳白人的生活方式。这时印第安人传统的经济活动已难以为继,生活物质须依赖美国政府的配给供应,部落政府在传统上所拥有的两项主权,即率众狩猎和决定战、和,均不能行使,印第安人已失去了自由、独立和尊严,处于美国的完全控制之下了。部落政府仍然存在,其主权的象征,仅剩司法权一项:凡在保留地范围内所发生的刑事或民事案件,不受所在州法律管辖,而仍由部落处理。

到1871年,土著部落在名义上享有的主权实体的地位,亦因美国政府终止与之签订条约的作法而被废除。对于与部落缔约的办法,美国社会一直存在非议。安德鲁·杰克逊在出任总统之前曾发表议论说,印第安人乃是“美国的臣民,他们并没有独立的主权”,因而不能与美国签订条约。(7)内战期间有人尖锐地指出,美国既不允许印第安人行使作为一个“nation”的任何主权,同时又拿他们当“nation”对待,实在不合政治规则。(8)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缔约本是“文明国家”之间的事情,美国虽与印第安人缔约,但却不能遵守条约规定,导致毁约和战争,然后再订约、再毁约、再战争,如此恶性循环,“每一次都给这个国家增添耻辱。”(9)因此,要求废止与部落缔约的作法和呼声,一直不绝于耳。时至19世纪70年代,绝大多数部落都被美国征服,印第安人实际上已经处于美国的控制下,条约作为美国剥夺印第安人的工具,其职已尽,可以废弃不用了。1871年3月国会在给负责印第安人事务的内政部的拨款法案中加入一条修正案,申明:“所有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族群或部落,不应被承认或被认为是独立的族群(nation)、部落或国家(power),不能与美国政府用条约方式建立关系;但此前已签订的所有条约中的规定,不得废除或损害。”(10)此后,美国政府与部落的交涉,均以协议和法令方式进行,至1940年,这类文件共约500余项。(11)

条约方式的废除,对美国来说,意味着处理与印第安人关系的一次重大转折;在印第安人方面,部落主权因美国的否认而受到致命的一击。此后,以“监护论”为基础,以“父权主义”为特征的“委托管理论”(trust theory),演变成美国政府处理与部落关系的主导原则。

“委托管理论”指的是美国政府受部落的委托,代部落管理印第安人的财产及其他事务。

“委托管理论”虽起源于马歇尔的“监护论”，但马歇尔所谓“监护”，并不同于对孩子和对精神不健全者的监护，而属于国际法中保护国和同盟关系的性质。（12）1871年以后美国政府对部落行使委托管理权，其前提则是把印第安人当成不能自治的孩子。事实上，部落从未明确赋予美国政府这种权利，在众多的部落与美国之间的条约中，至多只提及“保护”问题，所以，委托管理权之于美国，乃是自我授予的。虽然从法理上说，各部落是美国的永久监护对象，但最终确立委托管理原则的，是1877年联邦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这项判决宣布印第安人对其土地没有所有权，美国政府有权任意处置印第安人的土地，因为“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是出于正义的考虑而行使的，而这种正义，则支配着一个基督教民族对待一个愚昧和依附的种族的态度。”（13）委托管理原则一经确立，则深远地影响着美国的印第安人政策，特别是在《道斯法案》生效后，印第安人所获得的份地，均按这一原则而由美国政府托管25年，而被解散的部落政府原来拥有的财产，亦以托管的名义落入美国政府的掌握之中。“委托管理论”最大的危害于此已暴露无遗：它剥夺了部落对其土地和财产的控制权，实际等于斩断了部落政府的一条臂膀。

部落政府的另一条臂膀，也随美国政府强化对保留地印第安人的司法控制而流于无形，作为部落主权象征的司法权，因而不复存在。大致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社会对于美国法律是否对保留地有效的问题，发生日益浓厚的兴趣。仇恨印第安人的人，早已对保留地的特殊地位和印第安人占有的最后一点土地颇为觊觎，急切地要求开放保留地，使印第安人服从于美国的法律；主张迅速同化印第安人的改革派，也赞成对印第安人施以美国法律，他们的理由是，印第安人只有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才会感到劳动的意义，才会有兴趣像白人那样生活。（14）在这种有利的舆论背景下，国会于1885年制订《七种重罪法》，剥夺了除五大文明部落外的所有部落针对重大犯罪的司法权，凡保留地发生的重大犯罪，无论是否涉及印第安人，均须由联邦地区法院审理。（15）稍后，联邦最高法院在一项判决中，对国会从司法上干预部落事务的做法表示支持，认为国会拥有任意干预部落事务的权力。这就是所谓“任意权力原则”（plenary power doctrine），后来成为美国政府处理印第安人事务的又一重要工具。1898年，国会制订《同化犯罪法》，规定印第安人不仅要服从美国法律，而且须受所在州的法律的支配。同年的《柯蒂斯法》对向来享有自治权的五大文明部落开刀，取消其部落法庭，宣布部落法在联邦法庭不能生效。至此，美国最终完成对部落司法权的剥夺。

土著部落所受到的另一次更沉重的打击，来自1887年的《道斯法案》。这个以部落土地私有化和打破部落制为核心内容的法令，经过改革派多年的争取，乃是作为最后解决所谓“印第安人问题”的重大举措而出台的。法令规定，在所有适合农耕和放牧的保留地实行份地分配制，把原来由部落共有的土地分配给印第安人个人，经25年的托管期后，印第安人可获得份地的绝对私有权，同时得登记为美国公民。（16）这项法令对部落的冲击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它否认部落对其土地的支配权，使部落土地大量流失；二，它忽视部落的合法地位，把部落排除在对印第安人个人财产的管理之外；三，它以授予部落成员公民权的方式，预告部落退出历史舞台的不幸结局。因此，这个法令遭到许多部落的抵制。但是，不论印第安人采取何种态度，份地分配活动很快在各个保留地开展起来。

可见，经过武力征服、保留地制度、废止条约方式和份地分配运动，土著部落遭受一次又一次重创，由原来的主权实体演变成被监护对象，进而丧失司法权、财产管理权和土地权利，失去对其成员的政治控制，沦入名存实亡的状态。美国政府虽然没有在任何一项法令中明文宣布废除部落，但其实际对待部落的措施，却一步一步导向对部落制的毁灭性打击。1906年的国会两院联合决议中，尽管仍然承认部落政府，但同时将部落官员的任免权正式授予美国总统。此时，部落政府的存在，完全只具有象征性了。

三、印第安人的公民权问题

美国政府和白人社会既以将印第安人改造成美国公民为目标,因而在剥夺部落主权的同 时,便着手授予印第安人公民权。待部落制被基本打碎之后,全面授予公民权的时机亦告成熟,印第安人在一夜间俱悉成为美国公民。

早在1855年,美国国会即授予怀恩多特人公民权。1861年和1887年又分别使波塔沃托米人和基卡普人成为美国公民。1869年的美国宪法第15条修正案宣布,不得以种族、肤色或以往被奴役的情况而否定任何美国公民的投票权。该法暗含的指向,众所周知仅是被解放的黑人。但是,谁也未曾料到,1880年居然有个印第安人对这一修正案发出挑战。长期居住在 内布拉斯加的苏族人约翰·伊尔克,早已与原来的部落脱离关系,且在白人社区找到了工作。他自认有资格享受投票权,但在登记时却遭到拒绝,当局不承认他是美国公民。伊尔克遂上诉最高法院,理由是 根据宪法第15条修正案,他理当享有公民权。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对此做出如下解释:印第安人出生于美国主权所辖范围之外,首先是属于部落的;而部落则是非美国的实体,美国政府没有为他们制订归化程序,故一个印第安人不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而且,确定印第安人是否获得“文明开化”,从而有资格享有美国公民的特权和责任,不能根据印第安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而只能由美国来做出决定。(17)这个判决把印第安人与其他移民或民族区别开来,强调必须经美国的特别程序,印第安人才能获得公民权。1887年的《道斯法案》,把公民权与经济状况联系起来,对25年托管期做出规定,目的在于确定印第安人是否能够在经济上自立,有能力承担公民的义务和行使公民的权利。但是,这种在土地权利和公民资格方面的有限的慎重,为1905年最高法院的一次判例所抛弃。判词宣称,印第安人在获得份地之日即是美国公民,而不必等待25年的托管期满。国会于次年通过《伯克法》,重申以25年为授予公民权的期限。1916年,最高法院也推翻从前的判决,延缓授予公民权的进度。(18)

美国政府对授予印第安人公民权表现出犹疑反覆和举棋不定,主要是由于公民权问题并不简单等同于打破部落制,而涉及多种至为重要的环节。首先,作为公民对权利的享受和对责任的承担,必须具备相应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拥有与之相称的政治素质和经济能力;如果不给予充足的时间来加以准备,印第安人必定不仅不能承担公民责任,也不会享有公民权利。亨利·潘科斯特在《道斯法案》通过之前就提醒人们:“未经提醒和准备就立即宣布全体印第安人为公民,这种想法乃是鲁莽和不切实际的”,因此,在他们成为公民之前,至少应当具备适合公民责任的起码条件。(19)1906年,印第安人事务局局长弗朗西斯·勒普针对个别授予公民权中出现的问题说:“经验证明,公民身份对许多印第安人来说都是不利的。他们既不适合承担公民身份的义务,也不能享有其优越性的好处。”(20)由此可见,人们已经看出匆促解决公民权问题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第二个问题则是公民权与监护权的关系,美国政府对此亦颇感棘手。从理论上说,印第安人既已成为公民,便与其他美国人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美国政府以往所行使的监护权,则自动撤销。但实际的情形却不是如此简单。授予公民权,不过是一个法律上的程序;而印第安人无论以何种身份存在于美国社会,他在文化上、血缘上和经济上,总是与一定的部落相关联。根据这一情况,最高法院在1895年的一次判决中申明,获得公民权的印第安人,仍旧享有美国与其部落所订条约中规定的权利,美国按照条约,仍须对所有印第安人,不论是公民还是被监护者,承担保护的义务。(21)1911年最高法院在另一案件的判词中对上述原则作了引伸:“没有能力的人,尽管是公民,或许也不会有控制其人身与财产的完整权利”,而且,“公民身份中并未包含与对印第安人土地的监护相冲突的东西”。(22)这些自我解围的说辞,暴露出美国政府在印第安人公民权问题上的矛盾之处:既明知印第安人不具有公民权所要求的素质和能力,却又从急功近利地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着眼,仓促轻率地授予公民权。这种政策上的矛盾和草

率,给印第安人造成许多难于弥补的损失和苦难。另外,与公民权相联系的还有一个政治参与问题。印第安人受其文化传统和社会经验的制约,大多不熟悉美国政治的原则和程序,即使拥有选举权,也不可能顺利地参与政治活动,更何况白人社会还人为地设置多种障碍。科罗拉多、蒙大拿、内布拉斯加、俄勒冈、南达科他、怀俄明等州仅允许获得公民权的印第安人参加投票;明尼苏达、北达科他、加利福尼亚、俄克拉荷马、威斯康星等州则要求印第安人必须先采纳“文明生活”后,才能获得投票权;爱达荷、新墨西哥、华盛顿等州在宪法中写明,只有纳税者方得享投票权,而印第安人多不纳税,故被排斥在外;亚利桑那、内华达、犹他等州的规定更严格,参加选举者必须同时是纳税者、本州居民和公民,三者缺一不可。(23)上述各州均为印第安人人口最多的州,它们有关选举权的规定,把绝大多数印第安人拒于美国政治的大门之外。

在没有为上述问题找到切实的解决办法之前,美国政府并未停止授予印第安人公民权的工作。获得公民权的人数,1890年为5307人,1900年为53168人,1901年为101506人;迄于1905年,约有半数以上的印第安人成为美国公民。(24)1916年大选前夕,内政部长富兰克林·莱恩为给威尔逊总统争取选票,在南达科他、北达科他、怀俄明、俄克拉荷马、亚利桑那、新墨西哥诸州突击授予土著居民公民权。这年夏天,美国报纸上有关授予公民权仪式的报道,随处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少印第安人离开保留地,或参加美军赴欧作战,或在军工企业中工作。1919年11月,国会立法规定,凡在一战中服役的印第安退伍军人可申请获得公民权,同时不影响他们对部落财产的占有权。(25)1924年国会通过《印第安人公民权法》,宣布:“在美国境内出生的非公民印第安人,就此宣布为美国公民:兹规定,授予这种公民权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或影响任何印第安人对部落或其他财产的权利”。(26)美国政府就这样匆忙地把全体印第安人都变成了美国公民,不问印第安人对此作何反应,也不管此举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后果。《纽约时报》当时作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评论:“如果印第安人中间存在嘲讽意识的话,他们或许会带着苦笑接受有关他们新的公民身份的消息。白人在夺走他们的整个大陆之后,在设法剥夺他们的行动自由、社会习俗自由和信仰自由之后,现在终于赋予他们与其征服者同样的法律地位。”(27)

但是,《印第安人公民权法案》并没有给印第安人的公民权问题划上句号,也没有给土著部落地位作出最后的结论。事情的进展不仅出人意料之外,而且使上述两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四、部落的兴衰与印第安人的命运

在对待公民权与政治参与的态度上,印第安人与黑人之间形成有趣的对照。后者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奋力争取选举权和社会平等,要求与主流社会在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上消除差别。而印第安人则不然。当得知美国政府正式授予全体印第安人公民权时,除混血种人表示欢迎外,纯血统的印第安人心怀疑惧,担心这又是美国政府摧毁其传统价值的新措施。有的部落组织比较完整的族群,如易洛魁人,一直不承认美国为监护者,自认是与美国地位平等的主权实体,因而拒不接受美国公民权,对美国政府的做法提出强烈的抗议。导致两个种族在政治与社会取向上的这种差异,固然有文化传统与社会经历背景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最具特点的是,印第安人属于部落,而黑人则早已卷入主流社会。部落的存在,对于印第安人则意味着有政治上的依托和文化上的归宿;部落实际已成为印第安人社会演进连续性的载体,成为印第安人传统的象征。对以群体为本位、以财产共有为基础的土著社会结构来说,部落是一个核心;而对具体每一个印第安人而言,部落则是一种保护、一个避风港和一个文化认同的标志。美国政府未能理解部落在印第安人历史和文化中的这些重要性,以种族利己

主义为指针,以文化偏见为出发点,欲毁灭部落制而后快。这一政策给印第安人造成的苦难和不幸,乃是众所周知的。

打破部落制所产生的一个长远的后果,便是土著社会演进的阻断和社会结构的瓦解。在1500年左右,美国境内的土著部落仍处于石器时代,其经济生活的基础是渔猎采集等直接占用资源的活动,农业只在少数部落占有一席之地;以血缘为纽带的民族,乃是土著社会结构的核心,由氏族结成的部落,则是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印第安人的经济和战争活动,一般都在部落的支持下。对土著社会来说,除战乱和饥馑的侵袭外,其日常生活可谓平静有序。白人的来临,使土著社会自身的演化逻辑遇到严峻的挑战。白人在社会与文化上,与印第安人迥然有异,而且据有绝大的技术和组织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在生存竞争中陷印第安人于不利境地,而且促成白人社会滋生强烈的文化偏见和种族优越感,一心要按照自身的模式来改造土著社会与文化,否则即使印第安人横遭灭绝。作为土著社会与文化核心的部落制,便首当其冲。美国政府和白人社会剥夺部落主权,限制部落政府的活动,迫使印第安人脱离部落而实行个体化,其结果是:土著经济生活发生崩溃,印第安人陷入极度的贫困化;部落政治功能丧失殆尽,部落成员处于失控散漫状态,或遭美国政治系统的排挤揉捏,在政治上居于极为尴尬的地位;传统的生活习俗受到禁止,许多部落的语言竟至失传;所有这一切,使土著社会和文化不能整合,流于破碎混杂,其自身变迁的进程失去了连续性。

土地的流失则是打破部落制给印第安人带来的最直接的损失。1500年时,各部落的狩猎和居住地域都甚为广阔,欧洲人到来后逐渐压缩,经过美国对西部移民和开拓以后,其土地面积已不足以维持传统的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1881年,也即美国政府打破部落制,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前夕,印第安人共有的土地仍有155632312英亩,但由于推行份地制和分割部落土地,到1900年,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仅为77865373英亩,约有一半的土地已易主他人;到1930年,更减至4800万英亩,仅为《道斯法案》生效前的1/3。(28)按照传统,印第安人的土地是以部落共有方式占有的,部落的存在,对土地权利便是一种保护。美国政府执行土地私有化政策,在分配份地时,便将剩余土地低价购得,然后开放给白人;印第安人在获得份地后,多不善经营耕作,也未形成私有制的观念,故其土地或出租或出售;部落共有制被打破后,印第安人的土地因此而大量损失。

而且,摧毁部落和授予公民权,不仅未能改善印第安人的处境,反而导致他们生存条件的急剧恶化,给他们造成深刻的文化危机。印第安人多年来以部落为单位而生存,他们的力量和精神寄托都有赖于群体,美国政府的政策强行剥夺部落对他们的保护,而他们被抛入的却又是与其传统截然不同的美国主流社会,他们因之而无所适从,本来即很恶劣的生存状况,进一步急剧恶化。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印第安人以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劣势的工艺技术,根本不能适应美国社会,也无法与白人平等竞争。没有了部落的保护,他们的财产被白人巧取豪夺,他们无力在白人社会寻找工作和安身立命,在政治和社会上饱受歧视,在经济上则一贫如洗。切罗基人的遭遇便可作典型例证。切罗基人从18世纪末开始主动吸收白人文化,虽然经受1830年代迁移的打击和1860年代内战的冲击,其社会仍然日趋繁荣,人口有所增加。他们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即在于有部落作为依托和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利。可是,从189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逐步取消其自治权,并于1907年俄克拉荷马建州之际,废除部落制,此后,切罗基社会迅速衰落,原来在部落时代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付诸东流,一度在文化上和物质生活上与边疆白人相上下的切罗基人,竟沦为所有土著居民中最贫困的人群。(29)切罗基人的由盛而衰,与部落地位的变动息息相关。对于那些早已在保留地制度下备受折磨的部落,公民权利带来的大多是新的灾难。还在美国政府决定授予印第安人公民权时,人类学家赫伯特·斯平登就曾满怀忧虑地预言,赋予印第安人公民权,很可能只会使他们获得一些“含糊的权利”,而给其他一些人带来“更大的利益”。(30)他的话不幸而言中。

所以,对印第安人来说,利害攸关的不是美国公民权,而是部落存在的权利;不是政治上的平等,而是政策上的特惠。如果忽略印第安人特殊的社会文化状况和历史遭遇,从纯粹的理论演绎出发,将公民权的获得与否作为印第安人人权状况的主要指标,则不免无的放矢和于史无征。实际上,20世纪美国流行一种歧视印第安人的种族主义情绪,即是以平等为口号的,要求印第安人与其他美国人享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责任,遵守同样的法律。(31)这种主张因其置印第安人的特殊情况于不顾,故不为明智之士所取。

历史事实业已证明,部落的兴衰与印第安人的命运之间,存在一种休戚与共唇齿相依的关系。打破部落制,不顾历史和文化的制约而强迫实行个体化和私有化,带给印第安人的只有灾难。这一现实激发印第安人的抗议,也促使美国政府决策层重新考虑对印第安人的政策。部落地位遂得以复兴。1934年,国会制订《印第安人改组法》,宣布停止实行份地分配,承认土著文化的价值,恢复部落制,帮助印第安人重建部落政府。(32)不过,这次所恢复的部落制,其中融入了许多现代因素,重建的部落政府亦与传统模式相去甚远。现代部落制具有较高的组织性,其功能则不再以主持狩猎和战争为主,而涵盖印第安人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处理。部落政府按照美国的政治模式进行建构,拥有成文宪法,官员以选举方式产生。

但是,《印第安人改组法》并不能一劳永逸地维持部落制的合法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化思潮再度主导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终结联邦对部落的特惠政策,解散部落以使印第安人成为完全的美国公民,这样的措施一度付诸实施,再次对部落的地位造成威胁。另外,从50年代开始的把印第安人安置在城市的运动,也使部落控制的人口有所减少。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政策上的反覆到60年代末便获扭转。印第安人争取自决的活动,亦渐有声势。1975年,国会通过《印第安人自决和教育援助法》,宣布在保持联邦与部落特殊关系的前提下,赋予部落政府参与联邦涉及印第安人的政策的制订和执行,鼓励部落自己管理有关保留地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的项目。(33)至此,文化多元主义最终取代种族同化而成为美国政府印第安人政策的精神原则,部落的合法地位方获得可靠的保障。

然而,部落制的恢复和自决运动的进展,却同时给印第安人的政治地位带来困扰。据美国民权委员会1961年的一份报告说,“印第安人拥有三重法律人格:(1)他是一个部落成员,与部落生活保持文化上、社会上、经济上、宗教上和政治上的联系;(2)他是联邦政府的‘被监护人’;(3)他是拥有其他公民所享有的大部分权利和特权的公民”+[(34)这种多重身份,带给印第安人的并非益处。作为部落成员,他们被主流社会视为特殊群体;作为美国政府的“被监护人”,他们难以享受真正的自决和自治;而作为美国公民,他们不能在美国社会立足。对美国政府而言,印第安人的复杂身份,时常意味着政策上的烦难。因为印第安人以部落而存在,故必须许以自治;因为他们是“被监护者”,又必须进行特殊的照顾和援助;而同时他们也是美国公民,还须使之服从于美国宪法的原则。如何在这三者之间保持平衡,一直是令美国政府困扰的问题。1968年,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之下,美国国会制订《印第安民权法》,本意是将美国宪法前10条修正案的原则平等施于印第安人,但一些部落则以其干涉部落主权而加以抵制,使得联邦最高法院不得不在1978年的一项判决中,提出用部落习俗和传统来解释民权法,使该法与自决趋势调和起来。这个插曲反映了美国政府在部落地位和印第安人政治身份这一问题上的困境。

据有关资料,1980年美国印第安人部落获官方正式承认者有504个,另有100余个人群的部落地位尚待联邦认可。(35)每个部落均据有土地,设立政府,制定宪法,对保留地内的各项事务拥有决断之权,并通过各种途径参与联邦有关印第安人的决策。一块保留地算得上是一个小小民族自治区。不过,这种自治区在程度上是有限制的。联邦印第安人事务局仍然是保留地的最高管理机关;而且,印第安人既然在经济、教育、医疗、福利、就业等各方面依赖联邦援助和关照,也就决无可能享有完全的自治。

今天回顾历史,可以体会出美国土著部落兴衰中所包含的种种深沉意味。美国政府和白人社会囿于种族主义和文化偏见的樊篱,服从短期的和利己的实际需要,一意孤行地消除其以为落后和野蛮的部落制,把部落成员改造成美国公民,却从未意识到,他们所反对的事物,正是印第安人生存发展的保障。经过几番周折,一切都不得从头起步。在这一场由美国政府和白人社会导演的悲剧中,印第安人所受损失之巨,所遭创痛之深,已非一般言辞所能表述。

注释:

- (1) Wilcomb Washburn, *The Indian in America*,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5, p. 80.
- (2) Peter Nabokov, ed., *Native American Testimony: An Anthology of Indian and White Relations*,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8, pp. 149-150.
- (3) 马歇尔在判词中“选皂 ation”界定为“与其他人相区别的人民”,也即说“nation”用于印第安人时,仅是一个人群单位,而非“国家”的意思。
- (4) Francis P. Prucha, ed., *Documents of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 pp. 58-62.
- (5) Thomas D. Clark, ed., *The Great American Frontier: A Story of Western Pioneering*, Indianapolis, 1975, pp. 134-135.
- (6) James Richardson, ed.,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New York, 1896, Vol. II, p. 615.
- (7) Arrell M. Gibson, *The American Indian: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Lexington, 1980, p. 305.
- (8) (9) Francis P. Prucha, *The Great Father: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India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4, p. 528; p. 529.
- (10) Prucha, *Documents of United State Indian Policy*, p. 136.
- (11) Nabokov, *Native American Testimony*, p. 150.
- (12) Sandra Cadwalader, et al., eds., *The Aggressions of Civilization: Federal Indian Policy Since the 1880's*,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99.
- (13) Cadwalader, *The Aggressions of Civilization*, p. 200.
- (14) Prucha, *The Great Father*, p. 677.
- (15) Prucha, *Documents of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p. 168.
- (16) Prucha, *Documents of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pp. 171-174.
- (17) Roger L. Nichola, ed., *The American Indian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1981, p. 195; Frederick E. Hoxie, *A Final Promise: the Campaign to Assimilate the Indians, 1880-19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75.
- (18) Nichols, *The American Indian Past and Present*, pp. 199-200.
- (19) Prucha, *The Great Father*, p. 682.
- (20) Prucha, *The Great Father*, p. 875.
- (21) (22) Hoxie, *A Final Promise*, p. 214; p. 216.
- (23) Hoxie, *A Final Promise*, pp. 232-234.
- (24) James S. Olson, et al., *Native Americ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4, p. 73.
- (25) Prucha, *Documents of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p. 215.
- (26) Prucha, *Documents of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p. 218.

- (27) Gibson, *The American Indian*, p. 534.
- (28) Olson, *Native Americ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73, 83.
- (29) Sam Stanley, ed., *American Ind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uton Publishers, 1978, pp. 413-415.
- (30) Olson, *Native Americ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85.
- (31) Indian Tribes: A Continuing Quest for Survival; 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1981. 6.), p. 1.
- (32) Prucha, *Documents of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pp. 222-225.
- (33) Prucha, *Documents of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pp. 274-276.
- (34) Gibson, *The American Indian*, p. 565.
- (35) Kenneth Lincoln, *The Good Red Road: Passages into Native America*,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7, p. XVii.

《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

竞争性的相互依存

——冷战终结前后的美日关系

朱文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战后40多年的美日特殊关系是建立在共同遏制苏联扩张的基础上的。冷战格局的消失给它们的特殊关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仅两国间原已存在的矛盾和摩擦更加激烈,而且它们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重新界定自己国家利益时,又产生了新冲突。1989年夏两极格局开始崩溃以来,美日关系的发展就是它们在上述摩擦和冲突中努力为特殊关系寻求新基础、确定新涵义的过程。

本文讨论的主题是1989年夏东欧政局剧变至1993年1月美国总统布什任期结束这一段时间内的美日关系。为了更清楚地描述其变化,我以1990年8月海湾危机爆发和1991年苏联“八·一九”事件为界,把这一时期美日关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来论述。

一、两极格局开始瓦解与美日战略的调整

1989年夏,随着东欧政局的剧变,东西方对抗的两极体系开始瓦解,美日共同对敌的需要逐步消失。在这种背景下,美日两国先后展开了调整双边关系的努力。

1. 日本外交的调整 东欧剧变开始后,日本各界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一方面,日本担心随着苏联威胁的减弱,日本作为“经济挑战者”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日本舆论称美苏和解对日本形成了“一种使人喘不过气来的沉重压力”。(1)东欧的变化使日本“失

去它作为自由世界边界捍卫者的重要意义”，美国就“不大能容忍日本的经济扩张了”。(2)一时间，30年代美日对立的历史“将以相似的形式重演”，“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正在发生质变”，“美国会单方面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等说法充斥日本报章。

另一方面，日本一些人士认为世界格局的变迁给日本提供了成为“乱世英雄”的机会，认为日本在世界上发挥一极作用的时代已经到来。日本青山学院教授伊藤宪一声称：“在这一信息革命时代，日本似乎是拥有最大、最佳的国力源泉的国家。”(3)日本国际政治学者舛添要一扬言：“日本在经济与科技上占有优势，因此它谋求军事优势也不困难”。只要及时“输出日本文化”，就可能称雄全球。(4)

总之，在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中日本既看到了风险也看到了机会。凭借80年代积聚起的堪与美国抗衡的经济实力，他们希望能够填补苏联势力衰竭造成的真空，参与国际决策。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日本还无法单凭自己的力量建立霸权，而80年代日美关系已渐趋恶化，这同样要求日本迅速行动，防止美国抛开自己，独享霸权。为了免作“世界孤儿”，也为了迎接“日本时代”，以1989年8月海部俊树出任首相为契机，日本再次掀起了走向政治大国的高潮。在世界各国尚全力处理苏东变化带来的具体问题时，日本抢先提出了关于未来国际秩序的构想。1989年12月，日外务省即制订了新的“外交基本方针”，称东欧的变化为“建立新国际秩序提供了可能”，强调“日本作为以经济实力和力量作后盾的国际秩序主要责任的承担者，要更加积极地参与旨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国际合作”。1990年1月，海部在访欧前发表致布什的亲笔信，正式提出“必须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而日本“将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积极的贡献”。(5)

值得注意的是，海部外交构想涉及日美关系时表现出彼此冲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该构想相当强调对美的独立性。日外务省事务次官栗山尚一在撰文阐述该构想时就公开表示：“日本把美国所支撑的秩序视为理所当然要遵守的秩序并依赖于这一秩序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已进入日本自己决定所负国际责任的时期”，日本必须尽快从“被动外交”转变为“主动外交”。(6)另一方面，海部构想又将发展日美全球伙伴关系视为谋求大国地位的核心手段。1990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把日本外交的重心放在全球范围的日美合作上，强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重要的还是日美关系”。海部在会见布什时也说美国将永远是世界各民主国家的领袖。

这种情况，反映出日本统治层在处理变化中的日美关系时存在的矛盾心态。日本谋求大国地位的最终目标是要摆脱对美的依赖，完全独立地发挥国际影响力。但日本统治层又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最简捷、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利用冷战中形成的日美特殊关系。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推行大国外交时而对美摆出独立姿态，但关键时刻又不得不对美作出让步和妥协。

2. 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 到了1989年夏，美国人也开始逐步认识到冷战和美苏对抗正在离开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国际经济竞争上。美国人开始以更严厉的目光审视日本，种种耐人寻味的新的对日观逐渐流行起来。其一，美国正在衰落，而日本是接替美国霸权的有力竞争者。1988—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论著《大国的兴衰》震动了朝野。它促使人们从历史的角度，以霸权交替的观点看待愈演愈烈的日美经济摩擦，把维护美日贸易平衡提高到维护美国霸主地位的高度。其二，经济安全已上升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日本对美的经济挑战是对美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国防顾问委员会在其1989年报告书中指出：美国再也不能单纯从军事方面考虑国家安全问题了，必须将经济利益看作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战略经济学家们警告说：美国可能“像拜占庭那样，屈从于自己的朋友”，“渐渐沦为这些朋友的保护国”。(7)《购买美国》成为当时仅次于《大国的兴衰》的畅销读物。作者在书中宣称：日本人“已经购买了美国的公司”，“美国的就业和福利受到外人控制”，这样“最终在关键的工业中消除美国的竞争力”。(8)其三，日本不是真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美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范·沃尔

弗伦在其著作《日本权力之谜》中称日本并非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更接近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所以美国同日本打交道的唯一途径，就是忘记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理论，“发起连珠炮式的攻击”。〔9〕美一学院在向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研究报告中更把日本人描绘为“一种永恒的、超道德的、操纵性的和有控制力的文化的产物”，将利用其经济力量“把它的文化和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10〕

这些修正派对日观逐渐影响了美国的对日政策。在1990年3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称：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一些国家正以“新的领导者”的姿态出现，对美国构成潜在的挑战。日本在经济和技术上与美国的竞争，可能“使盟友之间相互对立”。〔11〕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洛夫特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西方对西方的冲突”危险程度不亚于此前的东西方对抗。出于这种考虑，美国的对日战略出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在经济上推行“结构协商战略”。布什政府一改此前就美日经济摩擦中的具体问题逐项谈判、企图以规定贸易限额制止日本经济攻势的作法，转而将矛头对准日本的经济结构，提出了涉及日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传统各领域的六大要求，宣称美国同日本的这次结构协商“同过去对苏的历次军控谈判具有同样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次，在军事上，布什政府改变了美国80年代初一味要求日本扩军的做法，在继续鼓励日本分担防务负担的同时，开始注意将日本军力的扩展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布什在竞选中就说：“日本陆海空军兵力已同英、法、西德不相上下”，今后没有必要“压日本进行不必要的扩军”。199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国防部联合制订的“东亚战略计划”中明确表示，美国今后的对日政策是：促使日提高保卫1000海里海上交通线的能力但要抑制其战斗投入能力、要求日最大限度地从美进口武器装备及向美提供军事技术，同时控制日开发不能同美相补充的武器系统。〔12〕同年2月，美国防部长切尼在访问日本时明确表示，日本不需要大规模扩充军力，美不希望日成为军事大国。

与经济上的敲打，军事上的控制形成对照的是，布什政府在政治上对日更多地采取了安抚的政策。（1）接受日本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的要求，声称要与日在全球协调外交政策，在中南美、非洲等地采取“更加紧密的联合行动”；（2）支持提高日本在多边国际机构中的地位，建议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支持日本人在近年内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领导等；（3）鼓励日本参与欧洲事务，吸收日参加北约和欧安会会议，欢迎日参加援助东欧变革的国际财团。布什政府此举是基于对当时世界形势的判断。美认为尽管苏联、东欧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苏联的挑战仍现实存在，美苏将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互为主要对手”。〔13〕美国当时全球战略的重点在于推行超越遏制战略，推动苏联、东欧的进一步演变。在这种情况下，美仍需要日的全面支持和协助。因此美这一阶段的对日政策是在敲打日本的同时，适当地满足日参与世界事务的欲望，软硬兼施，将日走向政治大国的努力纳入美的战略轨道。

二、海湾危机与美主日从趋势的回潮

1. 日本政治大国外交受挫 到1990年夏，海部围绕“参与建设世界新秩序”实施的政治大国外交进展顺利。日美摩擦暂时缓解，海部出访欧洲、南亚均获成功，还受到了布什的称赞。不料，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的海湾危机突然打乱了日本的步伐。刚刚摆好大国姿态的日本外交一下陷入混乱状态，逐步沦为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守势外交”。

海湾危机爆发不久，日本追随美国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日本12%的石油由伊拉克、科威特供应，而且是伊拉克最大债主之一。日本经济界自以为已经做了不小的牺牲，美国却认为远远不够。8月15日，美驻日大使阿马科斯特警告说日本若不能在海湾危机中做出更多的贡献，日美关系会出现裂痕。〔14〕在美国的催促下，海部于8月29日宣布日本的第

一次中东贡献对策,答应向多国部队和前线国家各捐款10亿美元,并表示这已是日本所能给予的最大支持。日本的上述举动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美众议院9月12日通过决议,指责日本在危机中贡献最小,要求日本承担驻日美军的全部费用,还扬言要关闭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15)在此压力下,海部9月14日宣布了第二次中东对策,将捐款提高到40亿美元。美国仍嫌不够。民主党议员博尼亚称:“40亿美元不过是开始。美国在为日本的石油而战,它却那么冷静。”助理国务卿所罗门公开要求日本“提供人员和运输手段”。在9月底的日美首脑会晤中,布什也要求日“不仅出钱,而且还要流汗”,“在宪法容许的范围内更进一步进行有成效的合作”,暗示日向海外派兵。海部不得不违背自己在8月29日作出的不向海湾派兵表示,向布什承诺“不惜政治生命”,力求派兵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海部回国后,匆匆拿出了“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以平息美国的不满。

不料该法案遭到了空前强烈的反对。日本三大报社不约而同地发表社论,声称“日本国民已切实感到走到了十字路口”。日在野党在国会辩论中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日本各界反对派兵的集会、游行接连不断。自民党内部也出现了不同意见。11月8日,“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终成废案。美国对此大为失望。美舆论界严厉批评日本“实在不了解如何使自己的行为和别人协调一致”,“不可能分担哪怕一点点的世界领导责任。”(16)于是美国拒绝让日本参加关于多国部队开战时间的协商。日本得知进攻的时间比苏联还晚。

海湾正式开战,日本再度陷入穷于应付美国要求的境地。日本原来准备追加50亿美元捐款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不料在美国国会讨论对总统的战争授权时,先后有十几位议员借机敲打日本。民主党参议员渥斯指出“日本在海湾危机中提供的40亿美元资助,还不如索尼公司收购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出资额(约61亿美元)。这点钱还侈谈什么贡献?”以往对日友好的鲁格参议员也警告说,日本若表现仍不够好,在战争结束后要联系美日贸易纠纷算总帐。结果,日本被迫在1991年1月24日公布第三次中东对策,追加90亿美元捐款,并暗示在必要时可以派自卫队运输机帮助多国部队运送弹药。海部政府这一系列表现,给自己带来了“布什按钮”的绰号。海部的大国外交构想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FF 2. 美国“新秩序外交”中表现出对日轻视#FS 与海湾危机给日本外交带来的挫折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海湾危机给美国外交注入了一剂有力的强心剂,促成了美国冷战后全球战略的出台。危机爆发不久,布什即在美国国会宣布,“动荡时期过后可实现我们的目标——世界新秩序”。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取胜后,布什又为“世界新秩序”构想开列了四项原则,并自信地表示美国将努力“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自由、人权与民主制度盛行”的世界。(17)

海湾战争的胜利使美国人摆脱了对衰落的担心。许多著名人士纷纷对肯尼迪的学说发起反击。布热津斯基称:“关于美国成为没落帝国的说法未免言之过早。”约瑟夫·奈著书论述美国不仅在传统的力量资源方面仍保持着领先地位,而且美国在文化、科技、信息交流等方面的软力量“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国的领导地位很有可能会一直继续到21世纪。”

(18)经济安全将取代军事安全的思想也遭到了批评,取而代之的是依靠军事实力建立美国领导的议论。

重新获得自信的美国人开始以另外一种态度对待日本,对日疑惧为对日轻视所取代。有些人认为日本在海湾危机中无所作为,指责日是“纸上盟国”,“战后寄生虫”,声称日本不愿增加国防开支或过多卷入国际危机处理,使日无力成为新的世界霸主。(19)有些人嘲笑日本“继承着一个缺陷的文化,极其缺乏独立性、发明性和创造力”。约瑟夫·奈则断言日本“岛国的褊狭性对其软力量资源产生不利影响”,“日本似乎只能是一个单一性的大国,而不会成为与美争霸的新对手”。(20)“日本经济奇迹”也受到了批评。经济学家声称所有使日本公司生气勃勃的因素——终身雇佣制,不惜利润扩占市场,交叉控股制等都出了问题,日本的资本盈余可能在1995年之前就化为乌有。(21)

《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日本很快将成为一个净进口国,日本的储蓄率将下降,股票市场将崩溃。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似乎印证了这些预言。《华盛顿邮报》宣布:“日本世纪将告结束,日本正在走向衰落。”更有人直言不讳地提出:“现在是适当埋葬太平洋世纪的概念,并承认美国仍然是‘上升中的太阳’的时候了。”(22)

海湾战争使美国人对日美力量对比看法产生的戏剧性变化也感染了美国统治层。布什政府在推行美式新秩序构想的初期,有意无意地将日本冷落在一旁。至多把日本当作只负责提供资金而无政治发言权的“金库”。海湾停火后的一个月里,美英法加等国首脑频繁接触,磋商世界新秩序的安排。日本不仅被排除在外,而且原定于1991年3月进行的布什访日计划也被推迟。美国国会研究处提交的报告中甚至建议,鉴于海部在执行海湾对策时软弱无力,“对海部政权下的日本,没有必要强调全球合作关系。”(23)言下之意,由于美国已走出了霸权衰落的阴影,现在是日本有求于美国,美国完全可以拿出领导者的威严来。

3. 日本修补美日关系的努力 海湾危机结束后,日本统治层认识到凭借日本经济力量,自然而然地成为日美欧三极主导中的一员的设想过于乐观。由于危机暴露了日本外交的弱点,损害了日美双边关系,日本在美式新秩序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日本外务省为摆脱对美外交的被动局面,提出把“扩大日美全球伙伴关系”作为1991年日本外交的首要课题。在布什暂时无意访日的情况下,中山外相、海部首相先后主动赴美,谋求“重新构筑”日美相互信赖的关系。对于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构想,日本更是从各个角度予以支持,并积极调整日本原有的国际秩序构想,向美式新秩序靠拢。1991年4月,日本政府制订了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的四项原则,与布什“重视人权和民主”的世界新秩序构想相呼应,将受援国“实行民主化和市场经济以及基本人权的情况”列入考虑之中。同年5月海部访问东南亚时重新对海部主义作了说明,把其重点调整为“支持亚洲的建国和民主运动”。日本政府还不顾在野党的反对,以行政命令的形式避开宪法制约,向海湾派遣了自卫队员和扫雷艇,试图以军事或准军事手段协助美国安全战略的实施。对于可能与美式新秩序发生冲突的问题,日本亦格外审慎。如马来西亚在1991年初提出“东亚贸易集团”设想后,日持“不支持,亦不反对”的态度。海部还对美副总统奎尔表示,日不会同意将美排除在东亚之外。

为了提高自己在美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日除了积极追随美的新秩序构想之外,还采取了借亚洲国家以自重的策略。海湾危机后,日本加强了对东盟、蒙古、南北朝鲜的外交攻势,特别是加快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1991年上半年,日本藏相、通产相、外相相继访华,中曾根、竹下登两位前首相亦赴北京访问。最终,日本抢在伦敦七国首脑会议之前全面恢复了对华关系。在七国首脑会议上,日本一面以亚洲发言人自居,一面炫耀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有力地增强了自己的外交筹码。桥本藏相承认,打“中国牌”“非常有效”,使日本得以摆脱可能出现的孤立处境。经过种种努力,日本政府逐步达到了修补日美关系的目的。海湾战争给美日关系带来的冷淡气氛得到缓和,但它给美日关系带来的影响却直到下一阶段才完全显现。

三、苏联解体与新现实中的美日关系

1991年苏联“八·一九”事件和此后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彻底终结,也给美日关系带来了进一步的变化。近两年的摩擦使美日的矛盾点和共同利益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宿敌戏剧性地消失后,两国政府亦开始为世界形势剧变中匆忙出台的政策构想充实新的内容。

1. 日本“世界和平秩序”构想的出台 苏联的解体似乎给日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海湾危机前后,日本大国外交屡屡受挫,几乎陷于孤立的情况仍使日本人不寒而栗。日本各界对此的解释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被动是因为缺乏配合美国新秩序外交的手段,对

应付冷战后的安全形势缺乏心理准备。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造成日本外交被动局面是因为海部大国外交的根基建立在对美的依赖上,因而一旦为美国所厌弃即举步维艰。而帮助日本外交摆脱困境的并不是对美的屈从和妥协,而是对亚洲外交的成功。

在总结回顾的基础上,海部任期将近结束时,日本舆论界出现了两股新潮流。一是疑美论。很多日本学者纷纷对美国海湾战争后的自满表示反感,对美式世界新秩序表示疑虑。政论家中西辉政说海湾战争并非“新秩序诞生前的阵痛”,而是一场“愚蠢的战争”。如果把“唯美国论”强烈地反映到美国外交政策中去,美有可能犯“世纪性错误”。〔24〕日《呼声》杂志提出不能对美国的战略唯命是从,今后“日本无利可图就不给予援助”。日本经济学家提出:“不能将日本经济结构纳入美国经济的再调整中去,而要对美国经济提出严肃的政策。”

日益流行的另一种观点是返亚论。他们希望“不妨耍弄一下亚太这张牌”,

〔25〕以亚洲为与欧美周旋的后盾。他们批评海部口头上说实行重视亚洲的外交,而重视的只是美国。政评家福岗政行主张:“日本的外交政策可否改变基轴,从专对美国转变为全方位。美在日外交中的比重从99%降至50%,亚洲由10%增至30%。”要求“从世界战略的角度出发,根据‘平等的原则’建立一种成人式的近邻关系”,也就是所谓“新亚洲主义”。〔26〕

在日本各界期待外交战略有所变革的气氛中,1991年11月,宫泽喜一接替海部出任首相。他在11月8日的施政演说中即提出了“世界和平秩序”的概念,作为日本新的外交构想。通过此后日外务省官员所作的说明和日本外交的实践,可以看出宫泽的构想的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与美保持一定距离,强调日本外交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宫泽构想提出不久,日经济企划厅政务次官田中秀征即公开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它与美式世界新秩序有三点不同:

(1) 标榜和平,“注重价值取向”;(2) 意在“摆脱世界新秩序包含的均势逻辑”;(3) 世界新秩序期待美国发挥核心作用,而宫泽构想中联合国处于中心地位。总之强调要通过各国协调,而不是由美国一极主导来建设新秩序。田中还直言不讳地说:“在建立这种秩序的时候,日本应亲自发挥主导的作用。”〔27〕在这一战略指导下,对美外交在日本外交全局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日本在处理美日双边关系的过程中也采取了更强硬的态度。日本在1992年通商白皮书中严厉批评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要求美国摆脱对进口的依赖。日本通产省决定,今后每年要公布一个列举美欧对日实施不公正贸易政策和制度的白皮书。布什1993年访日时批评日本在开放市场上努力不够,日外务省官员迅速公开反驳,称从“长远结构问题来看,美国才应多做努力”。

第二,全力拓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以此作为与美分庭抗礼的基石。宫泽在竞选总裁时即强调要使东亚地区成为“与欧洲、北美不相上下的世界三大支柱之一”。他出任首相后,又在各种场合反覆声称日本要“以亚太为中心发展国力”,“扎扎实实地积聚成为平等伙伴的实力”。〔28〕1992年夏,日本官方的一份报告中公开提出了设立“环日本海经济区”的口号。与前首相竹下登的“东亚经济区”设想对照,宫泽政府的设想一方面开始把中国东北地区 and 俄罗斯远东地区纳入区域经济合作范围,另一方面继续把美国排斥在外。这一设想如果实现将对中俄日美四角关系造成什么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日本政府还首次试图在亚太安全领域有所作为。1992年7月,宫泽首相在访美时正式提出了“亚太安全会议”构想,呼吁设立“亚太安全合作会议”和“亚洲国家首脑会议”等机构。此后,日本外交官又在东盟扩大会议等场合反覆宣传这一设想。力图以此正式确立日本“亚洲盟主”的地位。

第三,加强“联合国中心外交”,希望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在国际组织和世界事务中建立独立的影响力。日本外务省把加强多国协调,特别是加强在联合国中的外交工作,作为1992年外交的最重要课题。〔29〕目前,日本已分担联合国经费的12%,并有三名日本人出任联合国的高级专员,逐步扩大了在这个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1992年5月,宫泽

政府强行在国会通过经过修改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11月21日,日本又进一步确定了在三年后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方针。

总之,经过调整后的日本外交政策突出了自主性和独立姿态,注意对美保持一定距离,力图实现对美外交和对亚外交之间的平衡。

2. 美国对日观念的变化和对日政策的调整 苏联解体也给布什的新秩序外交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冲击。外部敌人的突然消失助长了孤立主义论调的兴起。美国人纷纷要求“在建设世界新秩序前先完善国内秩序”。在1991年底开始的总统竞选中,孤立主义思潮显示了惊人的影响力。布什总统在本党内受到孤立主义代表人物布坎南的指责,在党外遭到民主党人“重视外交,忽视内政”的抨击。孤立主义掣肘,加之美国经济复苏乏力,限制了布什的外交活动能力。美国在海湾战争胜利后表现出的左右世界局势的自信逐渐消失了,在新秩序外交中对盟国颐指气使的态度也有所改变。

美国的对日观也相应地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强调美国在美日关系中同样是受益者的言论又活跃起来。部分美国学者坦率地指出,事实上在里根执政时期,美日已形成了合霸的局面。美国是靠了日本的财力支持,才在不影响美国内生活水平的前提下,通过新冷战拖垮苏联的。

(30) 苏联突然解体使前两年相对平静的东亚同样面临影响深远的力量重组,美国投入外交政策的精力既然有限,就仍要依靠日本这个最重要的亚洲盟友,在安全、政治领域继续分担责任。同理,美国的经济也需要日本的支持。过分强调贸易逆差不能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现实,敌视日本对美直接投资更是没有道理。

随着美国朝野对日本看法的变化,1991年秋,以计划中的布什访日为契机,美国政界要员连续发表政策性演讲,以美国冷战后对亚太战略为背景,勾画出了美国新的对日政策的框架。这与海湾战争后一度出现的忽视亚太的倾向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务卿贝克把“美国领导下的亚太新秩序”比喻为一把打开的折扇,将美日同盟比作其骨干,称未来的“太平洋共同体”要在美日带动的亚太经济合作进程中形成。(31) 通过阐释这个“扇形构想”,美国直截或含蓄地向日本发出了几个信号:第一,美国依然重视美日关系。贝克说:“对亚太地区安全、世界经济增长以及冷战后国际体系的作用来说,没有什么比美日关系更重要的了。”美国不仅把美日关系作为亚太外交的核心,“要求日本在建立新秩序上承担责任并发挥作用”,而且希望密切同日本的经济关系,希望日本“为从根本上改善美国经济作出贡献”。

(32)

第二,美国不会容忍日本单独主导亚太经济。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亚太外交的重心转向保持同这一地区的经济联系。美决心持续地参与亚太这个世界上最生气勃勃的地区的事务。

第三,美国要求日本配合美国安全战略、分担防务责任,但是不希望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破坏东亚战略平衡。布什政府称,美在冷战后要继续保持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充当“平衡轮”,而平衡轮的重要功能就是抗衡日本军事影响力的相对增长。共和党思想库传统基金会1992年夏发表的对外政策报告中明白表示:“密切日美防务合作,有助于遏制日本重新武装。”总之,在冷战后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下,美国既承认苏联瓦解造成日本在亚太影响力相对上升的现实,作出更加倚重日本的姿态,又毫不掩饰自己对日本未来动向的警惕和继续左右亚太局势的决心。

3. 新形势下的美日关系 随着美日外交政策的充实和调整。美日两国在冷战结束后迅速进行了协调双边关系的新尝试。1992年1月,几次被推迟的布什对日本的访问终于成行。在访问中,美日联合发表了《东京宣言》,宣称两国决心“携手并肩,承担建立新时代的特别责任”,并准备“灵活地使用美日安保条约和有关规定”,使美日同盟关系成为“具有全球性的合作关系”。在宣言中,美国正式确认了与日本的“全球性的伙伴关系”,日本则承诺“将焦点对准贸易和投资关系”,“解决经济摩擦”。同时发表的《行动计划》还规定了两国在裁军和军务管理、地球环境、科技以及地区问题等领域的具体合作措施。美日通过彼此

让步和妥协精心设计了这一文件，试图以此“确定美日在冷战后的关系构架”。

与此同时，美日双边关系中的摩擦有增无减，而且具有从传统的经贸方面向科技、安全、政治领域溢出的趋势。例如，美日在1991—1992年间以“专利战”的形式在高科技领域发生了直接的对抗。1991年7月到1992年3月间，日美大企业之间涉及数亿美元的专利诉讼就有七件。美国利用自己独特的陪审团制度使日本公司在生物工程、电子技术等领域的专利之争中全面败北，引起日本方面的强烈不满。再如，美日在军事安全领域互相制约的企图一度公开化。1992年3月，美国防部制订的《1994—1999财政年度防务计划指导方针》被泄露。该计划声称：“把日本和德国纳入美国主导的集体安全体制之中，是冷战的胜利。”美国要“劝阻它们不向我们的领导地位挑战”，“防止重新出现一个新对手”。(33) 报告流露出的对日敌视引起日本的抗议。美国国防部被迫对其进行修改，去掉了明显针对德日的字眼。但它已证实了美国对日的戒备心理。这一阶段美日摩擦深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所谓美日“国民感情之争”。在日本，它表现为斥责、批评美国的风潮，这一潮流甚至波及日本政界。就在1992年布什访日前，宫泽嘲笑美国“存在艾滋病和无家可归者问题”，称“日本愿意对美伸出友谊之手”。布什离日不久，日众议院议长樱内义雄称美国是日本的转包商，批评美国工人素质低。在美国舆论大哗之际，宫泽又称：“美国达到今天的地步”，是因为“缺乏辛勤劳动的道德观”。相应地，在美国出现了反日浪潮。美国人批评宫泽的“怜悯言论愚蠢之极”，称“日本领导人完全看错了美国的力量”。美国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抵制日货的运动，得到了63%的美国公民的支持。(34) 美国舆论承认：“美日关系出现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倒退。”

四、结 论

有人把冷战终结前后称为世界政治大地震时期。美日同盟关系经历了这次震荡而基本维持了下来。尽管由于两国在认识自身的实力和在新体系中的地位，继而确定在双边关系中的姿态的时候，曾出现过分乐观或悲观的情绪，使双边关系的调整经历了曲折。但两国最终还是形成了几点共识，为冷战后关系发展确定了新基础。

第一，地缘政治方面。经过一番折冲，日俄关系未获突破，美中关系仍不正常。中日、美俄关系虽相对良好，但日本对中国的改革进程、美国对俄罗斯的政局走向都感到没有把握。在东亚新的四角关系中，美日依然视对方为最现实的盟友。不过美日同盟关系已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巩固，日本在决定对中俄政策时不再是除支持美国外别无选择。这种局面固然会加深美国对日本的猜忌，但也会制约美国放心大胆地敲打日本的习惯。

第二，国家安全方面。美日共同的安全目标已从抗衡苏联转为抵御地区性威胁。美国将冷战后军备的目标定为可以同时应付两场地区性冲突，其心目中的主要威胁点是中东和东北亚地区。对日本而言，这两地一是经济资源命脉所在，一是安全防卫的重点。因此，双方对未来安全利益的认识有一致之处。日本的和平宪法可能对两国的安全合作有妨碍，但日本已经在逐步摆脱其制约。今后可以以少量人员参与和大量资金支持相结合的形式，支持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体现日美安全同盟在冷战后的价值。

第三，经济方面。不断摩擦的结果是使日美两国更清楚地认识到两国经济依存的广度和深度，认识到这是他们从冷战时期同盟关系中继承的最大遗产。《经济学家》评论说“美日两个经济大国经过长期的合作与同盟关系，就如同一对连体双胞胎，难舍难分”。(35) 日本不仅在产品市场、技术来源上依赖美国，而且作为国民经济根基的农产品大量依赖美国供应。关于美国对日的经济依存度，美国人自称：“现在日本既为美国提供为维持其宏观经济平衡所必需的信贷，又为美国多数企业提供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还为美国居民供应已成为美国生活方式象征的汽车，为美国国防提供

所需的技术。”(36)美日经济已达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程度。因此即使是主张国内优先的领导人,也十分注意以推进国内经济改革的同等精力,谋求对方的配合与支持,使两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协调。

可以说,摩擦加深和依存增强是贯穿冷战终结前后美日关系发展的两条主线,而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相互依存并不抹煞矛盾冲突。美日之间的许多矛盾正是产生于他们的相互渗透和依赖。从理论上讲,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既有良性的,也有负性或称敌对性的,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就是后者的典型例子。从某种程度上说,美日的相互依存关系也有向负性相互依存发展的趋势。美国学者伯格斯特把变化中的美日依存委婉地称为“竞争性的相互依存”。(37)这种提法反映了美日在处理双边关系中固有的复杂心态。他们意识到旧的依存基础已经变迁,日益深刻、广泛的矛盾难以依靠传统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得到解决。但通过依存获得的利益和破坏依存可能带来的损失又使它们不愿或不能使用割断联系的办法解决矛盾。它们只有通过更深的依存,获得更多的制约对方的途径,来保证自己的安全。除非出现了不理智的决策或某国国力的急剧衰落,两国矛盾、冲突甚至敌视、对抗,并不意味着依存关系的破裂。有些美国学者已经在建议“有意识地建设日美间竞争性的相互依存关系”。(38)

在今后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美日关系很可能仍保持这种摩擦与依存并存的状态。

注释:

- (1)〔日〕《选择》月刊1989年10月。
- (2)日本三菱研究所高桥与日国际关系论坛负责人伊藤的谈话,《华盛顿邮报》1989年9月17日。
- (3)〔日〕《中央公论》1990年7月。
- (4)〔日〕《宝石》月刊1990年7月。
- (5)〔日〕《东京新闻》1990年1月9日。
- (6)〔日〕栗山尚一:“动荡的90年代和日本外交的新展开”,〔日〕《外交论坛》1990年第5期。
- (7)〔美〕诺曼·贝利和卡恩斯·洛德:“谈战略经济学”,《比较战略》第7卷第2号。
- (8)〔英〕比尔·埃莫特:《太阳也会西沉》,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12页。
- (9) Karel Van Wolferen,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89).
- (10)法新社华盛顿1990年6月5日电。
- (11)〔13〕George Bush, “1990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Dispatch*, March 6, 1990.
- (12)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 Looking Forward the 21st Century”, April, 1990.
- (14)〔日〕《产经新闻》1990年8月17日。
- (15) *Congressional Record*, September 12, 1990.
- (16)〔英〕《经济学家》1991年1月号第18页。
- (17) George Bush, “The World after the Persian Gulf War”,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March 11, 1991.
- (18)〔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91,27,189页。
- (19)〔美〕D·哈伯:“霸权的终结”,《亚洲概览》1990年第9期,第892—907

页。

(20) 奈：前引书，第139—140页。

(21) 埃莫特：前引书，第276—277页。

(22) (美)《国际先驱论坛报》1992年8月16日。

(23) (日)《产经新闻》1991年6月6日。\$

姪4) (日) 中西辉政：“海湾战争后的美国”，《呼声》1991年第5期第126—138页。

(25) (日) 鸣泽宏英：“世界经济的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世界经济评论》1989年10月号。

(26) (日) 斋藤精一郎：“新亚洲主义的陷阱”，《呼声》1991年11月号。

(27) (日) 田中秀征：“宫泽首相所说的世界和平秩序是什么？”，《东洋经济》1991年12月号。

(28) 日本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谈话，《读卖》周刊1992年第8期。

(29) (日) 小和田恒：“1992年的世界形势和日本外交”，《世界经济评论》1992年4月号。

(30) (38) I. Destler and Michael Macht, "U.S. Policy Toward Japan", *U.S. Foreign Policy: The Search for a New Role*, ed. by Robert Art and Seyom Brown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pp. 291, 306-308; 297-301.

(31) 《纽约时报》1991年11月12日。

(32) George Bush, "The U.S. and Asia: Building Democracy and Freedom",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August 19, 1991.

(33) 《纽约时报》1992年3月8日专稿。

(34) 《华盛顿邮报》1992年3月1日。

(35) (英)《经济学家》1990年2月17日第19—22页。

(36) (美) R·顿布什：“为日美摩擦开处方”，《日本经济新闻》1989年11月28日。

(37) C. Fred Bergsten, *American in the World Economy: A Strategy for the 1990s* (Washington, 1988).

《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

略论费正清

徐国琦

作者单位：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西方现代中国学之父，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学术发言人。其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他是名闻遐迩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77年易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创办人，长期担任该中心主任之职(1956—19

73), 亦是享誉学术界的《剑桥中国史》近、现代部分主编。费正清历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1958,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68,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等。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虽毁誉交加, 但就其崇高的学术地位及巨大的影响力而言, 在西方学术界诸贤中, 无人可与比肩者。即使在后来学者心目中, 费正清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

正是由于费正清的独特学术地位, 使得他本人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如早在1973年, 美国乔治城大学一研究生即以《费正清和美国的远东研究: 头四十年》(George Stevens, *John King Fairbank and Far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 the First Forty Years*)为题撰写过硕士论文。1982年, 加拿大学者保罗·伊凡思亦以费正清为题完成其博士论文(Paul M. Evans, *Fairbank: Intellect and Enterprise in American China Scholarship, 1936-1961, Dalhousie University*), 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 于1988年正式出版费正清学术传记(Paul M.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费正清先生的高足, 现为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及哈佛大学赖世和日本研究所(Edwin O. Reischauer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主任的入江昭教授(Akira Iriye)在新近创刊的《美国与东亚关系杂志》上撰文, 高度评价费正清在中美关系学科方面的创建之功。(1) 中国学者近几年也开始注意到费正清的重大学术贡献, 并陆续发表有关文字。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不过, 对于这位一生“魂系中华”, 并把毕生心血献给中国研究, 改善中美关系, 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相互了解的学者, 我们的重视还远远不够。笔者不揣冒昧, 拟对费正清学术生平作一初步探讨, 聊作引玉之砖。

一、费正清的学术建树

1936年秋, 当刚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费正清应聘到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时, 美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研究仍处于传统欧洲汉学禁锢之中。当时所谓的中国学要么作为西方文明的分支或点缀, 一个边缘学科——如当时哈佛大学规定, 任何学生如要修中文, 或选择与中国有关的题目, 必须先通过法语等两种欧洲语言的考试。理由是东方学是西方特别是法国文明的一部分(2); 要么则在传统汉学模式下只注重古代汉语, 完全忽略对中国近代或现代的研究。诚如30年代在哈佛大学读书, 后来成为美国著名政论家及新闻记者的白修德(Theodore White)所写的, 30年代的“哈佛东方学系的那些老古董汉学家们认为东方历史随着乾隆朝在1799年的结束而告终结。”当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吐理绥(日名英利世夫)(Seri Elisseeff)公开声称, 对179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已越出历史学范畴, 只能归于新闻。(3) 难怪白修德刻薄地形容当时美国汉学界状况是“学术滑稽剧”。(4) 当时仅有的一些有关中国近现代史著作主要出于传教士之手, 大多为见闻性质, 很难算作真正的学术论著。虽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如霍恩贝克(Stanley K. Hornbeck)等试图弥补这种缺欠, 研究东亚国际关系史,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不懂中文, 无法利用中文材料。

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学研究的严重忽视。许多有志于此的学者望而却步, 另辟他径。虽然包括费正清在内的少数青年学者不畏艰险, 敢于创新, 但他们面临着求职谋生问题的严重挑战。30年代初这些未来的中国学大师们多在中国进修, 一次在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A. E. Nelson T. Johnson)的招待宴会上, 他们忧心忡忡地向大使求询学成归(美)国后求职的可能性, 大使不无严肃地答道: “小伙子们, 难于上青天。”(5)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学研究在美国被忽视的严重程度。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 费正清以顽强的精神开始了他中国学研究的漫长生涯。教鞭初执, 他即提出新的学术主张, 像意大利哲学家及历史学家克罗齐一样, 认为一切历史都应该是当

代史。主张应跳出传统汉学束缚,重视现代汉语及档案的研究,呼吁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费正清决心以哈佛为阵地,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学研究模式,来达到他所说的中国学和他个人学术生涯的“辉煌时刻(big time)”。(6)

凭着锲而不舍的追求,费正清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他人难以超越的丰硕成果和建树。据不完全统计,费正清一生中出版了至少44本专著(部分与他人合作),主编或联合主编至少18本论著,发表了187篇论文,与他人合撰18篇,为别人专著撰写序言52篇,发表书评160篇。尚不包括大量的专访及声像材料。更重要的是,费正清的作品均属上乘,佳评如云。(7)

费正清的学术成果大致可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博大精深的学术论著。《中国口岸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清代行政:三个研究》(*Ch'ing 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 1960*,与邓嗣禹合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48*),《中美关系中中国的形象和政策》(*China Perceived: 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a-American Relations, 1974*)等均可列入此类。其中《中国口岸的贸易与外交》是费正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此书是费正清用力最勤、学术功力最厚的专著。甚至在40年后的今天,该书仍是哈佛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该书至少有三大贡献:一是开风气之先,利用中国档案,以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外关系;二是把中外关系放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体系诸范畴加以综合考察;三是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学术见解。例如他认为清季的通商口岸制度是中国传统朝贡制度的产物。中国人利用通商口岸把洋人有效地纳入中国的世界体系之内。在洋人入侵中国之前,清朝的统治形式是满汉共治,通商口岸制度建立后,则为满一汉一洋共治(Synarchy)。所以外国人的入侵并没有打破中国的传统政治形式。

《美国与中国》是费正清所撰的第一本书。该书旨在告诉美国人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在书中他利用当时最新的现代化理论分析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近代化之路。费正清批评美国对中国有许多不切实际或一厢情愿的误解。由于该书观点新颖,立论清晰,文笔生动,甫一出版,即成为畅销书,并荣获1948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颁发的最佳国际关系著作奖。该书到1983年已出至第四版,篇幅亦扩大许多。时至今日,《纽约日报》仍称其为“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及文明的最佳导论作品”。(8)该书的问世使费正清声誉鹊起。

费正清学术成果的第二大组成部分系为教育美国公众、帮助美国了解中国、致力改善中美关系而撰写的雅俗共赏的作品及教材。享誉世界的《东亚文明史》(*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2 vols, 1960, 1965*,与Edwin O. Reischauer and A. M. Craig合作,1960,1965),《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 1992*)及《东亚:传统与转型》(*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1973*)等属于此类。费正清的这类著作在长时间内成为西方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标准教科书,被誉之为中国学专业的“经典”(9),其影响甚至远及西方之外的学术界。例如,据韩国著名中国史专家闵斗基介绍,费正清撰写的教材长时间被韩国学术界列为研究中国问题的标准参考书。直到最近韩国学者才决心写一部自己的中国通史予以取代。(10)

费正清临去世前两天交给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新史》凝聚着他一生研究中国的心血。该书大量吸取学术界的新观点、新方法,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学在费正清的孕育、培植下成长壮大的辉煌历程。该书名为“新史”,“新”在他认为中国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汉人文化,而是中国各民族文明的结合体。汉人和其他各民族合作,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文明体系。该书还“新”在他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但不发展”(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的悖论。此外,费正清注意到中国发展模式与西方不同,西方发展模式为“工业的一军事的一企业的”(industrial-militaral-entrepreneurial),中国则是“农业的一非汉族的一

官僚的”(agrarian-Nomadic-bureaucratic)模式,清朝是这样,民国是这样,当代仍是这样。费正清的《中国新史》,正如哈佛大学著名中国文革专家麦克法格(Roderick MacFarquhar)所言,包含了“费正清毕生的阅读与思考,是费正清致力于理解一个伟大文明和教育公众这一终身使命的顶点。”〔11〕

费正清学术成果的第三部分是编撰“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学术工具书,如书目提要、史料汇编等。其中主要包括《清季史料入门》(*Ch'ing Documents: An Introductory Syllabus*, 2 vols, 1952),《中共文献史》(与 Conrad Brandt and Benjaming Schwartz 合编,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50*),《近代中国中文书目辑要》(与刘广京合编: *Modern China: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 1898-1938*),与日本学者坂野正高合编的《日本研究近代中国书目辑要(1955)》等。这类编撰工作虽然耗时费力,却对提高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水平大有裨益。

以上三个部分的有机结合,便构成了费正清一生的学术体系。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其学术体系作深入考察分析,只能择其要者加以综合。笔者认为,费正清的学术研究至少有三种意义:

第一,通过费正清长期不懈的创造性劳动,一个新的学科——近代中国研究——不但正式确立其学术地位,而且日趋繁荣昌盛。费正清本人卷帙浩繁的著作为中国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学术标准:多方利用中外档案,深入分析研究课题,文笔明白晓畅。〔12〕

第二,费正清的学术专著大都为填补空白之作。具很高的学术价值,且有指点迷津之功效。他呕心沥血所编撰的书目提要、研究指南、资料汇编给学者提供了一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学术视野,对于推动中国学的进步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三,费正清的学术著作有雅俗共赏之妙。其著作不仅有助于学术发展,更重要的是其教育功效,其对中美两国间沟通理解的推动。费正清的著作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70年代初当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时,《美国与中国》等书同时成为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主要参考书即可证明。

费正清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下述几个特色:

一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理论上,费正清认为以西方为背景的许多社会学说如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等不能运用到中国。中国的文明是一个特殊的自成体系的文明。中国的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特殊、最与众不同、最古老、最自成体系、最平衡和伟大的文化”。

〔13〕正因为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它在国际关系中亦应受到“特别处理”。〔14〕例如,对于长期以来中美关系的一个纠纷点——人权问题,费正清就呼吁美国应认识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对人权有完全不同的定义。他明确指出,“人权的概念,虽然在一个自我标榜的全球宣言中被神化,(实际上)是受着文化制约的。”〔15〕他指责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做文章批评中国的行为是“美国的新宗教”。〔16〕这种概念误差,费正清认为是由于中美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造成的。两国在许多重要方面重大的分歧,造成两国之间的差别“几乎如同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一样有趣”。〔17〕费正清过去的学生唐若思(Ross Terrill)曾准确地概括费正清的观点,他说:“在费正清看来,有两种方法把中国纳入我们的世界观:要么视中国为全球近代化过程中的后来者,要么把中国看作一个特殊的文化。这种文化有自己的历史和未来。”费正清“更倾向于后者”。〔18〕因此,费正清在各种场合一再呼吁研究中国的重要性。奉劝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时,切忌先“提出一个西方问题,然后收集证据加以回答”。因为这种方法“忽略了中国的实际情形”。中国的文明是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形式的文明,因而也不能用所谓的普遍标准(universal standards)来衡量中国。〔19〕

费正清学术研究的第二个特色是侧重研究清季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他研究中国历史的主要出发点是帮助西方了解中国,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要了解中国的现在,必须

了解它的过去，特别是清代历史。在费正清看来，不深入研究清季中国，就无法理解当代中国。这是他集中研究清代历史的主要动因。学术研究的功利色彩与他本人所说的“瞄准目标”(goal-oriented)二者结合成为费正清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白修德指出，“从一开始，费正清的目标就很清楚：解释我们是怎样了解中国人的及中国人如何看我们。解释导致中美对抗的历史渊源。”〔20〕费正清本人对此也坦诚不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麦卡锡主义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恰当的时机”，〔21〕因为“在中国问题上，对麦卡锡主义的回答只能是教育”公众。〔22〕难怪白修德认为费正清的每一本书都是着眼于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作用。所以费正清的著作不仅是学问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它们还代表着“智慧”。〔23〕

费正清学术研究的第三个特色是强调“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及传统与现代化两个主题。〔24〕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费正清作为一代学术大师，曾从多种角度探讨过中国历史。但笔者认为上述两个主题在费正清的著作中（特别是其早期著作中）比较明显、突出。费正清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中国从传统向近代方向缓慢迈进的过程。这种近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反应。中国近代化之所以没有成功，主要原因不是帝国主义侵略，而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因此，在费正清的多种著作中，冲击与反应，传统与现代化的主题总是不断出现。例如，费正清在撰写《美国与中国》时便充分利用当时较新的所谓现代化理论来阐述中国的历史，以此分析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西方和日本那样走向近代化之路。他与邓嗣禹共同编撰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West*)明显体现了其冲击—反应理论。他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986)强调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把180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视为中国在传统与现代化中挣扎的历史。在他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新史》中，上述两个主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该书结尾中写道，如果乾隆皇帝在1793年接受英国的建议，让中国加入国际贸易体系，今日中国的现代化可能与日本并驾齐驱了。

“中国为什么不能对西方入侵作出有效回应”的问题在费正清的著作中重复出现。1984年他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所强调的仍是中国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那样对西方作出反应论题。〔25〕以传统与现代化为经，冲击—反应为纬，二者的结合便是费正清解释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

费正清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如温斯顿·洛德（美国前驻华大使）所言，“费正清对中国的研究和理解，无人可以超越”。〔26〕

二、“中国学之父”

在西方谈中国学研究而不提费正清，就像谈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忽视毛泽东一样。费正清不仅仅是一个有成就的学者，更重要的，他是一个学科的创始人，或人所共知的“中国学之父”。因为后人可能超过费正清的学术成就，但无人能像费正清这样在50多年内始终成为中国学研究的中心或领袖。对此，西方学术界没有异议。宾州大学著名中国学家卜德(Derk Bodde)认为，西方中国学之所以能在今天成为显学，“费正清贡献最大”〔27〕。《中国史研究方法》一书的编者也明确指出，“现代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费正清”。

〔28〕《评论》杂志也明白写道：费正清是美国的“中国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无与伦比的人物”。〔29〕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现为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的麦克法科先生宣称，是费正清“真正使中国近代史成为近代史整体研究中的一个显学”，是他最早使中国学摆脱传统的“东方学的一潭死水”，将其变成学者们可以广泛研究的对象。〔30〕由上述评论中可以看出，费正清是公认的中国学创始人。

费正清之所以成为“中国学之父”，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具备“学术企业家”(Academic entrepreneur)的素质。他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那样信息灵通，深谋远虑。他最先呼吁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并在1955年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率先在美国成立第一个东亚研究中

心。哈佛大学前文理院长亨利·罗沃斯基曾把费正清这方面的成功归于他杰出的宣教能力。罗沃斯基说,费正清是“伟大的学术传教士”,“在哈佛当代历史上,我找不到其他人在该方面能与他分庭抗礼。”(31)除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外,美国的其他几个中国研究中心也是后来在费正清的支持下,主要由他的学生创建的。费正清的“学术企业家”素质特别体现在为中国学发展特别是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筹款方面。他是一个募捐能手。在他担任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近20年间,中心一直财源茂盛。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中国学的建立及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一个学科成长壮大的主要条件是人才的培养。在奖掖后进、悉心培养后学方面,费正清取得了他人生中的辉煌成功。他是一个真正的导师,极具导师的才华。这一点早在他教学生涯初始时即已见端倪。白修德对此曾作过精彩的描述。当费正清在1936年任教哈佛时,白修德已进入三年级了。但正是初出茅庐的费正清对他影响最大。是费正清让白修德感到“生命的呼唤”(32),是费正清的中国课程深深打动了,让他感到热血沸腾,导致他很快来到中国——“那故事发生的地方”,(33)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驻华记者及政论家。随着学问的增长和阅历的日趋丰富,费正清的教育家才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费正清培养中国学人才的第一个途径是课堂教学。他在50年代同著名的日本专家赖世和合作开设的《东亚文明史》课程,吸引了无数哈佛莘莘学子。他们以其丰富的学识、异彩纷呈、深入浅出的教学方式,使这类课程成为孕育新一代中国大师的肥沃土壤(“Rice Paddies”),培养了大量学者,并导致学生中的许多人走上了研究中国的人生旅途。

费正清教学的第二个途径是为研究生开设的讨论班。从找材料到选讨论班论文题目,费正清对学生总是多方指导。他特别重视讨论班题目的选择。在他看来,“选择一篇讨论班论文题目如同选择配偶一样重要”。(34)学生和讨论班论文之间的关系“甚至比两性关系还要密切”。因为世界上男人和女人有的是,但“书稿永远属于作者自己”。(35)正是出于对书稿的一往情深,费正清有时对人倒显得相对无情。例如在他的学生为其举行的60岁生日晚会上,他请与会的詹姆斯·汤姆森(James C. Thomson)教授再花一年时间把他的第二本书稿完成。汤请求宽限时日,因为他想花时间来挽救危机中的婚姻。费不无严肃地回答道:“别人关心人,但我只关心书稿。”(36)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大多数情况下,费正清是用巧妙的手腕来达到促成学生完成书稿的目的。

费正清有时有意安排学生做某些重要但被忽视的题目。例如,传教士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费正清便大力鼓励某些学生的兴趣向此发展。科恩(Paul A. Cohen)在谈到费正清怎样使他写传教士题目时幽默地说,费正清“精明地抛出诱饵,我便上钩了”。(37)费正清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出于中国学科全面发展的考虑,体现了“中国学之父”的苦心。因此,他并不鼓励学生只在费正清自己熟悉的课题内作文章。孔复礼教授(Philip Kuhn)对此曾评论说,“费正清是其专业领域的传教士。他很早就意识到应鼓励学生成为他自己不熟悉领域的专家”,“并对自己学生的著作非常尊重,并乐意学习。”(38)

费正清扶助年轻学者的另一个为人乐道的方面是帮助他们顺利进入学术生涯,其中主要体现便是促成其学术成果的问世,帮助其出版。费正清深知青年学者对自己的书稿常常缺乏信心,不敢轻易拿出发表。对此必须多加扶持。如现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著名中国文学教授易杜强(John Isrel)当年在完成了自己的书稿后很长时间内仍不愿拿出,总是觉得有不满意之处。费正清说要看看他的书稿,便不声不响地将其推荐到哈佛大学出版社予以出版。对这一件事费正清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起,称这是一本“好书”,有利于这位年轻人的事业发展。(39)类似的例子还不少。现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的一中国史专家也有相同的经历。为此,他在一篇回忆费正清的文章中深有感情地写道,“没有我的导师及朋友(费正清先生)在肩后关注着我,上帝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我的著作)。甚至现在,每当我完成一部书稿准备出版时,我仍感觉到他的关注。”(40)

为了中国学的发展,费正清想出许多办法来网罗人才。其中一个他引为自豪的办法是他那举办了几十年不间断的传奇性的周四茶会。茶会在他位于哈佛校园不远的家中举行。费正清利用茶会提高学生对中国学习的兴趣,帮助学生进入〔研究中国〕朋友的圈子”,为他们提供切磋学问的气氛。茶会对中国学发展的贡献之大,连费正清自己也不无得意地称此为他一生中值得记忆的“发明”。〔41〕他的另一个办法是提供奖学金。现为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也是费正清的学生。在求学期间,他有一度曾想放弃中国研究,改换门庭。费正清立即为他安排了一笔到英国作旅行学者的资金,从而,用黎安友自己的话说,他因“咬中国的钩子太深而无法逃脱”了。〔42〕今天,黎安友是哥大东亚中心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由于费正清“不择手段”网罗中国学人才,甚至被人怀疑为“中国第一主义者”(China Firster)。的确,在费正清看来,一个人选择其他专业而不是研究代表世界最伟大革命的中国,是不可思议很难理解的。〔43〕

费正清为中国学的发展、为培养人才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对此觉得理所当然。他说,“如果下一代不站在前辈的肩上、面上,人类又怎能向上发展呢?”〔44〕但他的确得到了一个导师所能梦想的最高荣誉:他的学生们现在全是出类拔萃、学识丰富的专家、记者、大使等各行业的精英。而且,正如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指出的,“凡费正清的学生都不会忘记他们对他们的工作、事业、学术观点的真诚和永久的兴趣”。他的学生对他有一种近似英雄崇拜的心情,甚至认为他像“上帝”。〔45〕

作为一个学派创始人,费正清没有门户之见。凡一切与中国有关的学者和专业,他都大力支持,为之奔走。如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东亚法律中心,在诸如选择人才等各方面都受到费正清的多方帮助和支持。哈佛经济系的中国经济讲座的设立,帕金斯(Dwight H. Perkins)教授的学术成长都与费正清分不开,凝聚着费正清的大量心血。〔46〕费正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目光并不局限于历史学科的发展。如他主动建议黎安友改学政治科学。因为在当时研究中国政治的人还不多。〔47〕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者绝大多数出自费正清门下(或学生的弟子甚至学生弟子的弟子)。新西兰学者S. A. M. 阿谢德(S. A. M. Adshead)甚至认为“所有现代中国学研究者都是费正清的学生”〔48〕。据费正清的一位同事估计,费正清的名字出现在学术著作的奉献页或鸣谢页上的次数十倍于任何其他学者。〔49〕

1970年6月,哈佛大学校长在授予费正清荣誉法律博士学位时致词说,“我们国家在东亚研究上的成就归功于此人长期不懈的坚持和富于远见的创造性努力。”〔50〕这一评价并不是溢美之词。毋庸置疑,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发电机”〔51〕。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评价还不够。因为费正清影响到国际中国学的发展成长。例如,在前汉学重镇法国,费正清的影响便不容低估。法国著名的女历史学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曾写道,法国的中国研究“严重依赖费正清所建立的模式,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前进”。“费正清的逝世不仅是美国中国学家的损失,也是法国学术界的损失。”另一位法国杰出的中国学研究者毕仰高(Lucien Bianco)进一步认为费正清过去是,而且永远是“我们欧洲的中国学之父”。〔52〕

欧洲的这一反应大概是费正清乐于见到的。因为建立世界中国学中心是费正清长时期的伟大理想。他“一直把中国研究看作是一项国际事业”。〔53〕早在60年代,费正清即“视中国学为一全球事业,急切地想了解别国〔学者〕正在做什么,并探索我们如何合作”的途径。〔54〕为此目的,他曾几次进行环球学术旅行,为实现自己的这一理想努力。

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实现了他的世界中国学中心的梦想。多年来,每年有占中心成员半数以上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在这里聚首,切磋学问、交流心得,共同耕耘中国学这块园地。他参与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也体现了他的世界中国学中心的理想。到目前为止,来自欧、亚、美等洲的许多学者参加了这一庞大学术项目。

三、费正清与中美关系

费正清在中美关系中扮演了多种角色。第一种角色是充当政府官员或顾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费正清被美国政府派往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特别助理及情报与新闻官。鉴于对中国局势的第一手观察，在中美关系方面，当时他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在物质上援助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当时许多中国学者由于战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在贫困线上。费正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予他们一些物质帮助。钱端升、梁思成夫妇等当时都得到过费正清的资助。二是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同国民党政权完全搅在一起。他很早就认识到由于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垮台是迟早的事。他对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提出强烈批评。他在1946年6月中旬结束在华官方使命前给母亲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们在亚洲似乎命定要做蠢事”，美国现行对华政策是“不可名状的愚蠢，后果不堪想像。简直是疯了。”(55) 费正清的这一态度在其回哈佛后没有什么改变。对于当时中共节节胜利的事实，他认为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中国革命是土生土长的产物，而不是来自外来影响。他反对美国一味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认为这样做有碍将来的中美关系。他在194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呼吁美国应同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因为这符合美国传统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哲学。顽固地把自己绑在国民党内战的战车上，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56) 在中共正式接管政权后，他要求美国正视现实，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在1949年担任杜鲁门政府制订对华政策顾问时，即将此看法告知美国最高层。(57) 当时，关注中美关系、呼吁美国继续保持同中国的联系成为费正清的主要兴趣所在。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开始同时骑两匹马”，一匹马是在哈佛“教中国史”，另一匹马是投入很大精力讨论当时对华政策。(58)

然而，费正清的这种现实主张使他成为美国冷战思潮中的批判目标。在50年代，正如知名学者西格蒙德·达芒特在其近著中所写的，美国的强烈的冷战、反共歇斯底里，使得“对(美国)现行政策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会被污蔑为颠覆性质，斥为卖国。”(59) 在这种强烈的反共环境下出现的麦卡锡主义者谴责费正清要对美国“失去中国”负责。甚至连新任国会议员约翰·F·肯尼迪也指责费正清是共产党的“同情者”。(60) 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罪名。许多新闻媒体也展开对费正清的攻击。如《时代》周刊谴责费正清是共产党的长时间辩护人。

(61) 费正清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除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和精力到国会等部门申辩之外，他一度被禁止出国，一些团体拒绝邀请他演讲。国务院不再允许他接触保密资料等。联邦调查局也展开了对他长时间的调查。关于他的案宗竟有几千页之多。从1953到1960年这段时间内，费正清这位一向“对涉及中国的公共政策极为关心”的人，(62) 被迫谢绝谈论当代中国问题。据其学术传记作家伊文思统计，他在这八年内发表的关于中国政策的文章加起来不到75页。(63) 费正清转而埋首中国学的学科建设及历史研究，他采取间接的方式，以学者身份用自己的历史研究成果来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由于费正清的著作强调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从而为未来中美关系的突破打下了理论基础。费正清本人也因此被誉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天才策略家”(consummate strategist)。(64) 洛德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在美国，政客也好，学者、教师、记者也好，商人也好，任何人只要他对中国感兴趣，都“必须绝对阅读和吸收”费正清的著作。(65)

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在国际舞台上日显无能为力时，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费正清等人的意见。1966年美国国务院重新邀请费正清进入政府顾问行列。联邦调查局也在这时停止了对费正清长时间的调查。费正清开始重新出现在美国公共政策的论坛上，以舆论精英的角色影响中美关系。他主张美国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应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社会，并在联合国占有一席之地。费正清虽一时无法摆脱“遏制”政

策的影响,但他坚决反对把中国摒弃在国际舞台之外的孤立政策。他主张一种所谓“遏制但不孤立”(contain-cum-isolation)的新的对华政策。并积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奔走呼吁。这一目标在1971年实现后,费正清又立即成为中美建交的“主要鼓吹者”和推动者。(66)并在美国最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67)他的许多学术研究成果也越来越成为两国领导人制定双边政策的主要参考书。

费正清在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上的贡献得到了中美两国政府的承认。1971年费正清作为中国政府邀请的首批美国客人访问中国。1979年费正清应邀出席美国政府为邓小平副总理访美举行的国宴,并与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同桌而坐。同年他作为由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率领的美国政府访华团成员访问中国,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费正清虽已去世,但他留下的丰富遗产仍对中美关系发展有指导意义。如他一再强调的中美对“人权”问题因文化、历史和社会价值判断的不同而必然出现分歧,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成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主要竞争对手等观点,将对处理中美关系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有重大参考价值。

四、结语:费正清为什么成功

费正清在学术界占有不朽的地位。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讲座教授头衔的设立(现哈佛大学费正清讲座教授席位为目前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著名人类学家华琛(James L. Watson)拥有),1968年美国历史学会设立的费正清最佳东亚著作奖等都是他不朽的丰碑见证。他逝世时,哈佛校长尼尔·L·鲁德斯坦(Neil L. Rudenstine)告诉报界,“哈佛失去了一个巨人”。(68)亨利·罗沃斯基称费正清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69)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各大媒体均发表讣闻,并予以高度评价。他一生中收到了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许多荣誉博士学位,并在1986年获得了哈佛奖章。他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尊敬。一个学者孜孜以求的,他都得到了。费正清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他本人对此曾作过解释。面对弟子们在他60岁生日晚会上的一片赞誉声,他说,他能成功的原因“很简单。只要在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指中国。——引者注)和最了不起的大学(指哈佛。——引者注)之间取得有利地位就行了。”(70)他把自己创建中国学方面的成功归于哈佛,认为哈佛是“实现此目的的最佳战略据点”。(71)我应该把这一荣誉与哈佛大学出版社及毛主席分享”。(72)由此可见哈佛在他学术生涯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诚然,哈佛是导致费正清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哈佛在东亚研究方面出书之多、培养人才之众,影响之大是其他地方不能企及的。但这些都只是费正清成功的外在因素。内在因素仍是费正清本人。

他成功的首要因素是他的学术。即其既有学,又有术,学术兼备一身。学,指他的学问,教学能力。术指其出色的行政组织能力。(73)炉火纯青的待人接物技巧,口若悬河的辩才,富有外交家的谈判艺术等(74)。长期与费正清共事的赖世和教授认为费正清是一个“精通企业家技巧的大师”。他知道怎么募钱,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赖世和称“费正清是一个狡猾的学界政客,他在哈佛地位坚固,影响盘根错节。尤其精通如何操纵权力”。(75)书生大都有学无术,政客有术无学,费正清二者兼备,当然能取得超人的成功。

费正清成功的因素之二是他不是一个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提倡的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经世致用是他治学、育人的一个主要特色。正如谢伟思(John S. Service)所说,费正清“绝不是一个象牙之塔内的学者”。(76)干预政治、影响舆论,撰写雅俗共赏的学术著作等都是他赖以成功的重要方面。

因素之三是他始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厌”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珍惜时间。他之善于利用时间和珍惜时间在学生及同事中成为传奇故事。正是如此,他才有时间写出众

多高质量的作品，培养了许多一流人才及作出了许多其他惊人业绩。“学而不厌”的第二个体现是他的谦虚好学、虚怀若谷，注意并善于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他喜欢观点的交锋、学术辩论，并乐于同批评自己学术观点的人交往。正是由于这种不囿己见、兼容并蓄的大师风范，使费正清在学术上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并永远保持他在学术研究中的旺盛的活力及不断创新。

“学而不厌”使费正清成为一个杰出的学者，但“诲人不倦”则是使他成为一个学科创始人及许多优秀学者难以做到的“人之导师”的保证。和学与术一样，一流学者与伟大导师二者兼备是费正清成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费正清也有许多缺点。无论是他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及其他方面都有可商榷之处。然而，爱德华·吉本对伟大的拜占庭将军拜利萨纽斯所作的评价用在费正清身上是合适的：“他的缺点是由于受到时代的不良影响，而他的美德是属于他自己的。”

注释：

(1) Akira Iriye, "John K. Fairbank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Vol.1, Spring, 1992, pp.1-6.

(2) (4) (20) (23) Theodore H. White, "On Offering of History to Men Who Must Act Now," *Harvard Alumni Bulletin*, May 13, 1967, p.4.

(3) (32) (33) 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8, p.50.

(5) (10) (11) (26) (27) (31) (36) (40) (42) (43) (45) (46) (47) (52) (65) (69) (76) Paul A. Cohen and Merle Goldman, *Fairbank Remember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1; p.206; p.232; p.50; p.12; p.158; p.103; p.101; p.123; pp.157-158; pp.122-139; pp.161-166; p.123; pp.196-197; p.50; p.157; p.225.

(6) (21) (22) (34) (35) (39) (50) (54) (58) (70) (71)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2, p.146; p.351; p.355; p.359; p.361; p.361; p.448; p.377; p.315; p.447; p.454.

(7) 有关费正清详细出版书目，请参阅 Paul M. Evans and George H. Stevens ed., *The Writing and Published Statements of John K. Fairbank: A Chronological Bibliography, 1924-1989*.

(8) (9) (30) (66)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6, 1991, B12.

(12) (28) See Albert Feuerwerker, Rhoads Murphey and Mary C. Wright ed.,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6; p.5.

(13) (15) (16) (17) Fairbank, *China Watc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2; p.95; p.1; pp.95-96.

(14) (19) Fairbank, "Assignments for 1970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4 (February, 1969), p.862; pp.861-879.

(18) Ross Terrill, *The China Difference: A Portrait of Life*,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9, p.82.

(24) 对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解释模式，柯文曾撰文提出强烈批评。详见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25) (美)《知识分子》创刊号(1984年10月)，第5页。

- (29) *Commentary*, October, 1992, p. 60.
- (37) (41) (49) (55) (56) (63) (72) Paul M.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Inc. 1988, p. 181; p. 62; p. 179; p. 102; p. 123; p. 184; p. 280.
- (38) (51) (67) (68) *Harvard Gazette*, September 20, 1991.
- (44)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xix.
- (48) *Pacific Affairs*, Vol. 63, No. 4 (winter 1990-1991), p. 552.
- (53) 麦克法科语。 *Fairbank Remembered*, p. 232.
- (57) 参见 (美) 《知识分子》创刊号 (1984年10月), 第11页。
- (59) Sigmund Diamond, *Compromised Campus: the Collaboration of Universities w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
- (60) 1960年白修德曾当面指责肯尼迪不应攻击费正清。肯尼迪连连表示认错。认为他当年初出茅庐, 不谙世事, 出语有误。详见 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第470页。
- (61) *Time*, May 24, 1951.
- (62) 史华慈语, *Harvard Gazette*, September 20, 1991.
- (64)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February 1992, p. 237.
- (73) 费正清之精通行政管理, 以致于达到乐此不疲的地步。他自己曾对人说: “我喜欢创造机构”。语见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27, September 1991, p. 615.
- (74) 赖世和在任驻日大使期间曾在私下描述他在60年代同日本首相的谈判“形同与费正清交谈”。言外之意是谈判虽不太艰难, 但仍需外交技巧。由此可见费正清处事艺术之高。见 Reischauer, *My Lif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P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6, p. 214.
- (75) Reischauer, *My Lif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p. 115.

《美国研究》1994 年第 2 期

1945-1955 年中美关系史论文引文分析

侯颖丽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

基于 1945—1955 年中美关系史在中美两国交往史中的特殊地位, 以及中美学者就这段历史进行过有益的合作, 本文尝试以引文分析法得出的结论为依据, 考察中美学者引用有关文献的一些规律, 以及两国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现状, 并试图从文献的角度对两国学者的研究做出评价。

一、引文分析样本的选择

为了能较全面客观地反映我国学者使用有关文献的情况及我国学者研究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的水平与现状,本文选择1979—1989年我国学者发表的关于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的论文为来源文献。因为,随着1979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强烈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使中国学者清楚地意识到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意义。一支研究队伍逐步形成,一批学术论文相继发表。1986年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把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研究推向高潮。根据中美两国学者提交的会议论文,袁明教授和美国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教授主编的论文集《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1)于1989年出版,它为本文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份理想的样本。来源文献具体选择办法是:(1)为保证入选论文的数量,本文以杨玉圣编写的《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2)为蓝本,在它所收录的有关论文中进行筛选。这部《综目》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地介绍我国学者研究美国问题的书目。它收集了1979—1989年我国报刊发表的研究美国问题的有关中文论文、译文及资料。除公开发表的外,对内部刊物、非连续出版物、重要工具书、论文集等所载成果也尽量收载。(2)为保证入选论文的质量,凡被论文集收录的有关论文都将入选。同时,凡是在我国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将尽量收录,如《美国研究》、《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等等;一些小型的非本专业期刊上的论文将根据北大图书馆、北大国际政治系和国际关系研究所资料室的收藏情况进行选择。(3)关于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的译文不予录用;来源困难的期刊论文不予录用;未发表的博士、硕士论文不予选用;有关的书评和学术动态评述也不收录。具体来源文献及引文情况见表1-1。

表1-1 中国学者论文及引文情况

序号	题目	作者	出版物	引文篇数
1	1945-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后果	王缉思	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1989	50
2	从台湾海峡危机到中美大使会谈	贾庆国	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1989	23
3	论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起源	王缉思	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1989	26
4	1949-1950年的中国对美政策	陈晓鲁	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1989	19
5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观	袁明	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1989	18
6	赫尔利使华和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	陶文钊	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1989	28
7	1944-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确定	何迪	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1989	15
8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美国	饶戈平	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1989	26
9	历史的考验	资中筠	国际问题研究,1982.3	13
10	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与马歇尔调处	屠传德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一辑	11
11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剖析	王建伟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二辑	20
12	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台湾问题	时殷弘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二辑	21
13	从1947-1948年的一场辩论看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	袁明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二辑	15
14	赫尔利与1948年前后的国共谈判	牛军	近代史研究,1986.1	14
15	试评1945-1949年的美国对华政策	何志功	近代史研究,1985.1	20
16	40年代末中美调整关系试评	申晓云	近代史研究,1989.5	16
17	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与1948年的《援华法》	陶文钊	近代史研究,1988.3	15
18	赫尔利接受中共五点建议析疑	王真	近代史研究,1988.2	9
19	1947-1950年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关系的看法与美国对华政策	王缉思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8	17

20	院外援华集团和杜鲁门对华政策(1947-1949)	翟强	世界历史, 1986. 5	21
21	马歇尔使华与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	陶文钊	世界历史, 1986. 3	17
22	战后初期美苏国共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斗争	牛军	近代史研究, 1987. 1	20
23	评马歇尔使华	郭序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 1988. 2	14
24	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第一个转折点	李肇新	暨南学报, 1989. 2	14
25	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剖析	尚健宁	党史研究, 1987. 6	14
26	赫尔利使华与抗战胜利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	牛军	党史研究, 1985. 4	6
27	1944-1949 年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苏联牌	唐宝林	党史研究资料, 1985. 2	19
28	从杜鲁门“6·27”声明到美蒋条约的签订 评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形成	窦晖	党史研究资料, 1988. 3	11
29	1945-1949 年美国对华政策制订过程中的中共因素	邓泽宏	党史研究资料, 1988. 2	7
30	从赫尔利到马歇尔——浅析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失败的原因	张植荣	国际政治研究, 1989. 2	13

如果说中国学者对中美关系的考察与研究是在 1979 年中美建交后全面展开的, 那么, 美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恰恰是在 80 年代更趋成熟的。

(3) 正如沃伦·科恩(Warren Cohen)教授指出的:“或许过去十年我们取得的最大成就是, 越来越多的学者能够理解中国与美国的文化和社会。可以想像, 对中国的政策更恰当的分析将源于这种不断的理解, 如同源于其他方面一样。

(4) 美国学者的成熟性还表现在, 他们时常吸收社会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 如行为学方法, 对政策制订过程中的复杂性更为关注, 经常使用官僚政治模式解释政策的制订, 而不再把美国政府看成是一个一元的行为体。(5) 因此, 本文也将美国方面的来源文献的发表时限定为 1979—1989 年, 即美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关于 1945—1955 年中美关系史的论文。把中美学者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时限定为一个时期也便于我们考察两国学者在同一时期占有各类文献的情况, 更便于对他们的研究进行比较分析。

选择美国学者的论文将采取以下办法:(1) 以美国《社会科学论文索引》

(6) 为基础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有关论文。《索引》收录了 353 种专业性和学术性较强的期刊, 而且注重文史哲, 特别是地区研究。经统计, 它共收录 30 余种有关国际关系、政治学及亚洲研究的期刊。(2) 因为《索引》不收录论文集集中的论文, 所以本文还将收录美国出版的论文集集中的有关论文。没有被《索引》收录的研究国际关系的刊物上的有关论文也尽量选用。(3) 一些来源困难的有关期刊(即北京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没有收藏)的论文将不予收录, 有关的书评和动态性评述不予收录, 未发表的博士和硕士论文不予收录。具体来源文献及引文情况见表 1—2。

表 1-2 美国学者论文及引文情况

	Title	Author	Publication	Citation
1	The Self-Inflicted Wound: The China White Paper of 1949	Robert Newman	<i>Prologue</i> , Fall 1982	37
2	American Nationalism, the China Myth, and the Truman Doctrine	David Mielenn	<i>Diplomatic History</i> , Win. 1986	48
3	The Chennault Plan to Save China: U.S. Containment in Asia	William Leary	<i>Diplomatic History</i> , Spr. 1984	38
4	American Policy Toward	Nancy Tucker	<i>Diplomatic History</i> , Spr.	61

	Sino-Japanese Trade in the Postwar Year		1984	
5	A New Look at American Mediation in Chinese Civil War	Steven Levine	<i>Diplomatic History</i> , Fall 1979	29
6	Clandestine Chinese Nationalist Effort to Punish Their American Detractors	Robert Newman	<i>Diplomatic History</i> , Sum. 1983	21
7	The China Aid Bill of 1948: Limited Assitance as a Cold War Strategy	John Feaver	<i>Diplomatic History</i> , Sum. 1981	18
8	Congress and the Cold War -- United States China Policy 1955	P. J. Briggs	<i>China Quarterly</i> , 1981, 85	21
9	Acheson, His Advisers, and China, 1949-1950	Warren Cohen	<i>Uncertain Years</i> , 1980	20
10	The Strategy Perspectiv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efensive Perimeter" Concept, 1947-51	John Gaddis	<i>Uncertain Years</i> , 1980	44
11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0	Nancy Tucker	<i>Uncertain Years</i> , 1980	64
12	Mao Tse-tung and the Issue of Accommodation with United States, 1948-1950	Michael Hunt	<i>Uncertain Years</i> , 1980	73
13	Chinese Communist Policy Toward the U.S.: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1944-1950	Steven Goldstein	<i>Uncertain Years</i> , 1980	49
14	Notes on Soviet Policy in China and Chinese Communist Perapptions, 1945-1950	Steven Levine	<i>Uncertain Years</i> , 1980	9
15	On the Brink of Disaste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5	Steven Levine	<i>Sino-American Relations</i> , 1945-1955	5
16	Roosevelt, Truman and China	Robert Messer	<i>Sino-American Relations</i> , 1945-1955	28
17	The Marshall and Wedemeyer Missions	William Stueck	<i>Sino-American Relations</i> , 1945-1955	64
18	Sino-American Relation, 1948-50: Lost Chance or No Chance	Steven Goldstein	<i>Sino-American Relations</i> , 1945-1955	30
19	American Policy and Perspective: The Sino-Soviet "Wedge" Strategy, 1949-1955	John Gaddis	<i>Sino-American Relations</i> , 1945-1955	53
20	The Korean War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	Jonothan Pollack	<i>Sino-American Relations</i> , 1945-1955	32
21	To Islate China: The First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s Policy in Asia	Nancy Tucker	<i>Sino-American Relations</i> , 1945-1955	56

22	The Legacy of the Decade for Later Years: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Harry Harding	<i>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55</i>	24
----	---	---------------	---	----

二、对引文的一般性分析

1. 引文的引文量分布情况

如表 1-1 和表 1-2 所示, 中国学者的论文共计 30 篇, 引文总篇数为 532, 美国学者的论文共计 22 篇, 引文总篇数为 824。前者引文最多的论文有引文 50 篇, 最少的有引文 6 篇, 后者引文最多的论文有引文 71 篇, 最少的有引文 5 篇。虽然美国学者的论文比中国学者少 8 篇, 但引文总数比中国学者多 292 篇。在引文篇数的分布方面, 引文篇数在 30 以上的论文占美国学者论文的 63.6%, 而引文篇数超过 30 的论文只占中国学者论文的 3.3%。多数中国学者的引文篇数在 10-20 之间, 它们占论文总数的 73%。从引文量的平均值看, 中国学者引文量的平均值是 17.7 篇/篇 ± 1.4, 美国学者引文量的平均值是 37.5 篇/篇 ± 3.7。上述几种统计数字说明, 从总体水平看, 中美学者在文献的利用上存在着差距。

2. 引文的类型分布情况

根据引文的特征, 本文将其划分为以下几类: (1) 外交文书与档案, 包括有关政府出版物、会议记录、备忘录及口述历史等; (2) 图书, 包括专著、译著、文集等; (3) 报刊, 包括发表在报纸和期刊上的有关文章等; (4) 回忆录、日记; (5) 在上述四种类型之外的文献均划归此类, 包括各种工 岭惊翌约拔捶 1.韻 的论文等。

为了能全面了解中美学者引用各类文献的广度和深度, 本文将同时采用“按篇计数”和“按次计数”两种方法统计引文的类型分布, 具体情况见表 2-1 和表 2-2。

表 2-1 中美学者引用各类文献篇数的分布情况

	原始档案类		图书类		期刊类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中国	156	(29%)	248	(47%)	69	(13%)
美国	216	(26%)	364	(44%)	148	(18%)
	回忆录类		其他		总数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中国	53	(10%)	6	(1%)	532	
美国	51	(6%)	44	(5%)	824	

表 2-2 中美学者引用各类文献次数的分布情况

	原始档案类		图书类		期刊类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中国	1002	(58.6%)	477	(27.9%)	123	(7.2%)
美国	1876	(57.8%)	768	(23.7%)	419	(12.9%)
	回忆录类		其他		总数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中国	101	(5.9%)	6	(0.4%)	1709	
美国	108	(3.3%)	75	(2.3%)	3248	

从表2-1可以看出,在美国学者的论文少于中国学者的情况下,除回忆录类文献,中国学者比美国学者多引用两篇外,其他四类文献被引用的情况是美国学者多于中国学者,原始文献多60篇,图书类文献多116篇,报刊类文献多79篇,说明中国学者对上述四类文献的占有量远远少于美国学者,更说明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文献建设落后于美国。如果表2-1反映了我国学者引用各类文献的范围还有待拓宽,那么表2-2则表明我国学者对各类文献的引用深度还需加强,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某类文献被引用次数的多少反映了它被利用的程度。表2-2的统计结果表明,我国学者引用各类文献的次数均少于美国学者,其程度超过表2-1的统计结果,尤其是前三类文献,中美学者分别相差874、291和296。上述状况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美学者的学术水平。

表2-1以篇计算的数字说明,有近1/3的参考文献是由外交档案提供的,它们分别占中美学者引用文献的29%和26%。然而,在表2-2中,中美学者引用外交档案材料的次数竟占总引用次数的58.6%和57.8%。上述结果表明,中美学者引用的外交档案相对集中,但深度很强。可以肯定,外交档案是研究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的学者第一位的文献来源。被中美学者最广泛使用的外交文献是美国国务院每年按年代划地区或专题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7)。而那些虽已公开,但并没有出版发行的外交档案,特别是私人档案,对我国学者来说还是鞭长莫及,不过从中国学者的引文中时常看到这类材料,说明我国一些学者在美国实地进行了查阅。还有一些收藏在总统图书馆及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珍本书及手稿图书馆的外交档案材料被美国学者大量使用,我国学者则很少用到,如杜鲁门图书馆的杜鲁门文件、艾森豪威尔图书馆收藏的有关文件、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文件和口述历史,以及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有关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的文件和口述历史等等。

已公开的有关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的中文档案材料虽然不多,但它们已初步改变了以往中国学者反而不能充分利用中国档案资料的状况,如《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8),《停战谈判资料》(9),《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10),《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11)等等。还有台湾出版的一些史料,如《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12)。我国学者还使用了一些没有公开的有关档案材料。

总之,在中美学者引用的有关外交档案材料中,美国方面的档案材料更完整、更系统。美国政府不仅颁布了有关法律,规定30年的外交档案解密期,从而在法律上保障了档案向学者开放,而且组织人力物力财力编撰出版这些档案,从而提高了档案的利用率。同时,在美国,外交档案的来源是多层次的,有国务院系统、国会系统,也有总统图书馆、大学和研究图书馆,既有官方的,又有民间的,充分显示各级组织机构对原始档案建设的重视。

在表2-1中,图书类文献占中美学者总引文篇数的47%和44%,说明前人和同代人的研究成果是我们今天研究工作的基础。在表2-2中,图书类文献仅占中美学者总引文次数的27.9%和23.7%,又说明中美学者引用的图书相对分散。这种分布状态与外交史的研究性质密不可分。研究外交史的学者引用他人的著作通常是引用他人的观点,大量的信息还是来自第一手资料。中美学者引用图书类文献的具体情况参见后两种引文分析。

报刊类文献占中美学者引文篇数的13%和18%,占引文次数的7.2%和12.9%,表明报刊在中美学者的参考文献中不占突出位置。虽然回忆录和日记类文献在中美学者引用的总文献中也不占显著位置,但是它们对原始档案的解释和补充作用,是学者们不应忽视的。这类文献在中国学者引用的文献中所占比例大于美国学者,是因为我国在80年代出版了大量有关历史人物的回忆录,我国学者相对多地引用这类文献也是弥补原始档案相对少的不足。

3. 引文的语种分布情况

经统计,中美学者共引用 1 3 5 6 篇文献,其中英文 1 0 8 2 篇、中文 2 7 2 篇,其他语种 2 篇,它们分别占总引文量的 7 9 . 8 %、2 0 % 和 0 . 2 %,说明英文的有关史料以及以英文发表的学术成果多,也说明只要掌握了英语就能获得大部分有关那段时期中美关系史的文献资源。

表 3-1 的统计结果表明,中国学者只引用了中英文两个语种的文献,分别占中国学者总引文量的 4 2 % 和 5 8 %,说明我国学者的引文语种分布适中,没有过分依赖某一语种的文献,同时也说明他们的英文水平较高,使用的英文文献超过中文文献。虽然美国学者引用了中英文以外的其他语种文献,但其微乎其微,只占美国学者总引文量的 0 . 3 %。很显然,中文文献占美国学者总引文量的比例也极低,只有 6 %,而英文文献竟占到 9 3 . 7 %,这种极不平衡的比例关系说明,美国学者是以英语为主要工具检索文献,他们对中文的掌握程度远不及我国学者对英文的掌握程度。外交档案、图书及报刊等三种类型文献的语种分布情况见表 3-2。

表 3-1 引文语种的分布情况

	中文		英文		其他		总数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中国	222	(42%)	310	(58%)	0	0	532
美国	50	(6%)	772	(93.7%)	2	(0.3%)	824

表 3-2 各类文献的语种分布情况

	原始档案类		图书类		期刊类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国	48 (31%)	108 (69%)	91 (37%)	157 (63%)	46 (67%)	23 (33%)
美国	6 (3%)	208 (96%)	24 (7%)	340 (93%)	15 (10%)	133 (90%)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学者仅依靠本国语文及资料去研究该国与另一国的外交关系,对该国的研究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美国学者受语言的限制,只能依靠本国的资料了解和研究中美外交关系,这种不正常的“一边倒”现象对美国学者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4. 引文的著者分布情况

鉴于外交档案本身并不能说明研究水平,而报刊类文献在中美学者的引文中所占比重不突出(见表 2-1 和表 2-2),本文只对图书类文献的作者进行统计,统计方法是“按次计数”。为了能反映学者的真正水平,一些领导人的论著将不被列入统计范围,如《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等。1 9 4 5-1 9 5 5 年中美关系研究的核心作者见表 4。

表 4 1945-1955 年中美关系史研究核心作者一览表

	作者	书名	出版年代	被引次数
1	Dorothy Borg	<i>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i>	1980	58
2	Tang Tsou	<i>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i>	1963	32
3	Robert Blum	<i>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i>	1982	30
4	Nancy Tucker	<i>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50</i>	1983	29
5	William Stueck	<i>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50</i>	1981	22

6	Akira Iriye	<i>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i>	1977	15
	Michael Schaller	<i>The U. 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i>	1979	15
7	Ernest May	<i>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1945-1949</i>	1975	13
	James Reardon-Anderson	<i>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1944-46</i>	1980	13
	Foster R. Dullas	<i>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1949-1969</i>	1972	13
	Allen S. Whiting	<i>China Cross the Yalu</i>	1960	13
8	John Gittings	<i>The World and China, 1922-1972</i>	1974	12
9	Rossel D. Buhite	<i>Soviet-American Relation in Asia, 1945-1954</i>	1981	11
	Suzanne Pepper	<i>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i>	1978	11
10	Stuart Schram	<i>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i>	1969	10
	Kenneth T. Yong	<i>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The U. S. Experience 1953-67</i>	1968	10
11	Robert Ballek	<i>Franklin D. Ros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i>	1979	9
12	John L. Gaddis	<i>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i>	1982	8
	Ross Koen	<i>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i>	1984	8
13	Townsend Hoops	<i>The Devid and John Foster Dullas</i>	1973	7
14	Bernarld Brodie	<i>War and Politics</i>	1973	6
	J.H. Kalicki	<i>The Pattern of Sino-American Crisis: Political-Military Interaction in the 1950s</i>	1975	6
	R. MacFarquher	<i>Sino-American Relation, 1949-1971</i>	1972	6
	Warren I. Cohen	<i>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i>	1980	6
15	William Stueck	<i>The Wedemoyer Mission: American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i>	1984	5
	Lionel Max Chassin	<i>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A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1945-1949</i>	1965	5
	John Davies	<i>Dragon by the Tail: American, Britain, Japanese 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i>	1972	5
	David Mayers	<i>Cracking the Morolith: U. S. Policy Agains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55</i>	1986	5
	Rosemary Fost	<i>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Diment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45-50</i>	1985	5
	Herbert Feis	<i>China Tangle</i>	1953	5
	Lloyd Eastman	<i>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i>	1972	5
	Stuart Gelder	<i>The Chinese Communist</i>	1946	5
	James Nathan	<i>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World Order</i>	1981	5

在数据的统计过程中发现, 5 2 篇来源文献共引用 2 3 0 多位作者的 2 4 0 多部著作, 其中 8 0 % 以上被引用不到四次, 5 5 % 仅被引用一次. 根据这一情况, 本文将被引用五次以上的图书的作者列为 1 9 4 5 - 1 9 5 5 年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核心作者, 他们占全体被引用

作者的15%。

从核心作者表可以看到,除一名英国作者外,其他均为美国学者,中美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差距表现得非常明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建国到70年代末,多次政治运动使中国学者的研究环境遭到破坏,而美国学者在50年代以后的学术研究从未中断过。在核心作者中有51.5%的美国学者是在50—70年代完成他们的专著,在30多年的研究基础上,美国学者在80年代取得了更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在1979—1989年十年间发表的著作占核心作者著作的45.5%。但是,中国学者在这一时期仅发表两部著作,一是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5》(13),一是袁明和哈里·哈丁主编的《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由于受出版年限的限制,它们的被引用情况受到影响。其次,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历史著作毫不例外地都是借助于浩若烟海的第一手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那些不断被解密的外交文件推动着外交史研究的发展,通过它们外交史学者才能更清晰地把握历史进程。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40年代外交档案的解密,美国学者发表了大量关于那段历史的批评性著作,形成一股重新评价美国对华政策的潮流,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却受到这方面条件的限制。

综上所述,在对引文进行的四种分布研究中,中美学者的引文在类型分布上大致相同,反映出两国学者需要的情报源类型一致。从引文的语种分布情况看,中国学者占有语言上的优势,而引文的作者分布反映美国学者的研究水平领先于中国学者。上述分析结果为本文进一步综合考察中美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文献与研究

在这一部分里,本文将以引文为入口,从文献的角度对中美学者的研究做出评价。

在“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同一主题的研究中,中美学者论文所含的引文量悬殊很大。当然,引文量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有客观因素,如文献的收藏情况,也有主观因素,如一名研究人员不能把所查阅的全部文献体现在引用文献中。但是,在中美关系这一研究领域,引文量的不同更主要反映出中美学者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方法。美国学者采取的“二战”后盛行于美国的诠释性历史写作法,它强调历史研究不仅要注重资料的准确性,也应注意对历史事件意义的阐述。(14)这种诠释性写作法在文献的引文中表现得更为突出。针对某一观点或某一事件的一个注释经常引用多种参考文献,有原始资料,也有专家评述,内容非常详实。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在他的《美国的政策与看法:1949—1955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一文中,为证明美国官员已开始考虑怎样才能实现“中国铁托主义”目标,(15)在注释中引用了四份政府文件的内容,证明所述情况的准确性,又引用两部专著的观点解释“铁托的反叛给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想法造成的总体影响”。

如果关于某一看法的第一手资料不充足,美国学者经常在文章中强调并在注释中列出第二手资料的来源。威廉·斯图克(William Stueck)在《马歇尔与魏德迈使华》一文中强调,有关苏联、国民党和中共对马歇尔使团真正意图的文件有限,只能进行许多猜测。(16)作者在注释中罗列了两篇论文和八部专著作为第二手资料,接着又列出四种“有用的第一手资料”。(17)

有时美国学者不仅在注释中注明引文的出处,而且还将引文的内容写在注释里而不是正文里。南希·塔克在《孤立中国,第一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政策》一文的正文中说,政府决策者关于美国应对中国的贸易采取什么态度“各执一词”(18),但是,作者并没有接着指出持两种意见的具体代表人物,而是在注释中指出他们的名字和具体观点。(19)

上述几种引用文献的方法在其他美国学者的文章中也普遍存在,所以美国学者的引文量大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他们已将论文的内容延伸到引文的注释部分,两者成为浑然一体,

构成一部完整的作品。

与美国学者的注释性研究方法强调深入挖掘资料不同,中国学者更强调对外交历史事件的宏观把握。可以这样说,中国学者往往较多强调外交政策中体现着方针和原则的一面,美国学者则经常强调具体的外交政策。反映到中国学者的论文引文中常常是注释简单。在多数情况下,一条注释只引用一种资料、一部专著或一篇文章。除非直接引用某位著者著作中的某句话,很少将该著者的观点引入注释中。而且,中国学者很少在注释中阐述问题,更多情况是在正文中说明问题与观点,其结果直接导致中国学者的引文量少于美国学者。

从文献的角度看,两种研究方法各有千秋。引文过多可能使新的信息不突出,过少又不能提供足够的引文背景线索。但是,就史学研究而言,美国学者的方法也许更为可取,因为史学研究强调材料详实,多一份材料就多一份论证依据,依据充足就使论证的可靠性增强。同时,那些引文量大的文献对后人的研究更具参考价值,因为它们往往是后人从事研究工作的入口处。

事实证明,我们不仅能从学者引用文献的不同方式看到不同的研究方法,而且能从学者引用文献的内容看出他们掌握文献的准确程度,进而了解学者对某一研究对象的整体形象把握。

实际上,一份材料能使学者的研究走得相当远,也能将学者引入歧途。被中美学者广泛使用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所收录的有关中国的材料也并没有做到准确无误。例如,在《文件集》第8卷第16—18页和第357—360页上记录着一些关于1948—1949年中共上层在对美苏政策问题上发生分歧的分析。(20)一些美英观察家认为,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毛泽东正处于亲苏集团压力下。在1949年他还是持较开明立场的,在他的周围那些亲苏的“强硬派”和“温和派”周恩来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在1949至1950年,美国国务院的电文中多次提及一些人的名字,他们分别属这意见不一的两派。斯蒂芬·戈德斯坦(Steven Goldstein)在《失去的机会,还是根本没有机会》一文中批评了《文件集》中的这一分析,认为这种划分是西方观察家的判断,它们的证据极不可靠。(21)但是,某些美国学者并没有像戈德斯坦那样对材料采取审慎的态度。《文件集》中收入了一份1949年6月由美国驻华总领事发回华盛顿的电报,内称:据澳大利亚记者科恩说,周恩来曾透露,在对美关系问题上中共最高层发生分歧。(22)一些学者以此作为论证的依据,如罗伯特·布拉姆(Robert Blum)在1978年8月13日的《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题为“北平电报:1949年的一次戏剧性事件”的文章,他对那份电报表示较少的怀疑,(23)他的文章还时常被其他学者引用。持这种态度的人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政治情况了解不够。事实上,从抗战后期到建国初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高度统一的时期。中共对外政策始终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制定的。重大决策都由毛泽东作出,周恩来是他的主要助手。一个高度集中的处理对外事务的体制对一个绝大多数干部来自农村,甚至相当数量的高级干部也缺乏外事工作经验的党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没有美国学者所设想的那种亲美派或亲苏派之分。(24)

因此,就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研究总体而言,美国学者还需要突破阅读中文资料的语言障碍,需要扩大与加深对中国事务的了解,更需要了解中国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只有做到这些,他们才能塑造出一个真实可信的中国形象。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学者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还处于发展阶段。但他们能借助英语广泛阅读有关的美国文献,了解美国社会与政治,所以他们具备一些美国学者所不具备的优势。

四、结 论

经过以上几部分的分析与探讨,我认为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 中美学者引用文献的类型大致相同,各类型文献所占比重基本一致。但是,中美学者引用各类文献的篇数与次数有较大悬殊,说明我国学者还需要提高文献使用的广度和深度。中国学者在语言方面的优势使上述问题一定会逐步得以解决,美国学者还应该尽量多地阅读中国方面的材料,才可能对所提出的重要问题给予尽可能全面的回答。

2. 在本文得出的核心作者表中还没有一位中国学者,说明中美学者对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差距明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一方面中国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处于发展阶段,而美国学者的研究已趋于成熟;另一方面,研究中外关系的中国学者可以阅读的外国资料每每多于中方资料,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研究者目前无法摆脱的束缚。经过十年努力,中国学者已取得可喜成就,有关专著和专集已经出版,它们既是对过去十年研究工作的总结,又是今后学术发展的起点。可以发现,中国学者的成熟期已初见端倪。

3. 美国学者的引文详实,注释内容完整。美国学者的引文简明扼要,甚至有些学者的论文注释不完整。这一现象应该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4. 从研究方法上讲,对于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的研究,美国学者汲取了社会科学多种方法论。首先他们非常重视对史料的占有与掌握,力求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探寻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和发展形式,并注重对史料的解释与分析。其次,美国学者将政治学的政策制订过程、官僚政治模式的研究方法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中。他们从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和政治体制、决策机构和决策程序的特点等角度考察中美两国的外交决策。美国学者引用了大量有关中美国内政治的文献。第三,一些美国学者试图用比较政治文化差异的方法把握中美关系的特点,并以文化差异来解释中美冲突的根源。第四,美国学者还把历史心理学引入这一领域,研究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导致那些心理活动的各种因素,如个人素质、文化教养和个人经历对制订外交政策的影响。在美国学者引用的文献中不乏一些关于领导人物的个性研究。

与美国学者相比,中国学者还应该开阔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视野,增加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层次,吸收一些新理论,采用一些新方法,改变过去那种单线式或双线式记述阶段的研究方法,不能仅仅用基本矛盾分析法解释一切。但是必须指出,一些美国学者的对华政策研究过于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以至陷入盲目,对历史事件缺乏宏观把握。目前,我国学者已注意到影响外交政策的各种复杂因素,并开始吸收多种方法研究中美关系史。

注释:

(1) 袁明,〔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 杨玉圣:《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 Robert J. McMahon, "The Cold War in Asia: Toward a New Synthesi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2, No. 3, Summer 1988, p. 309.

(4) Warren I. Cohe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45", See Warren I. Cohen ed., *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83, p. 164.

(5) 同(3),第310页。

(6) Social Science Index, New York: Wilson, 1974-, with annual cumulations.

(7)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8)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
- (9) 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停战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10) 《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 (11)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
- (12) 秦效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台北：中华文物供应社1980年版。
- (13)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5》，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 (14) 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三论”，《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162页。
- (15) (美) 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美国的政策与看法：1949—1955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见袁明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
- (16) (美) 威廉·斯图克(William Stueck)：“马歇尔与魏德迈使华”，见袁明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页。
- (17) 同上，第172—193页。
- (18) (美) 南希·塔克(Nancy Tucker)：“孤立中国，第一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政策”，见袁明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页。
- (19) 同上，第396—397页。
- (20) 转引自(美) 斯蒂芬·戈德斯坦(Steven Goldstein)：“失去的机会，还是根本没有机会”，见袁明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196页。
- (21) 同上，第196页。
- (22) 同上，第210页。
- (23) 同上。
- (24) 章百家：“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评述”，《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52页。

○书 评

政 如 其 人

——读《基辛格传》

崇 岭

在1973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即将被任命为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成为美国最受羡慕的人物。有关这位20世纪最有声望、最富传奇色彩的外交家之一的传记、专著，已

在美国出版了近20种之多。其中《时代》周刊编辑沃尔特·埃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撰写的《基辛格传》(*Kissinger: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就其广度、深度和所引用的第一手材料来说, 堪称研究基辛格的权威著作。

为完成这部长达近900页的长篇传记, 作者曾采访了150多人, 其中有包括基辛格母亲在内的亲友, 有包括前总统尼克松、福特在内的政要, 有基辛格过去的助手和同事, 还有外国领导人和外交官。作者并搜集了有关基辛格的大量私人文件、信件、电话记录、工作日志、保密会议记录, 甚至还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电话窃听记录。基辛格本人亲自接受作者正式采访20多次, 为作者提供了很多资料和其他方便。如此丰富的原始材料, 使本书得以全面叙述基辛格如何从纳粹德国迫害下的犹太儿童, 成长为美国陆军反谍报机关的军士, 又如何从叱咤风云的外交家, 变成年收入高达800万美元的公司、企业、银行顾问。

真实性是衡量传记的首要标准。按理说, 只要埃萨克森忠实于他苦心搜集的材料, 本书的真实性就不应有多大问题了。然而读罢作者附于书后的资料来源说明, 才明白了一个外交史学者早该明白的道理: 切勿迷信文件档案。从政之后的基辛格说过: “外交文件的记载向来很少反映现实。假如我过去就了解我今天所了解的情况, 我决不会根据档案去写有关梅特涅的论文。”在复印机、电脑等现代办公设备出现之后, 伪造文件、炮制谈话备忘录以掩盖真相等手段, 更十分普遍地被官方所采用, 使现在和未来的历史学家难辨真假。作者引用基辛格本人的话说, 将来的学者将“无从掌握标准, 去辨别哪些文件是炮制出来作伪证的, 哪些文件是真正指导决策的。”书中披露, 只要基辛格能发现秘密渠道, 他几乎从来不在正式外交渠道里留下真实记录。例如, 在有关70年代的美越巴黎谈判期间, 基辛格经常要他的助手安东尼·莱克(现任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温斯顿·洛德(现任克林顿政府助理国务卿)就同一次谈话, 撰写三四份不同内容的谈话备忘录, 交给不同的阅读对象。有一次, 尼克松给基辛格发了一份“密电”, 宣称将要恢复轰炸越南北方, 然后在另一份密电中指示基辛格将上封电报的内容故意透露给谈判对手, 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解密”文件或未解密的文件尚且如此之不可靠, 作者的采访对象说了多少真话, 就更无法测知了。好在被采访者中, 基辛格的密友和政敌兼而有之, 可以对事实描述加以核对和比较。但无论如何, 本书提醒我们, 今后学者在判断什么是“历史真面目”时, 必须慎之又慎。对于本书中许多有关个人生活和政治事件的引人入胜的细节描写, 只能姑且读之。

因此, 更应该引起学者兴趣的, 是本书对这位具有多重人格特点的政治家毁誉参半而又富于哲理的评价。拿破仑曾说当年奥地利外交家梅特涅的政策和阴谋诡计没有什么区别。在埃萨克森笔下, 作为梅特涅崇拜者的基辛格, 既会娴熟运用政策, 又懂得使用阴谋诡计; 既是运筹帷幄的战略家, 又是工于心计的战术家。他将学者的严谨和政客的狡诈融于一身, 连最激烈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他智谋过人。他的智慧产生于一种理论与灵感的结合, 善于在抽象思维的框架里把握不同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埃萨克森的比喻是: “他像一只蜘蛛, 在自己编织的丝网里, 能够感觉到——有时过于敏锐地感觉到——在世界某一角落里的一个举动, 在另一个角落里引起了震撼。”

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是现实主义的权力均衡。过去, 研究者多把这种思想归因于他作为国际关系学者时, 对于欧洲外交史的钻研。本书作者则另辟蹊径, 强调少年经历给他的政治行为留下的烙印。他是纳粹意识形态狂热的受害者。在他成长的环境下, 相互信任和道德准则遭到无情的破坏, 因而很自然地产生了对人性的悲观态度。基于性恶论, 他懂得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 如何利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间的矛盾和他人的弱点, 以诡谲善变的手法, 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安全感、稳定和秩序。在移居美国以前, 基辛格在一封信里写道: “弱小是死亡的代名词”, “人们有时只能在谎言下才能生存。”他所崇拜的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 相信的是人的直觉和灵感在历史中的作用, 鼓吹的是权力意志。

逆境培养出来的基辛格生性自傲、孤独、多疑。在学术方面, 他充满自信, 不惧怕公开

争论,敢于应付理论挑战。但在待人接物时,他总是表现出一种不安全感,喜欢保密,长于欺骗。思想理论中的自尊,人际关系中的精神紧张,社会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意识,反映到他的外交政策中,就是相信权力而非道义原则决定了世界秩序,相信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比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更高明,更有效。同时,基辛格认为,依据国际道义和国际法的理想主义外交宜于公开推行,而现实主义外交必然建立在拿领土、金钱和权力做交易的基础之上,必须采取秘密行动以至欺瞒手段才能达到相互妥协的目标。如果这种交易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或者拿到美国国会去讨论,当然会遇到挫折和失败。

书中提到,基辛格的权力意识,对美国官僚体制的不信任感,与尼克松的性格特点和政治需要一拍即合。在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缓和中美关系、签订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东和谈等历史进程中,尼克松和基辛格导演了一系列秘密外交行动,国际舞台上的轰动性新闻此起彼伏。基辛格觉得,只有绕开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其他国务院官员,他1971年的首次北京之行才能达到目的;只有把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美方正式代表史密斯蒙在鼓里,才能同苏联达成协议。在无数这类事例里,基辛格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外交成就,同时也埋下了同僚嫉恨的种子。水门事件中尼克松使美国政府蒙受耻辱,本人也丧失了政府官员的支持。基辛格在这一时期不断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外交决策圈里树敌过多,加深了尼克松的政治危机。基辛格骄横跋扈,在政府高层人缘不佳,以至于共和党1981年再次上台之后,他未能谋到任何正式的政府职务。

本书着力刻画了基辛格为了攫取权势,如何在政界中扩大私人关系网,利用他人的虚荣心和权力欲,不惜在同事之间制造嫌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一次,他对退休外交官哈里曼说,如果哈不再攻击尼克松,他会提议在政府中给哈安排一项职务。听到这次谈话的一位助手后来问基辛格,是否真的存在给哈里曼安排职务的可能性。基辛格回答说,他并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在决定该说什么话的时候,真实性是无所谓的”。

基辛格在外交活动中表现的是同样一种风格:用施展魅力、利益诱惑、阿谀奉承、表里不一的手法,在各国政治家之间纵横捭阖,为实现他的外交目标而不择手段。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在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之间,他用奉承话讨好各国领导人,当着一方的面贬损另一方,企图让每一方都以为他在为自己出谋划策。他在中东的穿梭外交,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技巧和个人性格。

虽然作者对基辛格的为人和政治品质颇有微词,却并未因此而否定他的历史地位和政策思想,甚至也没有完全否定他的道德观。作者指出,基辛格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光彩夺目的日子,正是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时期。70年代初期,越南战争失道寡助,美国军力捉襟见肘,苏联在第三世界咄咄逼人地夺取势力范围。在美国实行战略收缩的背景下,基辛格的权力均衡政策可能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成为出色外交家是时势造英雄。在作者的眼光里,就对国家安全的贡献而论,基辛格的历史地位应同史汀生、马歇尔和艾奇逊相伯仲;他和凯南可以并列为影响最大的外交思想家;他无疑是本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谈判能手。

那么,什么是基辛格最大的建树呢?本书的结论是:他有意识地参与创造了新的全球权力均衡,是美国在越南战争后保持了在全世界的影响,最终为冷战的结束奠定了基础。在美国国内,他一方面顶住了鸽派和自由派要求放弃同苏联争霸的压力,另一方面又顶住了鹰派和新保守势力要求同苏联全面对抗的压力。他主张在遏制苏联的同时与之缓和关系,以静观苏联内部矛盾的激化。70年代初的基辛格和40年代末的凯南一样,相信莫斯科只有向外扩张并夸大外部威胁,才能维护国内统治,而缓和加遏制的两面政策,将最终促使苏联解体。作者说,回顾这段历史,基辛格是胜利者。基辛格打开通向北京的大门,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给美国外交创造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把握全球均势的杠杆,亦功不可没。“当冷战结束时,这一现实主义的遗产帮助美国在一个新的全球环境中,以多权力中心和均势为基础而运作。”

这样说来，基辛格的成功又是英雄造时势。

同时，作者敏锐地观察到时局变化和美國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基辛格的制约。他是特殊历史时期（美国在冷战中被迫采取守势）的特殊历史人物（持欧洲传统保守思想的美国外交家），而且只有像尼克松这样对权力平衡有着特殊敏感的共和党领袖，才会把他推上国际政治舞台的前沿。然而事过境迁，基辛格奉行的那种政治现实主义很快就被卡特的人权外交和里根推动的“民主革命”浪潮所冲淡。直至今日，美国外交决策者都必须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力图将维护全球政治稳定和推进西方民主取向的变革摆在同等地位上。

书中引用基辛格的亲密助手伊格尔伯格（布什时期的副国务卿）的话说：“亨利是一个主张权力均衡的思想家，他深信稳定的重要性，而这一目标是同美国传统格格不入的。美国人总是想追求一套道德规范的实现。亨利对美国政治制度缺乏内在的直觉，他不是按照同样的基本价值观和出发点办事的。”也就是说，基辛格将权力均衡作为外交根本目标，忽略世界民主化，不符合美国外交思想的主流。他的秘密外交方式，也很难同当代美国政治的运转方式接轨。

但是，基辛格为维护美国实际利益而牺牲某些抽象的法治和道义原则，运用某些不可告人的手段，在他本人看来并非违背道德。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达到世界稳定的最终目标。促进本国利益，保护世界不受战争威胁，是基辛格等现实主义外交家眼中的最高道德。他因签订关于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协定而获得 1973 年诺贝尔和平奖。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于 1988 年举行的一次聚会上，有人对基辛格玩弄权力政治的不道德行为加以抨击。在为自己辩护时，基辛格谈到他有十几个亲戚死于纳粹的屠刀之下，因此体会到只有在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才谈得上为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而奋斗。他说，外交决策者的责任不同于人权斗士或和平主义者，不能按纯粹的理想来指导本国的国际行为。

通观全书可以看出，作者理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同情基辛格的处境，但拒绝认同他的价值观和政策取向。埃萨克森认为，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既是弱点，也是优势，美国赢得冷战胜利靠的主要不是军事实力，而是其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吸引力。作者和许多美国评论家一样，欣赏基辛格的卓尔不群，但又认为他所代表的权力政治观不足为训。这是本书的中国读者可以细心品味的。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是非时，应有自己的尺度，而在评价基辛格时不能忘记：他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政治家。

中国美国学史：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兼评李本京先生等的新著

杨玉圣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何谓“中国美国学史”？这是一个迄未作过明确界定的问题。依笔者浅见，所谓“中国美国学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Studies in China），简言之，即中国人从纯学术视角对美国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发展历程。此一历程，自晚清迄今，由一穷二白而渐臻繁荣昌盛。如何

对这一学术行程加以科学的考察和认真的总结？恐怕是一个应予重视的新课题。

本文从对李本京、于子桥教授著《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与分析》【注释】李本京(Thomas B. Lee)、于子桥(George Yu)著：《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与分析》，台北正中书局1991年12月初版。大32开，共210页。1993年6月，笔者偶得此书问世之讯，遂致函李本京教授，李先生旋即热情回复，并于是年岁末托人自台北捎来此书相赠。谨此特别向李本京教授致谢。【注尾】的评论入手，拟就有关问题约略谈几点初步意见，以期引起海峡两岸及大洋彼岸美国学界对此 覆题的关心和进一步讨论。

一

从李本京、于子桥先生的“序”中，我们了解到，“本书写作的目的，就是要阐明大陆美国研究的概况，并且加以适当的分析”，以“了解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的全观”。为此，除附录外，本书正文由四大部分构成，其中“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分析”、“中国大陆美国研究学术报告分析”为其主干部分，而以“探索、经验、推广——美国研究在中国大陆概况之评析”为题的长篇序文，对全书起提纲挈领的作用。

在分析大陆美国研究现状时，该书分三章介绍了有关研究机构、团体、专家学者及其研究领域或方向，并附有若干统计表格，以为具体说明。按照该书提供的数据，大陆美国研究机构（含大学院校、研究机构、学会）计有57所，“均经公认拥有自己的美国问题专家，而其中的25所拥有的专家学者至少有一位以上”（第2页）。据两位作者观察，这些研究机构或学校的地理分布情形颇具特点，即“大多错落于半月形的东南沿海地带：从东北而下，集于北京和上海二大都市，以及各海岸线都市，直至广州”（第11页）。相形之下，沿海地区较内陆地区“占了绝对的研究优势”。至于大学院校，可细分为美国研究中心、系级、个人这三个层次。该书认为，其今后研究方向，除钻研美国历史、经济等美国研究某一领域外，将朝科际研究方式发展，并具有“文化取向”、“政治取向”这两种特性，其中前者以研究历史、文学为主，后者以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等为研究主题。从个人学者的状况看，以研究经济、历史的人为最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是“拥有最多美国研究学者的单位”（第15页）。其中，成立于1981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称得上是中国大陆研究美国的龙头重镇，有其一定之影响力”（“序”，第3页）。

在对大陆美国研究学术报告进行分析时，该书以80年代发表的90篇文章“为样本做为研究对象”，以“检视其主题内容、意识形态、出版机构、作者地位以及出版年份，来评估这些文章所含的意义”，亦即“了解大陆学者对美国的认识”（第19页）。据李氏等估断，2/3的刊物“所呈现的美国形象并未具意识形态色彩，……而一般所介译的文章大都为正面性；相反地，本地作者自己所撰作品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第20页）。同时，还特地对《复旦学报》、《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6期）所载文章进行了个案分析。

附录A—F中，分别有“‘成就学者’参考名录”、“设美国研究之大学院校及研究机构”、“选样文章摘要”、“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及理事名单”、“中华美国学会暂行章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基本情况”这六个方面的材料。

二

本书作者李本京先生，曾任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及台湾美国研究学会会长多年，并积极推动有关美国研究的国际活动卓有建树。另一位作者于子桥先生，现为美国伊利诺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系主任。以这样两位有地位的学者来专门介绍大陆美国学状况，必当引起海

内外有关人士的诸多兴趣。事实上，本书除在台北印行中文版外，亦同时在美国由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出版英文版。其影响面之广，于此即可想而知。

一般而言，本书之撰写与出版，对于海内外学者特别是台湾学者了解大陆美国学状况，或许是不无助益的。几十年来，海峡两岸缺乏正常的学术、文化交流，美国研究界亦然。就大陆学者而言，对于台湾美国学的成果及最新趋向，除某些文章作过介绍外，仍所知无多。台湾学者对大陆美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似乎也同样隔膜。感谢李本京、于子桥两位教授，为了写作《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与分析》，他们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收集材料，归纳及分析”（“序”），从而为海峡彼岸了解某些基本情况提供了部分素材。毋宁说，正是李本京先生等的辛勤劳作真正开启了海峡两岸美国学界相互了解与理解之先河。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在李、于看来，“今日大陆的美国研究一直在高成长”，只要假以时日，必将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次”。美国研究之能取得今天的学术成绩，“已属难能可贵”。给他们印象很深的是，学者们那种“大家一起来的干劲，确实令人佩服”。书中预言，“美国研究在大陆有着相当大的空间，发展无限”（以上引文均见“序”）。与此同时，他们也指出了某些不足，如翻译作品“不一定能维持高品质”，再如“量高质低”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也正是我们中有的学者早已认识到的〔1〕。李本京先生隔海峡相望，“旁观者清”。这是其得天独厚之处。

三

但是作为一部严肃的著作，本书还存在某些缺陷，如不加以弥补，似难真正反映大陆美国学的现状。正因其是在大陆以外带有开创性的著作，影响很大，就更有必要尽一得之愚拾遗补阙。在这里，我想就以下四个问题提出管见，并就教于李、于两位前辈。

（一）取材问题

客观的分析和结论来自较为全面而可靠的材料，而况本书用了许多定量分析法，这点就更为重要。而恰恰是在取材方面本书难以符合这一前提。以“中国大陆美国研究学术报告分析”为例，它所研究的90篇抽样文章选自24种〔2〕被认为是与美国事务有关的有“代表性的‘重点’刊物”（第20页）。据笔者统计，这90篇文章中，除《复旦学报》16篇、《武汉大学学报》9篇、《美国研究参考资料》8篇、《南京大学学报》6篇外，《历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国际问题研究》各5篇，《历史教学》、《兰州大学学报》、《南开学报》各4篇，《西北大学学报》、《现代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各3篇，《四川大学学报》、《吉林大学学报》、《外国文学研究》、《学习与研究》各2篇，《文史哲》、《文艺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沪）、《中国社会科学》、《外国戏剧》、《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外语教学与研究》各1篇。据作者自述，其所以选取这些期刊，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具全国性知名度与领导地位”（第20页）。可是，我们注意到，作者抽样时却忽视、遗漏了我国大陆美国学的核心期刊——《美国研究》、《世界历史》、《世界经济》、《美国文学丛刊》、《近代史研究》，亦未注意到有关的内部刊物——《美国研究丛刊》、《现代美国文学研究》、《中美文化研究》、《美加经济研究》。对经常刊载美国研究成果的其他杂志〔3〕，也忽略未计。这样一来，就不能不影响到抽样的质量。比如，像《美国研究》这样一份创刊于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中华美国学会主办的学术季刊，恰恰是中国在美国学方面在全国最有代表性的期刊，本书在其他地方也提到了，说明作者是知道其存在的，但在取材时却弃而不论，令人不解。此其一。再从这90篇抽样文章看，计有书评5篇、美国学者讲座介绍2篇、会议报道1篇、译文1篇。就是说，这些文章中至少有10%本来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Articles)，其他的选样文章亦不乏平平之作。坦率地讲，这90篇文章很难说已代表了大陆美国学界十数载的主要学术成果〔4〕。同样，这90篇文章的88位作者也很难被认为

是大陆美国学界最有代表性的学者〔5〕。作者在介绍其样本选取过程时曾认为，他们那种“大量随机抽样”的选样方式“具有随机和灵活的优点”，并相信“本研究的发现必能激起大家的兴趣和注意”。读过这本书后，我个人对此却不这么乐观。此种“随机”、“灵活”的方式，选来选去（不管是刊物、还是文章），到头来，既不能保证抽样刊物的质量，又不能保证抽样文章及其作者的代表性，那么，类似“研究”的“发现”又有何意味呢？此其二。该书“旨在探讨中国大陆的美国研究状况”（第1页），然令人不解的是，它居然把十几年来大陆出版的美国学专著（书）一概摒弃在考察对象之外。其实，自1978年始，我国大陆学者在美国研究著述方面是很有作为的。一批在体系、观点、材料等方面均有开创意义的丛书〔6〕、专著〔7〕、论文集〔8〕、教科书〔9〕的纷纷问世，即是显例。关于这一点，连李本京、于子桥先生也是承认的。〔10〕惜乎他们在进行研究时却未把这个重要部分包括进去。问题在于，离开了对这些有价值的著作类成果〔11〕的审视，怎么能谈得上是对大陆美国学的全面把握呢？此其三。

（二）人名、机构名称的讹误

本书除了相当普遍的印刷错误〔12〕外，还有一些似是而非之说。〔13〕特别是，在介绍或提到有关学者或机构时，该书出现了大量问题。有关具体情况，请参见表甲、表乙：

表甲 有关人士姓名正误比较表

误	页 码	正
张 敦	“序”（2页）	张 毅
伍世荣	“序”（3页）	王世荣
王 璞	“序”（14页）	王 玮
何顺景	31页、140页	何顺果
周 良	34页、133页、154页	周珏良
席学媛	34页、133页、151页	席学媛
房长江	34页、133页、153页	屈长江
谭俊杰	36页、134页、160页	谭君久
屈	36页、158页	屈 湮
杨献英	37页、135页、166页	杨灿英
过 洋	54页	温 洋
曹绍镰	93页	曹绍濂
陈君懋	94页	陈启懋
陈胜林	94页	陈胜
程汉丈	95页	程汉大
郑红凤	95页	邓红凤
郑蜀生	95页	邓蜀生
杜 度	95页	杜 美
高鸿也	96页	高鸿业
关绍记	97页	关绍纪
洪吉彦	97页	洪君彦
黄德泉	98页	黄德禄
黄可杼	98页	黄柯可
黄水群	98页	黄兆群
李羨林	99页	季羨林
蒋湘潭	99页	蒋相泽

蒋湘津	99 页	蒋相泽
金君辉	99 页、176 页	金君晖
文翰	99 页	靳文翰
周铭洲	99 页	车铭洲
李存洲	99 页	李存训
李慎文	100 页	李慎之
栗斯提	100 页	栗思提
刘佳炎	101 页	刘传炎
刘同萍	101 页	刘同舜
罗药渠	102 页	罗荣渠
马荻莎	102 页	马秋莎
梅益仁	103 页	梅仁毅
仁东来	104 页	任东来
沈仁道	104 页	沈仁安
谭经安	104 页	谭圣安
谭宗台	105 页	谭崇台
陶火镛	105 页	陶大镛
陶 结	105 页	陶 洁
佟宪图	106 页	佟宪国
王义明	107 页	汪义明
吴大昆	107 页	吴大琨
吴继先	107 页	吴纪先
武世民	107 页	吴世民
杨逢	135 页、167 页	杨逢珉
吴文军	107 页	武文军
杨惠平	109 页	杨惠萍
杨周汉	109 页	杨周翰
姚庭纲	109 页	姚廷纲
易梦红	110 页	易梦虹
俞可兴	110 页	俞可兴
张椿平	110 页	张椿年
张静宜	111 页	张静怡
赵宝照	111 页	赵宝煦
郑应英	112 页	郑亚英
周基坤	112 页	周基
庄德均	113 页	庄德钧
赵尧丽	153 页	赵晓丽
东 英	154 页	车 英
王辑思	175 页	王辑思
丁则名	178 页	丁则民
康铭洲	179 页	车铭洲
丁铭楠	178 页	丁名楠

注：①本表所述上列人士，系指《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与分析》一书曾提到过、然有明显的讹误者。

②这些人士中,有的其实并非从事美国问题研究。③表中“误”一栏,指《现况与分析》原先的记载;“正”一栏者,则是笔者所作的初步辨正;“页码”指该书出现时的场合。④本表中的“误”、“正”,按该书注明的“隶属单位”等推断。

表乙 有关机构或专门概念正误比较表

误	页 码	正
洛阳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序”(6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上海国际关系研究所	“序”(19页)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黑龙江学	17页	黑龙江大学
现代国际问题研究所	9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中国美国研究协会	9页、128页等	中华美国学会
长春师范大学	“序”(15页)	东北师范大学
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	26页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北京外交研究所	83页	外交学院
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所	8页、127页等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
复旦大学美国问题研究所	8页、129页等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北美研究所	8页、124页等	武汉大学美加经济研究所
南京大学近现代英美对外政策研究所	8页、130页等	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
山东大学现代化美国文学研究所	8页、129页等	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
山东大学中国美国文学研究协会	9页	中国美国文学研究会
山东大学中国美国文学研究协会	9页	中国美国文学研究会
中国美国历史研究协会	9页、98页等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中华美国经济学会	“序”(11页)	中国美国经济研究会
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中心	93页等	武汉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文学研究所	109页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策研究所	109页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东北大学	83页	东北师范大学
人民出版社	177页	人民出版社
东师范大学	120页	华东师范大学
海外国语学院	180页	上海外国语学院
西门外语学院	126页	西安外国语学院
音乐与跳舞	41页	《音乐与舞蹈》
研究与学习	41页	《学习与研究》
《武汉大学学报》	133页	《武汉大学学报》
“文芒论研究”	26页	《文艺理论研究》
《文艺论研究》	133页等	《文艺理论研究》
“文哲报”	26页、40页等	《文史哲》
《山东文哲报》	132页等	《文史哲》
中华美国学院	184页	中华美国学会

注:《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与分析》一书在介绍有关机构等情况时,出现了一些不甚规范的说法(包括印刷错误)。兹据实列表辨正如上,供参考。

(三)“成就”学者名单

该书附录A为《“成就”学者参考名录》。按照作者的说明，“本研究特将中国大陆美国研究之专家学者人名录辑成附录A，……资料来（源）主要为美国新闻总署的研究报告，中文期刊中亦收集100多人次。虽然这二者出处并不能保证所有人员都有很高的学术成就，但也足能说明他们在学术界的表现是不容置疑的，因此，附录A内的所有人名，均可视为‘成就学者’”（第14页）。然而，所谓的“成就学者”，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恰恰是大可“质疑”的。又据作者说，他们之为此“搜集的工作”，系帮助人们了解“那些人的地位在他们机构里到底有多高以及其影响力如何”（第30页）。应当说，这显然都是为读者着想的。问题在于，这份长达21页、占全书10%篇幅的“名录”所附的451名所谓大陆美国学“成就学者”中，据我初步考索，至少有210人事实上完全与美国问题研究无关。就是说，这近50%的“成就学者”，既非从事美国学的教学，也非从事美国学的研究，亦非从事美国学著作的翻译或出版。把这么一大批人随意列入“成就学者”，不知有何依据。此份“名录”中的某些人士，确是在某一领域中卓有成就，其中还包括季羨林、钱钟书、张友渔、端木正、冯至、杨绛等，硕学鸿儒、大家名流，然而其专业并非研究美国问题。与此同时，一些真正孜孜耕耘于美国学园地并在国内外已有相当知名度的专家，这份“名录”却又付诸阙如。这份“名录”的名字错讹甚多，前面已列出。甚至还把一个人当成两个人同时列入，比如在北京大学栏内，即先后紧挨着列有罗荣渠、“罗药渠”这两个名字，中山大学的蒋相泽被当成“蒋湘潭”、“蒋湘津”两人同时列入。此外，“名录”所注明的学者与其隶属单位关系上亦有不少张冠李戴之处，如把董衡巽（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施咸荣（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李文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赵家璧（人民文学出版社）、冯亦代（三联书店）、赵萝蕤（北京大学）、周珏良（北京外国语学院）、谢榕津（中央戏剧学院）、张禹九（湖北大学）、梅绍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等统统说成是山东大学的，把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储玉坤、褚葆一、陈招顺说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把张梦白（苏州大学）说成是深圳大学的，把张培刚（华中理工大学）说成是华中师大的，把王旭（东北师范大学）说成是西北师大的，等等。作者曾在另一场合谈到：他们之把37所大学的美国研究人员均一一罗列于“名录”中，“北（此）举的意义在于说明本研究具有最高的可信度”（参见第7页、5页）。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一份有如此之多讹误的“名录”，完全不足以反映大陆美国学学者队伍的构成、素质及现状。设若以此“名录”为据，进而观察大陆美国学现况，大约是很难得出一个相对公允的评估的。

（四）以“意识形态”划线不当

最后，还想提出讨论的是，作者似乎过于看重了十几年来大陆美国学的非学术环境。比如，按该书之见，中国大陆美国学的第一个特征是：“以政治挂帅，学术也就只好在狭窄的境遇中十分困难地谋求一些有限的活动生机”，“要想做独立的学术研究是件相当困难的事”（“序”）。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作者主观地认为“因处于马克思（思）主义挂帅的环境中，中国大陆（美国）学界均以研究经济和历史为主。毫无疑问地，在这二大主力学科影响下，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学者就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同样情形，文学和语言学者亦无处发挥”（第15页）。冷静观之，其实亦未必尽然。虽说囿于主客观条件（如图书资料、人才培养以及确实存在的某些思想禁锢等）的限制，大陆美国学各分支学科尚存在着不尽平衡的情况，但从十几年来问世的有关论著来看，除美国史、美国经济研究仍保持强劲势头外，美国文学研究亦蓬勃向上，大有并驾齐驱之势，〔14〕其中对奥尼尔、海明威、惠特曼的研究〔15〕，已挖掘到相当的深度。对美国外交特别是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自80年代初以来，亦后来居上，十分引人注目〔16〕。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何况以研究何种学科来划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不科学的。

该书还硬性地把大陆美国学研究者划分为“正教派”(Orthodox)和“异端派”(Gnostic)这两大阵营，据说，“分辨‘正教派’及‘异端派’文章之主要方法，系以文章内容而定，

其标准为是否具有很明确,或甚至完全以马克思(恩)思想为理论基础去讨论一项主题。这种以意识形态主导风格的写作方式,由以下四点分析,即能很清楚地察觉出来:(1)一再引用马克思(恩)主义者言论,(2)带有经济决定论的世界观,(3)对其他主义信念,均以道德律去批评训斥,(4)全篇充满激动的字眼与文辞,将评论对象批评为和邪恶结为一体。……至于‘异端派’之文章,则根本没有马克思(恩)思想的干扰,完全就事论事”(第29页)。又有甚者,在分析具体作品时,凡对美国某些方面持批评意见者即被列入“正教派”,而对美国作正面叙述者,即被列为“异端派”,或是“反马克思主义”。这种非此即彼、形而上学的作法本身,实在是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能否说在著书立说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就是“读来犹如宗教的道德诗篇”呢?其实,即使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学者,也不拒斥马克思的言辞,正如大陆学者也常常征引马克思·韦伯的论断一样,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以肯定或批评美国划线更不足为据。当年马克思本人对美国也曾给予很高评价。美国是一个很复杂的国家,同一个学者对它这一方面予以正面评论对另一方面或另一段历史予以尖锐批评也常见不鲜,即使以本书的标准来看,对同一学者也难免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之处。顺便说一句,美国某些学者在分析大陆学者时也有这种简单、武断的作法。在大陆的学者中间,人们已经越来越反感这种“扣帽子”式的“定论”了。事实上,本书作者也已意识到:把大陆美国学者弄成“正教派”、“异端派”“这种正反二元化的方法,可能流于主观、草率”(第29页),但很可惜的是,他们同时又坚信“此分法却能很适切地将中国大陆学术论文廓清开来”(第29页)。而其客观效果恐怕是事与愿违。

此外,正是由于作者这种从意识形态出发的主观推断,因而,该书的某些分析就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比如,“序”中曾提到“长春师范大学(按:应为东北师范大学)的副校长就兼任美国所所长”(第15页),即属不实之论。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是在该校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的基础上,于1989年成立的。自该所成立至今,一直由丁则民教授任所长,他是前美国史研究室主任,而非“副校长”。

四

我由此还生发出其他一些感慨。

不知其根本缘由何在,反正不短的时期以来,在我国美国研究领域中,人们似乎对国人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怎么关心。相形之下,对英文版的书或外国人写的书(哪怕是一般通俗读物),好像总是持敬而仰之的态度。这当然不是说不分场合、不加区别地动辄征引中国人自己的成果,更不是说不重视外国学者的最新学术成果。关键是,如何很好地摆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另一种与此不无关联的现象是,我们对自己以往及现有的学术研究历程、著述或成败得失缺乏必要的总结,有的不屑做或认为不值得做,有的想做但因受材料等局限而做不了,等等。倒是台湾学者、外国学者抢先一步,率先在这一方面推出专书(如《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与分析》)。然而,事实表明,这样的工作由大陆以外的学者——即使是像李本京、于子桥先生这样颇负盛名的学者——来做,终归存在着资料收集等方面的特殊困难或者不方便。现在该是认真从事这项研究的时候了。

几年来,我曾在不同场合呼吁要重视和开展对中国美国学史的研究,并身体力行,为此作过一些初步的尝试和探索。(17)还有一些别的学者也在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18)由王缉思、杨玉圣、金灿荣发起、组织的《中国美国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Studies in China*),自1993年4月开始策划、准备,已正式进入实际编纂的阶段。作为一部系统、全面地反映和总结晚清以来中国人探索美国的学术行程的大型专业工具书,其目的,一是为了更进一步促进和发展中国的美国研究,二是为了促进海内外(包括海峡两岸之间)美国学界的学术交流与协作。它将如实地反映中国美国学历程、成就为己任,为中国的美国学在

世界学坛上占有一席之地而竭尽全力。

或许可以说,李、于二位先生等的新著再次提示我们:中国美国学史的的确确是一个值得引以重视、亟待加以研究的新课题。

注释:

(1) 参见资中筠:《中国的美国研究》,《美国研究》,1987年1期。

(2) 该书第20页说,“本研究所分析的90篇文章采自20种期刊”。按:据笔者统计,实为24种期刊。

(3) 如《世界史研究动态》、《世界经济与政治》、《东北师大学报》、《山东师大学报》、《读书》、《外国教育》、《南开经济研究》等。

(4) 参见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0—21页,“中国美国学论文资料统计”。

(5) 在这90篇抽象文章的88位作者(其中7篇文章系由两人合作而写)中,大约有31人在美国研究领域确系著述较多、有成就者(约占35%),其余则表现一般、无甚作为。在这88位作者中,除倪世雄4篇抽样文章(含译文1篇)、李东、周敦仁、颀普、张友伦、周文贵各2篇外,其余均不超过1篇(有的是两人合写1篇)。

(6) 如商务印书馆的《美国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美国译丛》、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美国文学史论丛书》、三联书店的《美国文化丛书》(以上均系译作);汪熙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丁名楠主编的《中美关系史丛书》(乔明顺、邓蜀生、罗荣渠、张振、资中筠、陶文钊任编委)、董乐山主编的《美国与美国人丛书》(以上包括著、译作);杨生茂、刘绪贻主编的《美国通史丛书》、刘绪贻主编的《美国现代史丛书》(以上均为著作)。顺带提到的是,由资中筠、刘颖主编的《美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丛书》、《美国研究丛书》,也已开始陆续出版。

(7) 如刘祚昌著《美国内战史》(1978年)、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1979年)、邓蜀生著《罗斯福》(1985年)、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1989年)、丁则民主编《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990年)、余志森著《华盛顿评传》(1990年)、邓蜀生著《美国与移民》(1990年)、刘祚昌著《杰斐逊传》(1990年);褚葆一主编《当代美国经济》(1981年)、薛伯英主编《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1986年)、章嘉琳主编《变化中的美国经济》(1987年)、龚维敬和甘当善著《美国垄断财团》(1987年)、陈宝森著《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1988年);董衡巽、朱虹、施咸荣等著《美国文学简史》上下册(1978年、1986年)、赵毅衡著《远游的诗神》(1985年)、毛信德著《美国小说史纲》(1988年)、李野光著《惠特曼评传》(1988年);资中筠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1987年)、牛军著《从赫尔利到马歇尔》(1989年);李道揆著《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1990年)。按:考虑到《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与分析》一书系出版于1991年底,故本文列举有关著述时,仅限于1990年以前出版的。下同。

(8) 如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0年、1983年);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1985年)和《中美经济关系:现状与前景》(1989年)、丁名楠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1、2辑(1985年、1988年)、罗荣渠著《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1988年)、袁明等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等编《中美关系十年》(1989年);朱虹著《英美文学散论》(1984年)、施咸荣著《西风杂草》(1986年)、钱满素编《美国当代小说家论》(1987年)、《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1988年);《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经济危机》(19

84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美国研究》(1986年)。

(9) 如杨生茂、陆镜生著《美国史新编》(1990年)。

(10) 李本京、于子桥教授“序”称:“大陆上近三年来,不少有关美国研究的书籍出版,深受注目,也令人印象深刻。”

(11) 例如,在最近揭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优秀著作奖(1977—1991)评选结果中,资中筠研究员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李道揆研究员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陈宝森研究员的《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均榜上有名(全院系统共评出77种获奖著作),引人注目。再如,刘绪贻教授主编的《战后美国史》(韩铁、李存训、刘绪贻著),曾荣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0年)。有的书还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

(12) 举其要者,如“一蹶(蹶)不振”(第163)、“亨(享)誉盛名”(第87页)、“当代美国的人(中)国研究”(第139页)、“一九八〇年伐(代)”(第88页)、“欣贵(赏)”(第149页)、“掘(崛)起”(第151页)、“略述(述)”(第167页)、“铨(诠)释”(第161页)、“很容(容)易”(第80页)、“也(就)是说”(第154页),等等。

(13) 如在谈到“大陆各地的出版公司或单位也相当多”时,说“上海有商务印书馆,而重庆也有商务印书馆”(“序”,第13页),显然是误会。再如“序”中谈到:大陆“研究美国的‘研究中心’也如雨后春笋,到处都是,……比如内蒙古包头师专也自己成立了一个美国研究中心”,此说恐亦不足为凭。又如,《“成就学者”参考名录》中的“备注栏”不时地出现“主席”、“副主席”字样,但事实上,大陆现行的称谓为校长、系主任、所长、教研室(或研究室)主任。

(14) 参见黄梅、钱满素、王义国:《英美文学研究三十年》,《外国文学研究集刊》,3辑(1981年);施咸荣:《美国文学在中国》,《翻译通讯》,1983年12期;施咸荣:《近十年美国文学在中国》,见《中美关系十年》(1989年)。

(15) 参见刘海平、朱栋霖著:《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奥尼尔与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吕艺红:《1988年奥尼尔热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1期;王彪:《新中国的海明威研究》(硕士论文),云南大学,1988年;邱平壤著:《海明威研究在中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杨仁敬著:《海明威在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李野光:《惠特曼在中国》,见《惠特曼研究》“附录”(1988年)。

(16) 参见汪熙、王邦宪:《我国35年来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复旦学报》,1984年5期;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研究十年回顾》,见《中美关系十年》;杨玉圣:《中国美国学的一株奇葩——八十年代的中美关系史研究》,《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3期。中华美国学会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也于1994年3月在北京宣告 闪 i (17) 参见杨玉圣:《重视我国美国学史的研究——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社会科学报》(沪),1989年4月13日;杨玉圣:《开展中国美国学史的研究——几点初步想法》,《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46期(1990年2月);杨玉圣:《八十年代的中国美国学——回顾与思考》,《美国研究》,1990年4期;杨玉圣著:《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出)。

(18) 如黄安年教授除编印了《百年来美国问题中文书目》(1990年)外,目前还在从事中国美国学信息库课题的研究。

○短 论

19世纪末美国公众舆论评述

李庆余

(南京大学历史系)

公众舆论的形成

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始,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然而,至19世纪最后30年,世界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是,欧洲大国(英德俄法)加紧进行殖民扩张,非洲在短短的20年中被瓜分完毕,亚洲大片地区沦为殖民地,东亚(中国与朝鲜)正面临欧洲大国与日本的瓜分。在这期间,列强力量的对比在发生变化,德国已是欧洲经济大国,野心勃勃,力主重分世界。日本一心要利用地理上的有利条件,成为东亚霸主。美国从北美崛起,90年代初已是居世界第一位的工业大国。世界巨变还表现为,欧洲正在形成二大军事集团(德奥意三国同盟与法俄军事联盟),准备用武力来打破原有的均势。总之,拿破仑战争以来的欧洲旧秩序趋于瓦解,世界在孕育新秩序。美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公众舆论是在这一国际环境中形成的,它反映了美国对世界的认识,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第一个表达国际新秩序思想的美国人是时事评论家费斯克。他的基本思想是分阶段实行世界联合。第一步是建立以美国联邦制为榜样的欧洲联邦,这将为世界联合铺平道路。第二步则是在条件成熟时建立世界联合。

进入90年代,国际竞争愈演愈烈。1983年,西方世界发生经济大萧条。资本主义秩序发生混乱,这更令美国舆论界去探索新的世界秩序与美国在世界的地位。于是,布鲁克斯·亚当斯的“文明兴衰论”与马汉的“海权论”应运而生。

1896年,布鲁克斯·亚当斯发表《文明与衰落的规律》一书,提出了人类社会运动的公式:人类总是从野蛮到文明周而复始,从物质的分散到集中,然而发生瓦解的反覆。继而,他又提出了文明西移的规律。依据这一规律,他提出了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国际新秩序的构想。

马汉是海军学院文职教官,长期致力于海军史研究,1890年,出版了他在海军学院的演讲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像亚当斯一样,马汉也是一位历史哲学家,他通过历史研究论证了海权在文明崛起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确立了他的海权论。马汉还撰写了一篇篇论文,用海权论解释新的国际秩序的蓝图,这些论文后来以《美国对海上权力的兴趣》一书重新出版。在这些论著中,马汉以英国为例,证明海上扩张是英国政治家无法抵抗或改变的趋向,他们自己只能顺乎这一趋向。美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必须模仿英国——发展外贸,建造商船与海军,在战略要地获得海军基地。当他看到日本崛起时,他预言,未来的国际竞争将要在东西方之间进行,美国处于西方文明的前哨,应该让它去准备这场竞争——建造海军、挖掘与控制运河、建立太平洋上的前哨基地。

马汉与亚当斯从不同的方面对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与美国的地位加以论证,成为公众舆论的主旋律,经过杂志报刊的宣传,海权论鼓噪一时,影响深远。许多人从他的论说中得到启示,相信美国要承担与其经济权势相一致的责任,美国应该及时地向孤立主义告别,走向世界。这样,以海权论与文明西移论为主旋律,形成了探索国际新秩序的公众舆论,其主要内容是实行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世界联合,建立一个没有战争、实行自由竞争与开放的世界;这

个世界由美国来领导。

舆论之一：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世界联合

在费斯克提出“世界联合”这一思想后，不断有人提出国际合作的构想。例如，爱德华·J·费尔普斯认为“新的国际关系”象征着美国孤立主义的结束与新的全球合作时代的开始。哈里·鲍尔斯也认为，新秩序将是“世界联合”。他用当时在欧洲与美国广为传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世界联合”加以描述。

在这个世界联合中，亚洲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美国舆论界一反以往的欧洲中心论，把亚洲提到新文明的源泉的高度。按照亚当斯的理论，西方文明已近于衰亡，一个新的文明的兴起，取决于亚洲是否能进入世界联合，主要是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能否向世界开放，成为贸易竞争的地区。

围绕着欧洲大国对中国市场是实行开放还是关闭这一中心问题，亚当斯把世界分成两个集团：由海洋文明哺育出来的英国与美国结成联合，主张自由贸易与开放；代表陆上文明的德俄法是另一个集团。作为第一个地缘政治学者，他预言将由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联合即英美联合来实现文明西移，建立以太平洋为中心的新文明。反之，如果陆上文明在这场竞争中取得胜利，他们会把东亚市场关闭，文明西移的潮流将被遏制，它所引起的压力会动摇美国社会的根基。由美国领导建立国际新秩序也将成为泡影。亚当斯与其他一些人特别担心俄国。一旦俄国控制北京与长江流域，中国将受到俄国支配，这是多么的可怕！亚当斯关于美国经济霸权的中心议题就是美国进入亚洲、对抗俄国。

一般地说，美国的报刊杂志在90年代初都宣传拉美市场对美国的重要性，因为拉美是美国的近邻，美国早就对这个地区进行商品与资本输出。公众舆论很少注意亚洲市场。亚当斯的论著与美西战争促使他们对中国市场的关注与向往，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舆论之二：经济竞争取代军事征服

欧洲人普遍认为，世界是靠战争来维持国际秩序的，战争是秩序的常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斯宾塞第一个出来反对这一旧观念。他论证说，军事冲突在发展原始文明时是很有用的，现在作为进步的工具，其价值已经过时。他反对战争，主张用和平的竞争与合作来缔造新的国际秩序。斯宾塞关于国际秩序的这一新观点也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起传入美国。公众舆论几乎一致反对军事征服，主张和平竞争。费尔普斯论证说，全球合作的新时代是以消除战争为特征。亚当斯在研究了人类文明演变后发现这样一个“自然规律”：任何一国取得霸权都须付出代价，或者是通过战争，或者是实行互惠。战争是支付鲜血，互惠是支付黄金。亚当斯主张通过互惠，实现竞争与合作。

海权论者马汉也是自由贸易与互惠的鼓吹者。马汉说实行关税壁垒会阻碍商品进入世界市场，只有实行互惠才能达到商业扩张的目的。马汉的海权论强调的是商业帝国而不是殖民帝国。这是马汉的海权论与欧洲历史上重商主义的海军论的主要区别。

在马汉以前，已经有人看到海军与贸易的关系。最早对这二者关系加以论证的是舒菲尔特。他在《海军与贸易关系》一书中认为，海军对商业是不可缺少的。确实，海军是商业的先锋。马汉进一步发展了海军保护商业的思想，成为其海权论的主要思想之一。与此同时，马汉注意到，用商业竞争代替军事征服将会减少国际冲突，但不会从此结束国际冲突，在这种冲突发生后，最终结果仍需要由海军来决定。海军将保证一国的取胜。然而，马汉的立足点已是建立贸易自由与互惠。海军是为这一新秩序服务的工具。90年代马汉的思想比80年代费斯克的论说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征。

那末，在国际竞争中还要不要占领殖民地？这也是舆论所关心的问题。大体上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是遵循英国与欧洲的传统，在亚洲取得殖民地。亚当斯持这种比较保守的观点，他以英法等老殖民主义国家为例，证明霸权主义是建立在对别国资源的控制之上，夺取这个控制权至关重要，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占领这个地区。科南特也宣传类似的观点，强调了殖

民地不仅是商品市场,也是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为实行资本输出而占领殖民地是欧洲大国为维持生存与繁荣的一条出路,在国际竞争中仍值得追随。

另一种意见是,经济竞争只需要战略基地,不需要大片殖民地。获取战略基地是国际竞争的需要。马汉是从海权证明基地的重要。没有基地,海军就不能远航,获得补给。范伯根进一步解释了占领基地与国际竞争的关系。认为占领基地是为了进行国际竞争。他说,美国如要维护在华利益,“领土扩张是必要的”,只有获得了附近的基地,才能以平等的条件进入国际舞台。美国企业界的态度值得注意。一般地说,企业界不主张占有殖民地。如一家企业杂志所说:“我们要使自己与世界其他地方相信,我们的竞争不是为了土地,而是为了世界商业霸权。”(《钢铁时代报》1895年8月17日)

关于要不要殖民地的讨论是对新秩序中新殖民政策的探索。公众舆论愈来愈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就是说,商业竞争而不是控制资源是真正目的,即使在必要时获取领土,那也是为了有利于竞争,一旦这样的领土获得对竞争变得不利,已获得的殖民地也可以放弃,正如美国从占领到放弃菲律宾所表现的那样。

舆论之三:美国告别孤立主义,领导世界

美国如何顺应历史潮流,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公众舆论最为关注的问题。美国建国以来,坚持奉行孤立主义,对欧洲的政治与战争决不介入。然而,到19世纪末,公众舆论认为,孤立主义时代已经结束,它不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新时代要求美国履行建立新秩序的使命。

亚当斯通过文明的规律来论证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他相信历史的规律是力量集中的规律。欧洲在衰落,他们在对付竞争与自然的挑战中已告失败。美国经济力量已居世界第一,并具有集中的优势,应该对力量的挑战作出反应。国家的政策要顺乎历史的规律。他要求美国决策人放弃孤立主义,赶快走上国际舞台,去击败主要竞争者。他还警告说,继续孤立等于是听任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消灭。

马汉也从文明的规律与时代要求论证美国必须放弃孤立主义。马汉认为,国家要避免衰亡与停滞,就要“往外看”。扩展文明对一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现在。

经济学家查尔斯·A·科南特是从经济与种族发展的规律来证明美国需要改变过去的政策。他从1893年大萧条得出结论说,如果美国不谋求外国市场,美国将会被一场社会革命所动摇。

美国公众舆论也从美国自身安全来证明必须放弃孤立主义。在美国早期历史上,孤立主义被认为是利用地理上的有利,防止欧洲侵犯的政策。公众舆论指出,19世纪末,世界进入大国争霸时代,孤立主义已不再是防卫自己的手段。他们提醒美国人,大陆国家例如德国会蔑视门罗主义,侵入美洲大陆,从而造成对美国的威胁。这就是说,结束孤立主义不仅是为了实现经济霸权,也是在新形势下维护美国国家的安全,维护门罗主义之必需。这给19世纪末美国外交的转变打上了爱国主义的烙印。

在摆脱了孤立主义后,美国怎样进入世界,建立新秩序?普遍的意见是实行实力外交,主要是发展海军。马汉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舆论指出,一支大海军不仅能使美国在同外国发生冲突时,取得有利地位,而且他还能使美国在维护国际新秩序中具有左右局势的地位。

一片大海军的呼声中,舆论也继续鼓吹道德外交。费尔普斯在论证道德与海军之间的关系时说:“海军力量在这个时代已变成外交的右臂,在一般的与关键的对外关系中最重要因素。道德力量是一件突出的事情。……一个右臂如果没有头脑或意识,永远不会是合乎需要的力量,但头脑与意识如果没有右臂总是不会有效的。”(米尔顿·普莱瑟编:《创建美利坚帝国1865—1914》,迪卡尔布,1971年,第75页)他的结论是实行开明的基督教的政策,但以海军为后盾。

如果说大海军反映了时代的思潮与争霸需要,道德外交则继承了美国的传统。美国人历

来认为,他们命定要把自由与自治的福祉带给世界上那些不幸的地区,这就是所谓“使命感”。19世纪末美国公众舆论中的道德外交源于历史上的使命感。他们把对外扩张与把扩大自由与自治的使命相统一。霍布森相信,建立新秩序是美国为别国与世界作的高贵的事业,至于“美国的海权,它是使世界获得新生与拯救的工具。”(《北美评论》1902年10月)

对公众舆论的一个评价

在一个很长时期,美国外交史学界把公众舆论解释为普通人与老百姓的呼声,这个解释现在已被纠正了。像亚当斯兄弟、马汉、科南特这些人,他们与外交决策人、上层政治集团有密切的关系。亨利·亚当斯说,他曾把他兄弟的书《文明与衰落的规律》同海约翰、洛奇、洛克希尔、西奥多·罗斯福等人进行讨论。确实,布鲁克斯·亚当斯与马汉的书在上层集团中被广为阅读与谈论。正由于此,这些舆论对外交政策的转变,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公众舆论使外交决策层形成新天命这一共识,使他们一致相信,对外扩张与国际新秩序是美国不可推诿的责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不管愿意不愿意”,这是文明的规律。经济与种族发展的规律所使然。“新天命”的共识引导美国在1893年后加紧寻求海外市场,引导1898年的美西战争与侵占菲律宾。总之,引导了美国外交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美国决策人与扩张主义者还利用“新天命”反对反帝民主派。“新天命”在全社会的渗透及其在外交转变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公众舆论为外交提供政策选择。西奥多·罗斯福与洛奇是19世纪90年代“大政策”的炮制者,他们曾仔细研读亚当斯与马汉的书,把其中的主要思想变成政策。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马汉的“海权论”。罗斯福称,“海权论”是“我所读过的最好的一书”,从此,罗斯福与马汉成为亲密朋友,不断交换看法。海权论使“大政策”的炮制者认识了海军的重要。他们相信,“海军是大国地位的标志,美国必须保持充分的海军,否则就得下定决心,充当国际事务中的第二流国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商业上也是如此。”(《新英格兰季刊》1952年6月)“大海军”成为“大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

罗斯福赞扬亚当斯对文明规律的研究,但他没有亚当斯兄弟那种悲观情绪。他对进步有坚定的信念,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改变一个种族的命运。亚当斯的书激起了罗斯福特有的爱国主义与沙文主义,他决心让美国来挽救衰落的西方文明。他完全接受了亚当斯的地缘政治分析,相信东亚是未来竞争中的热点,而俄国是在这一地区最可怕的竞争者。麦金莱遇刺后,罗斯福当上总统,他按亚当斯的地缘政治观在东亚实行均势外交,利用日本制止俄国,同时又限制日本的扩张,以便维护美国的地位。

关于国际新秩序的公众舆论对威尔逊政府的外交有深刻的影响。如果说,19世纪末的公众舆论是“大政策”重要的思想来源,那末,也可以说,它为威尔逊总统炮制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框架。威尔逊总统在一战后提出的“14点建议”,其基本精神是建立一个开放的、自由贸易与没有战争没有殖民地的世界。这一新秩序的蓝图实际上是由19世纪末公众舆论所描绘的。

19世纪末美国公众舆论及其作用表明,美国外交决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接受舆论的指导与批评,那些构划国际新秩序与美国领导地位的公众其实是政府的智囊团,他们制造的舆论是外交决策的一部分。这就是美国“人民外交”的实质。

美国军事思想溯源

陈海宏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美国的军事思想萌发于它的殖民地时期,其主要内容有:全民武装、反抗暴政、文官治军、灵活机动的战术、建立军事联盟、制海权思想及对外扩张。进入18世纪,北美的一些有识之士从殖民地的长远利益出发,试图从理论上阐述军事问题,为美国早期军事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是:杰斐逊、富兰克林和华盛顿。

而影响它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与殖民地独特而复杂的环境分不开。首先,北美殖民地的分散和独立性,使得殖民地的居民享受着相当程度的民主;其次,战争是北美殖民地扩展的基本动力。殖民地的战争主要有三类:殖民强国之间的、特别是英国对法国的战争,为了剥夺和剿灭各族印第安人而展开的战争以及内战。北美殖民地就是在烈火硝烟的熏陶之下发展起来的。三是,北美殖民地是个宗教社会,宗教也是殖民地开发的一个重要因素。英国的清教徒和欧洲的天主教、教友派、洗礼派、路德派等各个教派的移民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寻找自由的乐土来到北美的。他们同殖民当局经100多年的顽强抗争,在北美初步实现了宗教宽容。宗教渗透到了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四是殖民地的一切都处于英国和欧洲的影响之下。殖民地无论是语言,还是社会经济制度,主要是从英国移植来的。英国革命和欧洲启蒙思想也影响了殖民地,洛克、卢梭、伏尔泰等人的著作广为流传,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和反抗暴政的思想已深入人心。美国军事思想的萌芽正是扎根在殖民地的沃土之中,吸收了各种各样的营养,逐渐发育成长起来。

美国军事思想的一些基本内容,诸如全民武装、文官治军、灵活机动的战术、对外扩张等思想均可在殖民地找到其渊源。

1、“公民军队”和国防经济的思想。这种思想来源于英国及欧洲的传统以及殖民地的特殊环境。在殖民地充满流血暴力的险恶环境中,移民为了生存和讨伐印第安人及扩张领土之需,建立一支武装力量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17世纪北美各殖民地尚处于开发阶段,十分贫困,无力供养一支职业军队。加之在英国革命期间,克伦威尔军事独裁造成的恶果及驻殖民地英军的贪污腐败,使殖民地人民产生了对常备军的厌恶之情。因此,各殖民地当局开始建立民兵制。殖民地的这种民兵传统来源于英国。早在1181年,英国的《武器法》就规定:“每个(自由民)……应起誓……他将以手中之武器,效忠国王亨利陛下……他将佩带这些武器,应召服役。”

2、文官治军原则。这是美国军事思想的核心,也是当今美国军事体制的基础。这个原则源于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教会的影响。殖民地的行政和立法机构是由总督和议会组成的。总督一般代表英国国王或业主,议会则由当地居民选出。各地议会为了反对总督专横和压迫,曾同总督展开长期斗争,迫使总督作出很大让步。此外,人民经过长期反抗宗教压迫的斗争,到18世纪初,宗教宽容已蔚然成风。议会权力的扩大和教会的民主化,使殖民地的民主思想深深扎下根来。殖民地议会原先没有军事权,后来议会逐渐把军权从总督手中夺过来。1641年马萨诸塞议会制定了著名的《马萨诸塞自由法规》,规定经居民和议会批准后方可从事军事远征。各级官员包括军官都需经选举产生。其他各殖民地先后颁布了类似法令。到了18世纪,议会已在军事上取得了决定性的发言权,民选文官控制军队及制订军事政策的传统对于保证政体稳定,防止军人干政起了巨大作用。

3、武力反抗暴政的思想。这曾经是美国军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独立战争中起过指导作用。该思想源于殖民地时期的宗教斗争和欧洲启蒙思想两方面。移民们为了逃避政治和宗教上的迫害而来到北美。在北美有一望无际的土地可以开拓，他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如在一地受到压迫，他们可以远走他乡。殖民地曾发生过宗教压迫，居民为争取信仰自由曾进行了长期斗争。受压的非官方教派认为，反抗暴君就是对上帝的真正服从。此外，在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殖民地居民普遍认为：追求自由、平等和幸福是人的“天赋权利”，侵犯这个权利的人，就是暴君，人民有权推翻他。他们不满英国的殖民压迫政策，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天赋权利”，是暴政，便用各种形式展开斗争。这一斗争最终导致了独立战争的爆发。杰斐逊执笔的《独立宣言》就是对反暴政思想的理论阐述。

4、辩证的战争观。美国军事思想中关于战争的观点也有过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这种辩证的战争观也源于殖民地时期。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和宗教宽容的进步，到了18世纪中期，殖民地人民对于战争问题已有了共识。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上有两类战争，即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君主制是非正义战争的根源，侵略扩张是为了满足君主的私利，是人民的灾难。防止这类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推翻君主制而实行共和制。因此，殖民地人民一方面用各种形式抵制英国进行的争霸战争，一方面又义无反顾，不怕流血牺牲，投身到争取独立的战争中去。

5、战略战术思想。美国的战略战术思想均打上了殖民地的烙印。在殖民地时期的军事冲突中，北美殖民者和英军采用了两种战略。在殖民者同英军进行的争霸战争中，采用的是欧洲式的有限战略。在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中，采取了总体战略。

美国军事思想反对僵化，强调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战术原则也产生于同印第安人长期作战的过程中。北美印第安人是爱好自由而又骁勇善战的民族。他们能根据地形地物隐蔽自己，灵活机动地作战。移民原受英国传统战术的影响，用这种僵硬死板的布阵作战方式在同印第安人交锋时吃尽了苦头。他们后来摒弃了欧式战术，采用了游击战术和散兵战术，并在以后的独立战争中打败拘泥传统战术的英军。

6、制海权思想。美国一贯重视海军建设，以夺取制海权，取得有利的战略态势。这一思想明显地受到英国的影响。英国人具有航海的天赋，自资产阶级革命后，其海军便长期称霸世界海洋。在争夺北美霸权的角逐中，特别在七年战争里，英国海军控制了海洋，切断了法国本土同海外殖民地的联系，从而一举击败法国，夺取了加拿大，取得了争霸北美决战的胜利。殖民地的民兵在随英军参战过程中，对制海权的重要性有很深刻的印象。在独立战争和建国后的军事建设中，美国始终把扩建海军放在重要地位。

7、军事教育思想。美国一贯重视对军队和平民进行军事训练，重视军事教育的发展。这种做法也渊源于殖民地时期。北美大陆当时地广人稀，劳力紧张，因此人们把人的生命看得十分珍贵。军官们在指挥作战或制订计划时，总是遵循使伤亡保持在最低限度的原则。为避免伤亡过大，各殖民地的民兵十分重视军事训练，认为良好的训练和纪律是胜利的先决条件。军训已成为殖民地居民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重视军事教育就成为传统留传至今。

8、侵略扩张的思想。这是美国军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产生于清教教义。在英国革命时创建的清教，信奉卡尔文教义，认为：资产阶级是上帝的选民，发财致富和海外扩张是秉承上帝的旨意。清教徒移民在踏上北美大陆后，使用“火与剑”把印第安人的土地一块块地吞并，并随同英国军队打败了法国、西班牙等国，使殖民地的版图不断扩大。侵略扩张思想在殖民地的上层集团中深深扎下了根。在以后的独立战争中，北美领导人曾想夺取加拿大。建国以后，侵略扩张已成为历届美国政府的国策。

9、建立军事联盟的思想。在殖民地和印第安人及法国人的长期战争中，开始由于各殖民地互不来往，孤军奋战，屡屡受挫。在失败面前，殖民地间渐渐产生了联合起来建立军事联盟的思想。早在1643年，北部的普利茅斯、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等殖民地就曾尝试建

立一个同盟，以抵抗印第安人的进攻。1754年，在北美各殖民地派代表参加的奥尔巴尼会议上，富兰克林提出了建立联盟共同抗击印第安人军事威胁的计划。尽管因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未获通过，但这却是美国最早的建立联盟的计划，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在殖民地时期，特别是进入18世纪，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北美的一些有识之士从殖民地的长远利益出发，开始探讨军事问题，并试图从理论上阐述上述思想萌芽。这些人士中主要有杰斐逊、富兰克林和华盛顿等。

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但是在军事问题上也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在《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这部著作中，他阐述了一系列民主原则。他认为：暴政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军权高于行政权。军队如高于文官，不受文官控制，就会因失去监督而变成脱离人民的特权工具。所以他把文官指挥军队作为他的六项民主原则之一，由政府 and 议会来领导军队。他的这一思想后来在美国宪法中得到了体现，从而奠定了美国军事制度的基础。他还歌颂人民的反抗精神。他认为：反抗暴力是“天赋人权”，人民有权利以武力反抗暴政。在反英斗争中他呼吁人民拿起武器，用革命暴力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并写下了千古名篇《独立宣言》。

北美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富兰克林在军事问题上也提出许多影响深远的见解。首先，他把民兵作为国防基础。其次，他主张所有人（包括富人）都应服兵役。三是他主张把加拿大并入北美殖民地。最后，他提出了北美各殖民地建立军事联盟的主张。他认为各殖民地的不团结是安全的最大危险。1754年在奥尔巴尼召开的北美各殖民地大会上，他和哈钦森等人提出各殖民地建立军事联盟的计划，虽然未能被接受，但反映了他在军事上的远见。

北美最著名的军事将领是乔治·华盛顿。他是弗吉尼亚的民兵指挥官，曾参加过英法七年战争，在战斗中显露了军事才华，因而享有盛誉。在军事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见解：第一，他重视职业军队的作用。华盛顿是殖民地中最早看出民兵制弊端的人。他加强对民兵的正规化训练，学习欧式战术和队列。同时，他还向弗吉尼亚议会提议，要求以正规军取代民兵。第二，他重视向印第安人学习。他在随同英军司令布拉多克作战时，曾向布拉多克建议采用印第安人战术，派出警戒哨提防印第安人袭击。但布拉多克不听，一意孤行，招致惨败身亡。他在独立战争中，努力对大陆军进行正规化改造，采用了印第安人的散兵战术和游击战术，经八年奋战，终于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军队。第三，他生动阐述了用武力反抗暴政的思想。他认为：英国对北美的殖民压迫就是暴政，早就主张要用武力反抗英国的殖民压迫。独立战争爆发后，华盛顿毫不犹豫地披甲上阵，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经八年浴血奋战，赢得了独立战争的伟大胜利。

尽管上述思想家对军事问题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但是这些见解还只限于个别言论和著述之中，并没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北美殖民地未产生出一位真正的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家。但是，在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公民军队、文官治军、反抗暴政、有限战略和总体战略、灵活机动的战术、军事教育、军事联盟、对外扩张等等观念萌芽已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基，在独立战争的战火中经受了实战的检验，并在战后的美国宪法中得到了理论上的升华。

美国军事战略调整评析

汪徐和

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入主白宫以来,对美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其中对军事战略也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和改革方案。经过一年多的调整,美国的军事战略已基本成形。1993年9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自下而上的研究”后,公布了1994—1999五年防务计划;10月,又发表了《防务全面审查报告》,详细论述了冷战后美国安全面临的新威胁和机遇。美国认为,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在冷战后时代面临许多新的威胁,一是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威胁;二是地区性威胁,主要指损害美国利益的地区大国在该地区可能发动的大规模侵略,以及由民族、宗教等问题引起的国家内部冲突、国家恐怖主义、贩毒和与美国友好国家的政府可能被颠覆等一系列威胁;三是原苏联、东欧和其他地区实行的民主和改革遭失败的威胁;四是经济威胁,主要是近年来由于巨额债务、经济增长缓慢、缺乏就业机会以及贸易不平衡等使美国经济处于困境,如果不能建立强大的、日益发展的、有竞争力的国内经济,美国的安全就将面临威胁。

当然,美国也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上,赞同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及法治原则的国家越来越多,这种发展趋势代替了冷战时期严重的东西方对抗。因此,美国必须抓住这些机遇,调整军事战略,对付面临的新威胁,确保美国安全。

一、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

克林顿政府继承了布什政府地区防务战略的基本思想,强调战略重点转向应付地区性威胁,并从各方面对军事战略作了调整和补充。

(一) 提出“胜利—胜利”的军事战略方针

对于较大规模的地区冲突,美国必须具有足以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局部战争的军事力量,如同时与伊拉克(或伊朗)和北朝鲜作战并取得胜利。采取这种“胜利—胜利”的军事战略方针,主要是考虑到,当美国卷入对付一个敌对国家的“侵略”所引起的战争时,另一个敌对国家有可能试图攻击其邻国。美国拥有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能力,可以遏制潜在敌手可能发动的“侵略”。而且,美国应准备同比当今地区强国更强大的对手作战,一支可以同时打赢两场主要地区冲突的军队将有足够的力量击败这样的对手。

美国确立“胜利—胜利”的战略方针,意味着美军将更多地卷入世界重要地区的冲突乃至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为其全球战略提供强有力的军事保证。

(二) 全面调整军事力量结构,建立精干机动的高技术力量

克林顿强调不仅需要进一步裁减军队,而且还需要从结构上全面调整,“用一支规模较小而更加灵活的军事力量去取代冷战时期的军事结构”。“五年防务计划”提出:到1999年,陆军从14个师减少为10个师,国民警卫队从8个师减少为5个师,海军航空母舰从13艘减少为12艘,空军从28个联队减少为20个联队,海军陆战队从18万人减少到17.4万人。美国计划将整个武装力量编为战略部队、大西洋部队、太平洋部队和应急作战部队。

美国在裁减军队、调整结构的同时,要求提高军队的机动能力、灵活性和杀伤力,保持美国高水平的战备状态,保持美国军人的优良军事素质和军队的技术优势。计划采取以下措施:通过预先部署更多的部队和更多地加强空运和海运的能力提高战略机动性;提高航空母舰的打击能力;提高陆军火力的杀伤力;提高远程轰炸机投放常规“灵巧”炸弹的能力;加强后备部队建设,提高国民警卫队陆军战斗部队和其他后备部队的战备灵活性,以使他们更

便于完成同时打两场重要地区战争的任务和其他任务。在战略核力量方面,美国将遵循两个主要指导方针,即在保持不超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的限度的同时,保持一支有效的核威慑力量;能够在万一形势出现有威胁的逆转时组建额外的部队。在武器计划上,取消两项武器计划:海军A F-X中程轰炸机计划和空军尚未研制的多用途战斗机计划,着手建造空军新一代F-22战斗机和海军拟议中的F/A-18攻击机的E型和F型。在弹道导弹防御方面,重点转向能够防御诸如伊拉克“飞毛腿”导弹之类的短程导弹的反导弹武器,暂时搁置布什政府制定的研制能够抵御远程导弹袭击的导弹防御计划。

(三) 通过多种手段对付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扩散

美国认为,核、化、生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和先进导弹构成的威胁正在增长,除5个有核国家(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和中国)外,世界上至少有20个国家已经或试图拥有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和先进导弹。在大多数美军可能卷入的地区,如朝鲜、波斯湾地区,美军的潜在对手已经拥有了化学、生物武器,有些国家正在努力获取核武器。美国必须通过多种手段对付这类威胁。一是加强现有国际协议的监督和落实,如《核不扩散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导弹技术控制协议》等,扩大签约国的范围,协调限制核试验等;二是控制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和先进导弹技术、材料的出口,扩大国际机制和国际协议防止武器及其技术的扩散;三是与前苏各共和国加强合作,销毁其境内的核武器,防止前苏境内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及部件、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扩散;四是对极少数国家采取强硬措施,阻止其获取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和先进导弹及其技术的能力;五是提高情报侦察能力,保持强大的核和常规能力,通过可靠的致命性报复威胁,遏制敌人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袭击;六是调整战略防御计划,重点发展对付弹道导弹的防御技术,提供有限的导弹防御系统。

(四) 调整海外军事部署,重点是欧洲和东北亚地区

针对冷战后全球安全形势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调整了海外军事部署。欧洲仍是美国军事安全关注的重点,计划保留10万驻军,以确保美国在北约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美国陆军将同德国部队一起参加两支多国部队,空军将继续提高战场情报、空运以及对美国和北约的使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全天候准确袭击的能力;海军舰只和潜艇将继续在地中海和欧洲周围的海域巡逻。

在东北亚,美国认为,鉴于北朝鲜的威胁仍然存在,因而美国“对韩国所承担的义务仍然丝毫没有减少”。美国在东北亚计划维持近10万人的军队,并打算把更多的军事装备存放在韩国,以对付可能出现的危机。在冲绳,美国将继续驻扎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军和一个营的陆军特种部队。

在东南亚,考虑到“当地对西方在地面驻扎大部队感到很敏感”,美国“只好主要依靠每隔些时候部署一些部队,而不是例行驻军”。另外,美国在东南亚计划事先储备一些军事装备,一方面用于训练和演习,另一方面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危机。

在非洲,美国将继续为美军在非洲大陆过境或停留而使用的重要设施和港口与非洲国家达成重要的正式或非正式协议。当美国在非洲的利益受到威胁或者需要美国给予援助时,美国将出兵非洲。

在拉丁美洲,美国将继续同美洲国家的武装部队和警察协同合作对付毒品走私,保持在巴拿马的军事力量。

从美国的海外部署来看,欧洲仍是其全球战略的重点,但东北亚的驻军与欧洲大致相同,这说明克林顿政府更加重视亚太地区。在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美国主要是象征性的维持军事存在。

(五) 在“维持和平行动”中,强制实现和平和其他干预行动

美国认为,美国必须继续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通过推行民主和自由市场、发展经济、维护人权等手段来防止出现新的威胁,并为此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扩大伙伴关

系。这样,美军将参与广泛的“干预行动”。通常情况下,美国将作为联合国的一部分参加维持和平行动,但必须单干时,美军将采取单独行动。在强制实现和平和其他干预行动上,要考虑到参与干预行动是否能增进美国的利益;目标是否明确;美国能否提供完成任务所需的军事力量和物资等。

美国今后在维持和平行动中要强制执行“和平与其他干预行动”,虽然每次干预行动的具体目的和主要目的不甚相同,但都要求执行此项任务的美国部队做到:强行进入有防守的机场、港口和其他设施,并夺占或牢牢守住这些设施;控制越过边界和在目标国家内的军队和补给品的调动,包括对海上贸易进行封锁;建立保护公民不受外来进攻的防御地带;确保保护区不受内部威胁,如狙击手、恐怖分子的袭击和破坏活动;为把治安责任移交给维持和平部队或重新建立的行政当局作准备。

美军认为,参加一次大规模的干预行动起码应准备一个空中突击师或空降师、一个轻步兵师、一个海军陆战队远征旅、一至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一至两个空军飞机混合联队、特种作战部队、民事部队、空运和海上运输部队、作战支援和勤务支援部队、5万名全副武装的作战和支援人员等,这些部队基本上可以由准备打两场重要地区性战争而调集的一般部队提供,只要将这些部队给予实现和平与干预行动所必需的适当训练。

二、对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几点看法

克林顿政府的军事战略调整,是在国际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进行的,其目的在于重新认识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和机遇,调整军事力量结构,保持技术优势,以继续保持美国的“超级军事大国地位”,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对于美国的军事战略调整,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一)克林顿政府虽然强调“经济安全”,着力振兴国内经济,但军事力量仍是维持美国安全的重要支柱,军事手段是其推行新干涉主义的重要战略选择。克林顿认为,与经济力量相比,军事力量的实用价值正在下降,但军事力量对于维护美国安全仍至关重要,因此,削减国防开支和裁减军队,不能降低美军应付各种威胁的能力,不能动摇美军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如克林顿政府在上台后虽削减了一些军费,但又出现了回涨的势头。据报道,最近白宫预算局局长暗示,克林顿已同意增加今后五年的国防经费,追加100多亿美元。美国1994—1999五年防务计划裁军的幅度也比克林顿原来的设想要小一些。美国为推行新干涉主义,不仅利用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插手世界重要地区的冲突和纠纷,而且必要时会动用军事力量,军事手段是其重要的战略选择,如出兵索马里,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

(二)美国的战略目标与其实力之间存在严重矛盾,执行军事战略不会一帆风顺。

美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包括保护国内和海外所有美国人的安全,维护美国的自由、独立、财产、社会制度和领土完整,保障美国的经济繁荣,而且包括推行其价值观,即推行美国式的民主模式,维护“人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维护开放的市场,插手一些地区性的冲突和争端等。可以说,美国防务的触角几乎伸到全球各个地区、各个领域,以维护美国在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领导作用。然而,美国实力地位的相对下降却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国内问题成堆,其达到战略目标困难很大,进行海外军事干涉的能力正逐渐减弱,如一年来几次想在波黑和海地动武,但始终下不了决心,在索马里本想显示一下美军的威风,没料到遭受严重挫折。国防部长阿斯平的辞职,就与美国在索马里的军事政策失误有很大关系。因此,美国在推行其军事战略过程中,将受许多因素的制约,不会一帆风顺。

(三)美国军事战略调整对我国安全的影响。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军事战略的调整将对世界安全形势产生重大的影响,我国安全也受到相应的影响。从有利的方面来看,美国压缩军队规模,实行战略收缩,重视发展国内经济,将使全球性军事对抗进一步降低,有利于世界总体缓和形势的发展,

使我国处在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之中,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建设。而且,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度重视,美国要振兴国内经济,离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市场,美国将更加重视亚太地区,重视对华关系,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1993年11月份的西雅图会议就充分反映了这一趋势。同时,美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和先进导弹的扩散、处理地区性危机和冲突等问题上,都需要中国的合作和支持。我们可以把握机会,合理斗争,以维护国家利益。

从不利的方面来讲,毕竟美国同我国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民族传统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两国之间存在分歧,矛盾和斗争始终存在,而且有时斗争十分尖锐。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企图“领导世界”,并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输出“民主”、“人权”及其价值观念,敌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使我国安全面临潜在威胁。美国为推行其军事战略,在防止武器扩散、插手地区冲突等方面寻求我国合作的同时,将会借口维护人权向我施加压力,干涉我国内政;暗中支持台独势力,干扰我统一大业;在东北亚,美国仍维持强有力的驻军,一旦朝鲜半岛局势恶化,不能排除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因此,我应广泛开展政治、外交斗争,力避不利局面的出现。

○新 书 架

《美国劳动市场》 梁晓滨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除“作者前言”、“导论”、“结束语”、“后记”外,正文计12章、398页。全书共30.7万字。

本书系在作者的博士论文《美国劳动市场的结构及运行机制分析》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它以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市场为研究对象,讨论和分析劳动市场结构(供给、需求及交换方式)、劳动市场机制(流动选择、工资价格机制)、劳动市场运行(就业、失业方式及歧视等)、劳动市场调节(政府对其结构、运行的调节和干预等),从而说明劳动市场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该书认为,美国劳动市场由八个要素构成,即劳动力的供给方式、劳动力需求方式、劳动交换、就业、失业、流动性、工资报酬及政府调节。美国劳动市场是不完善的市场、买方市场、受管理的自由劳动的市场、被分割但仍不失其统一性的市场、不均衡的市场,除30年代大危机时期外,“从未出现劳动市场无法维持的状态”(“结束语”)。劳动市场在美国市场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

《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 吴泽霖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除“代序”(费孝通)、“序言”、“参考书目”、“注释”、“后记”外,正文计9章、292页。全书共26万字。

本书是已故民族学家吴泽霖教授1927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中译本由傅慷斐等译、应琳等校。据作者自述,该书“不拟探讨心理学方面的种族态度,只想表明非犹太教美国白人在种种人类关系领域里如何对待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序言”)。为此,书中专门探讨了美国人对待黑人、犹太人、东方人的态度及其比较,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根据反对的程度,依次是黑人、东方人和犹太人。本书还提出了一些解决美国种族问题的建议。

《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 李剑鸣著,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全书除“序言”(张友伦)、“引论”、“结语”、“参考书目”、“后记”外,计9

章。全书正文312页，共22.6万字。

这是一本研究1896—1917年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专著，考察了世纪之交美国人因应“工业文明综合症”而进行的全面改革的前因后果。该书认为，进步主义运动是一场以中等阶层为主、社会各阶级广泛参与的资本主义改革运动。其目的，是在资本主义已取得巨大物质进步的基础上，进而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条件、重建社会价值体系，以推动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故“实质上是一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化重建运动”（第3页）。这是美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大转折时期”。美国由此步入现代社会的大门。

《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至1953）》 华庆昭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除“序”（约翰·托兰）、“前言”、“主要参考资料”、“各章注释”、“后记”外，计12章。全书正文248页，共23.2万字。

作者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本书主要考察战后最初8年间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行动以及美国与中、苏、英的关系，其“前言”说：“美国外交有其明显的继承性。不管时代和形势怎样变化，美国以本国利益为目的，以‘天定命运’为旗帜的基本外交原则是不变的；以或增或减或扩大或减少形式多样的孤立主义、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为手段的基本外交政策是不变的。”本书最主要的特点是大量引用了美英两国的政府及个人档案资料。不过，书中欧化句子仍嫌稍多。有些背景知识的介绍亦不够准确（如美国兵强奸沈崇的事件）。

《美国军事思想研究》 钱俊德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除“出版说明”、“前言”外，计16章。全书正文310页，共27万字。

本书论述北美独立战争迄今美国的军事思想及其发展变化。作者认为，“美国军事思想是美国官方和理论界关于战争和军队以及其他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第1页），包括战争观、战争理论、战略思想、作战思想、建军思想等内容。1775—1865年是美国军事思想的形成时期，1866—1945年是其转折、发展时期，1946年以来是兴盛时期，确立了其独特的军事理论体系。书中考察了各历史时期美国政府在重大战争、军事实践中的指导思想及方针、政策和有代表性的军事家、理论家的军事思想，特别是重点研究了战后美国军事思想的发展。该书的不足之处是，所引材料大多未注明出处。

《当代美国戏剧》 汪义群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版。除“序”（吴克礼）、“结语”、“附录”、“后记”外，计4章。全书正文296页，共28.8万字。

这是迄今我国唯一研究当代美国戏剧的专著。在对近现代美国戏剧作了简要的回顾之后，本书借助翔实材料，评述、总结了50年代至80年代末美国戏剧作家及其创作的历程、发展趋势，并注意把作品介绍与美国文化、社会思潮的论述相结合，对以往重视不够的黑人戏剧、左翼戏剧、音乐剧亦作了介绍，勾勒出戏剧运动造就名家、名家推动戏剧运动这一美国戏剧史的重要特征。作者认为，“在战后短短的40多年中，美国戏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成熟了。……各种风格和流派的作品异彩纷呈，各种戏剧运动此起彼伏，其结果是诞生了田纳西·威廉斯、阿瑟·密勒、爱德华·阿尔比、萨姆·谢泼德等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在他们的周围，又有着数以百计的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剧作家。正是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美国戏剧才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即使在电视与电影的冲击下依然兴旺发达”（第296页）。

（英堂供稿）

Policy in Asia, New York: Norton, 1993.

本书详细叙述了战后初期艾奇逊东亚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作者指出,艾奇逊东亚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将重建日本置于最优先的地位,认为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值得珍视的“战利品”,是“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因此,艾奇逊极力推动美国及其盟国实施重建日本的计划,保护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前途。作者指出,如果当时在任的不是艾奇逊而是另外一位国务卿,美国的对日政策或许会完全不同。比如,乔治·凯南就主张使日本中立化,接受苏联对朝鲜半岛的占领,放弃印度支那,允许中国进入联合国。作者指出,艾奇逊的日本中心政策虽然使美国经历了韩战、越战的风险,以及与中国长期对峙,但纵观全局,这个政策仍然是十分成功的。(本书曾获美国历史协会奖)

Duignan, 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w Europe*, New York: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与西欧国家的合作伙伴和亲密盟友关系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这种关系正在发生着某些微妙的变化。本书回顾了过去300年间大西洋两岸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考察了这种关系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特征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Laura D'Andrea Tyson: *Who's Bashing Whom Trade Conflict 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2.

技术密集型工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和重要的地位,但在近年来的国际竞争中,美国的优势却在日渐衰弱。作者具体考察了美国同其他经济强国,特别是日本在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和商用航空工业等方面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原因,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其他经济大国违背自由贸易的原则,使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保护本国工业,以不公平竞争的方法使美国产品处于不利地位。然而,作者仍然认为,美国应坚持其一贯奉行的作为其贸易政策基础的传统观念,鼓励竞争和贸易,而不是以牙还牙。同时,作者也强调谈判、区别对待和有选择地制裁的作用。(作者观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James L. Gormly: *From Potsdam to the Cold War: Big Three Diplomacy, 1945-1947*. Wilmington DE: SR Books, 1993.

作者分析了美、英、苏三国是如何从战时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演变成为“铁幕”两边的相互敌视的对手的。书中展现了战后初期三巨头之间举行的一系列艰难的谈判:波茨坦会议;三国外长间的一系列会谈;紧张、激烈的巴黎和会;以及为实施巴黎和会的有关决议,三国外长间的多次气氛紧张的谈判。在分析这段历史的过程当中,作者还着重对伯恩思、莫洛托夫、贝文等几位关键性人物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他们个人的内在动因进行了分析。本书资料丰富、详实,是考察冷战起源和战后国际关系历史的重要依据。

Henry J. Aaron: *Serious and Unstable Condition: Financing America's Health Car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1.

作者讨论了90年代美国医疗保健计划所面临的三个中心问题,指出美国花在医疗保健计划上的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但是,目前美国却有几百万人无力支付一场急病所需的基本医疗费用;负担得起长期治疗费用的人越来越少;许多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因负担不起高昂的医疗费用而得不到充分、有效的治疗。作者认为,控制医疗保健费用的不断上涨和使更多的人得以享受医疗保健计划的好处,这两者是相互矛盾但又是一个必须同时解决的难题。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综合治理的设想。

B. Daniel, *Turning the Tables: a Machiavellian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Jap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3.

本书回顾了过去五年间的日美关系,阐述了日美两国经济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依存。指出许多美国公司正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需要与外国公司特别是日本公司合作,以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作者探讨了最终解决日美双边贸易赤字的方法,并提出了将两个强大、经常处于对立状态中的国家协调一致起来的理论。

L. S. Vandenbroucke, *Raiders of the Last Resort: Special Operations As an Instrument of US Foreign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本书通过大量的报告及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分析了最近几十年间美国采取军事手段试图实现它的一些重要外交目标而没有成功的事例,分析了失败的内外原因。

R. Grinspu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New York: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系统介绍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由来与发展及有关国家对此的反应。第一部分:三方讨论的框架。第二部分:加拿大一体化的政治经济。第三部分:墨西哥一体化的政治经济。第四部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与新大陆的关系。

B. Stallings,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Toward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Baltimore: The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书中分析、预测了西半球未来可能形成的各种格局:美国继续保持其支配地位;日本取代美国的地位;以及日美两国分享经济控制权和政治影响等。

Mckay,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3rd. ed. New York: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本书是一部完整记录和叙述1992年导致克林顿入主白宫的总统大选的著作。该书最新一版还考察、分析了美国政府的议事程序,并以一个外国人的观点进行了评价。

C. R. Shrader, ed. *Reference Guide to United States Military: 1918-1945*.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3.

本书汇集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有关军事历史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全面记载了此间发生的重大全球性军事冲突,以及美国如何在这些冲突之后而稳固确立自己军事超级大国地位的情况。

C. R. Shrader, ed. *Reference Guide to United States Military History: 1945-1993*.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3.

这是丛书的最后一卷,书中汇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取得胜利至今期间的重要军事历史文献资料,系统反映了40多年来美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及全球军事格局的变化。

C. A. Lunardini, *The Clio Companion to the American Peace Movement*. California: ABC-Clio, 1993.

这是一部系统记载19世纪末期以来非暴力及反战运动历史的资料性著作。书中详细记录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越南战争期间、60年代民权运动期间以及其他一些冲突和骚乱时

期的和平运动情况。

J. P. Fernandez, *The Diversity Advantage: How American Business Can Out-Perform Japanese and European Companies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New York: New Form Maxwell Macmillan, 1993.

今天,使劳动力队伍合乎道德规范,有文化素养和活力,以及性别均衡,是美国企业界关注的焦点。本书作者认为,美国企业家的眼光应放的更远。他将日本、欧共体国家的法律、就业政策、文化传统等对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影响同美国进行了比较,指出多样性是美国战胜竞争对手的主要优势。

G. L. McDowell, *Justice vs. Law: the Courts in American*. New York: New Form Maxwell Macmillan, 1993.

书中指出,美国的法院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机构。一方面它深深地卷入美国人民的日常事务,另一方面,它又在公众看不见的一块面纱之下,行使着法律的职责。作者认为,法院实际上一直在构造和指导着美国的政治。因此,他试图撩开那张神秘的面纱,找出其中的奥妙所在。

B. & others Perkins,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1-4, Cambridge (GB):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本书共分四卷,第一卷,共和帝国的创立,1776—1865年。第二卷,美国对机遇的寻求,1865—1913年。第三卷,美国的全球外交,1913—1945年。第四卷,美国在苏联政权的年代,1945—1991年。

E. R. Kruschke, *Gun Control*. California: ABC-Clio, 1993.

本书研究了当今美国社会引起激烈争论的枪支管制问题,是一本资料丰富的手册性著作,反映了对枪支管制政策持支持和反对态度两方面人士的意见,分析了历史上有关枪支管制的立法、措施以及所发生的事件。

K. M. ed. Borman, *Changing American Education: Recapturing the Past or Inventing the Futur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3.

本书分析了社会变化对教育的影响,对中等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实例研究,剖析了美国现实的教育改革理论与实际的相互脱离。
(高英东供稿)